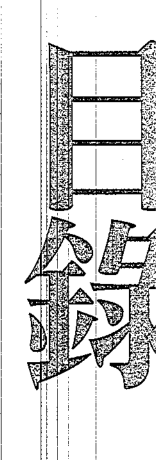
香港城邦論

一國兩制，城邦自治，是香港生死攸關之事。

陳雲 著



第三章 一國兩制，城邦自治

第四章 香港政策，大陸優先？

第五章 展開公民運動，維護一國兩制

第六章 香港只要自治，不必獨立

第七章 香港自治：公共政策正常化

第八章 自治保經濟，自主保尊嚴

前言

放乾沼澤，還是打殺鱷魚

韶光不再，河川斷流，皺紋爬上你的臉，帳單分薄你的糧。世情紛擾，令你無心眷戀，要留住現狀，談何容易？九七前後，香港人只求留住現狀，keep住status quo，可惜現狀不斷崩壞，香港如立在風沙上的大理石像，面目吹刮得日見模糊，眼看快要粉身碎骨，委於路塵，今後何去何從？是俯首聽命，逆來順受？還是負隅頑抗，力保不失？

中共不是「阿爺」，香港也絕不是小孫

香港要保住現狀，必須知道三世因果：前世、今生、未來。前世是歷史意識，你親自考察過去，知道自己的來歷，不是人家說甚麼，你就認為自己是甚麼。人家說你前世是個英國殖民政府的

孽種，偷歡在邊陲，今生「回歸」祖國了，要你做牛做馬、做雞做鴨來償還恩公，你一世人就完蛋了。中共常當香港人是幼稚又純美的小孫女，用傳媒灌她迷藥，一旦她認了中共做阿爺，中共便對香港人說：「哎喲，我疼死你囉。阿爺以前好窮，沒有本事好好照顧你，令孫女兒落入英國人手上。現在阿爺強起來，將你救回，不過，你知啦，阿爺脾氣不好，以前阿爺又未享受過，搞到現在，唉，總是想着那麼回事。孫女兒啊，你要久不久回來安慰我啊。」孫女退縮了，阿爺強拉她入房：「看，你身子不知有沒人被英國人搞壞了，快脫衣服給阿爺檢查檢查。褲衩也要脫，兩爺孫，害甚麼羞？阿爺給你做點愛國教育。」一個過去被人家迷糊了的人，就會自我貶抑，由一百七十年歷史（一八四二——）的老牌國際城市，變成只有十幾歲的新興城市，要認只有六十來歲（一九四九——）的猥瑣男人做阿爺了。要是自認一百七十歲，久經滄桑，天山童姥，都成仙了，甚麼鳥事沒見過，還會懼怕六十歲的露體狂、猥瑣佬嗎？

一個人要有壽算，自己知道健康日子有多長，才活得下去。一個地方的制度，最先說好有五十年的健康壽命，後來卻被這個醫生那個護士通身駁喉，刺針放血，限制要住醫院，不許自由出入，常威脅說「命不久矣」，要融入大陸，接駁血管，靠大陸輸血，那地方的人還可以活得快樂嗎？無將來的預期，無信心將自己的現況延續到未來、把現存的制度不斷改良而永葆青春，那地方是沒指望的了，任人踐踏、搶掠和污辱的了。

香港的苦況，就是只有現在，沒有過去，也沒有將來。各位香港同胞，這種日子，你能不思改變嗎？甘心這樣蹉跎下去，令子孫受罪嗎？

可惜，強敵壓境，城門失守，敵人就在客廳裡了，快要入睡房了。你想我怎麼樣？不投降，不獻出錢財和妻女，難道不要命嗎？

中共真的這麼強嗎？

你就太小看自己了。強敵，真的這麼強嗎？他要是這麼強，一槍就斃了你，還需要威脅你嗎？他這麼富，還旨在來香港撈油水嗎？強敵為甚麼還不敢大舉越境，而要做思想滲透和人員滲透呢？強敵為甚麼要給你頒布《基本法》，界定雙方的權力界限，口說甚麼依法治港呢？中共不敢掐死你，為了甚麼？他們要哄騙你而不是殺掉你，不敢謀財害命，他們又懼怕些甚麼？

中共顧忌的，永遠比香港人能想像的要多：

中共亟須香港的金融救助：國家現代化，須過金融關。金融闖不過，繁華一旦消。金融需要制度基建，講究歷史累積、司法獨立、人員誠信和風險承擔。中共的金融基建薄弱，工商貿易卻被迫突飛發展，以促進充分就業來換取社會穩定，必須依賴一個現

成的（established）金融中心，做融資、借貸、上市、併購等業務，稍有差池，節節敗退，故此不容許中共邊學邊做。顧忌國際金融大鱷之勾結與掠奪，人民幣遲遲不能自由兑換，資本帳不能開發，而融資救助卻必須進行，香港的金融城市地位變成了中共無可奈何的不二之選。離開中國來設立人民幣離岸中心，容易被敵國騎劫。放在上海，又怕中國管理人勾結敵外，裡扒外偷。只有香港，既有國際勢力的制衡，又可以暗中關照中國，姑息中共在香港金融市場興風作浪，渾水摸魚而不予懲罰，香港是中共可以體面地從事金融套匯的現代地方，別無他選。

中國受到國際社會監察：中國登上世界舞台，不能玩單邊主義。香港受到《中英聯合聲明》的國際盟約之約束，三百萬持有英國海外國籍身份及其他外籍的人口，受到外國政府的關注。香港的國際締約地位，源自殖民地時期的獨特身份。美國國會於一九九二年通過《香港政策法》，該法例設立了法律框架，使美國可繼續和擴大數十年來與香港市民及其官員建立的廣泛、多層面關係，藉此承認及支持香港的自治權。該法例的前提，是允許美國僅在總統可證實香港擁有充分自治權的時候，才給予香港區別對待。一旦中共侵蝕香港的自治權，美國將不予香港優惠對待，而其他國家必會跟隨，削弱香港的國際締約身份而動搖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

香港有悠久的國際關係：中共在經濟、軍事和其他各方面都不是強國，需要三五十年的和平建設和經驗學習，當中必須依賴香港取得方便。香港有一百七十年的獨立城邦發展歷史，市民經歷百載浮沉之考驗，性格成熟，對外友善得體，自由世界的國際人員自由來往，並在香港居住和交易，中共在香港可以接觸國際社會，得到經驗。例如中共的人員移民香港，即可取得香港護照，便利走動，這比持有中國護照更具備法律及心理的欺騙性。一旦香港受到過分侵蝕，例如人權和法治迅速消退，大陸移民來得太多太快，國際社會就會取消香港的特別待遇，中共得不償失。

中國禍福難料，不敢自絕香港的生路：由於政權專政，中共是不正常的國家。為了政權生存，中共國富民貧，它只是美國姑息的提款機和工奴看管人，國際聲名狼藉，並無權威可言。中共好像持有很多美國國債，但貸款過多，反制於人。只要中共這個債主亡國，美國則不必還債或減少還債，而萬一中共倒台，裡扒外偷、化公為私之後，中共轉型而成的新中國政府必是國庫空虛，它要借助香港的儲備金和公共資產作抵押，取得美國為首的外國借貸，而這需要維繫香港的誠信地位不變。故此，中共時刻要在死亡邊緣思考，動搖香港的地位，中共在危難時期的選項只會減少，不會增多。

中國有求於香港的制度救助：中共在現代化過程之中，險阻重重，例如法制、金融、公共行政、福利政策等，最現成的參考基

地是香港，最可靠的經驗傳遞者是香港政府和香港人。中共也許不能察覺，一旦香港過分大陸化，香港的制度即會變質，而從外國和外國人、甚至外派人員學習先進經驗，都不會可靠。舉例，大陸的公務員制度、公共安全制度（警察、消防等）、公共行政（運輸管理等）之類，很多都需要持續參考香港，減低知識轉移的經濟成本和社會成本。

香港是大陸高官與財閥的轉盤之地：於私利而言，香港是境外地區，方便中共高官及財閥轉移財富和家族成員，既在中國卻又遠離是非之地，將財富和家人寄存在香港，便利往來，也享有港府的特殊關照，可以分散政治風險，避免被外國政府監察。

香港人真的需要打殺鱷魚嗎？

香港人面對中共，有如農夫要開墾沼澤耕種的時候，面對一群鱷魚。不打殺鱷魚，無法安居樂業，但打殺鱷魚，工作艱鉅，農夫有損傷，也模糊了耕作的原本目的。香港很多從事民主鬥爭的人都認為香港的民主必須建基於中國的民主，離開中國的民主來爭取香港的民主是不可能的，故此必須兩頭兼顧，投身改造中國的事業來維護香港的現狀和前景。這是個似是而非的策略，也是中共與港共（中共駐港政府）樂見的笨蛋策略。中國在中共手上，中國被中共騎劫了，用反共建國的方式來救香港，即使是姿

態上的、假扮的，也必須要與中共周旋而最終要妥協，甚至過度學習了中共的做事方式而腐蝕了自己，香港民主黨的墮落就是個例子。至於真心從事反共的革命事業的，或者改良中國的，也會路途漫長，受到挫折而不被香港人看好，衍生的失敗主義、認命主義和犬儒心態，更是中共和港共喜聞樂見的。

美國政治家，特別是列根總統，很喜歡引用一句美國的農夫諺語：「當你身陷鱷魚群中，就很容易忘卻，當初的目的是抽乾沼澤（When you're up to your neck in alligators, it's easy to forget that the initial objective was to drain the swamp.）」這句諺語，有深刻的現實政治（Realpolitik）教訓。

從事漫長而複雜的要旨（primary goal），很容易沉溺於次要的、甚至三等的旁務（secondary and tertiary sub-tasks）。特別是這些旁務是費盡心力而不能成就的，卻又是要旨所必須的若干先決條件。這些旁務就會吸乾了精力，令人捨本逐末，最終一事無成。打殺鱷魚已經是難事，將鱷魚教化成為善類，更加是mission impossible。但是姑息鱷魚，與鱷魚融合，進行「愛鱷教育」，捨身餵飼鱷魚，將自己的蛋白質化成鱷魚的蛋白質，這種assimiliation（融合）更是同流合污，愚不可及。將香港的命運寄託於民主中國，難若登天，姑息中共蠶食香港，也是死路一條。

香港人該怎麼辦？

香港人必須知道，鱷魚的食物很多，自己不一定是鱷魚的食物，不要為了打鱷魚而忘記抽乾沼澤耕種。香港人要做的是築好邊界，看守住中共這批鱷魚，但毋須耗費精力打殺牠們，更毋須感化牠們成為善類，因為牠們不會變成善類，牠們食的大蟾蜍、水老鼠、食人魚等，香港人不能食，留給鱷魚食。假如鱷魚成批死了，鱷魚統治之下的大蟾蜍、水老鼠、食人魚重新組織民主中國，或成批湧來香港，對香港更為有害。中國目前並不具備憲政民主的基礎，萬一將來出現急速民主化的、惡性的民主中國，比惡性的共產中國，更能危害香港。

守好邊界、與中共定好權力界限之後，鱷魚可以來香港化妝成為龍[1]，在國際社會招搖過市。鱷魚治下的大蟾蜍、水老鼠、食人魚，可以來香港買奶粉西藥化妝品護膚品，回去可以更好地充當鱷魚的食物。

香港要提防惡性民主化的中國，但也毋須祈求優秀民主化的中國。香港要做的，是在中國現代化過程中提供協助，但要取得應有的政治經濟利益和榮譽身份（credit）。中國的現代化愈緩慢，愈對香港有利。這是政治本位的問題，政治立足點的問題，政治方向盤（political orientation）的問題。脫離了這個政治本位，

1．中國的龍源自揚子鱷（Alligator sinensis）的美化，俗稱豬婆龍、土龍。

香港即無政治可言。香港也就可以放棄，香港人也無命運可以掌握了。

香港本位，香港優先，香港第一，Forget China. Hong Kong comes first. 這是香港生死攸關之事。這就是香港的現實政治。反共是若干程度的反共，有足夠的阻嚇能力，達到拒共的目的即可。維護香港、建設香港的未來，才是香港人的要旨。而只有在香港維護好之後，中國才有長期可靠的參考，建成憲政民主，這一日香港人可以期待，但只能等待而毋須急於爭取，因為優秀的、憲政民主的中國，將無求於香港，香港的優惠地位也就完成了歷史任務了。

香港與中國大陸是相互依存的關係，一國兩制，香港自治，就是更好地維持這種互相依存的關係。

嗚謝

我本不想做拯救香港之事，以一人敵一國，幾乎令我家破人亡。奈何二〇一〇年底，港共參與宜居灣區規劃，向廣東割讓香港治權，面書的老友勸告再三，我才撰文反對。二〇一一年二月九日率先於面書發炮，後寫成文章，題為「香港城邦，中國門戶」，二〇一一年三月二十二日於《am730》專欄刊出，以歐洲城邦觀念，重認香港的城邦身份。

刊登之後，迴響巨大，面書朋友成立群組，探討香港城邦自治之事，天窗出版社約我寫書。面書討論六個月之後，於二〇一一年六月中旬，理論奠定，並草擬《香港城邦自治總綱》，於七月一日的遊行影印若干份派發。因家事不寧，撰書之事，延誤再三，終於在八月整理面書之貼文及回應，分為八章，九月動筆撰寫，並聘請學生黎志恆君協助根據面書貼文及留言，整理第一、三、七及八章之文稿，事後我再增刪修訂，文責由我自負。是書總結一群香港熱血市民之思想交流心得，有些見解更是幾位老友徹夜筆談、激辯而得，難能可貴，我不能竊居首功，僅此鳴謝。

陳雲

民國一百年夏曆辛卯八月二十日

西元二〇一一年九月十七日

第一章

放棄民主中國，保住香港城邦

(一) 城邦自治運動：以政治現實主義拯救香港

香港人面臨兩大政治懸案，不換轉腦筋，這兩大懸案足以埋葬香港：

香港是否需要憲政民主的中國做依歸？中國不民主，香港就是否就無運行？

香港的過渡身份，予香港人極大焦慮。香港非國亦非市，而是所謂特別行政區，香港的一國兩制又只能維持五十年不變，香港人不敢想像香港可以過渡到主權國家（香港獨立），那麼就只能過渡到成為中共治下一個直轄市了？

政治有兩大範疇：一個是理想政治（德文Idealpolitik），一個是現實政治（德文Realpolitik），兩者往往有重疊交叉的地方，互

為干涉，也不是截然二分。理想政治以普世價值為本，做到人人安樂，現實政治以生存利益為本，先做到自己安樂。前者類似儒家的大同，以天下人的利益為重，所謂天下為公，後者類似儒家的小康，以一家一鄉的利益為先，所謂天下為私。先有小康，然後有大同。要是一下子投入理想政治，香港必須協助中國民主化，而由於中國受到中共統治和挾持，這必須選擇向中國抗爭或歸順。反共復國，香港不具備這個實力，也不一定有這個責任；歸順中共，則香港必須面臨大陸化的痛苦衝擊，直至麻木不仁為止。

以理想政治來處理中港關係，香港必敗無疑。但是，以現實政治來處理中港關係，則香港大有迴旋餘地，資源用之不窮，可以阻隔中共，令港人得以安身立命。香港的公民社會、國際聯繫、法治權威、良善風俗、金融財富等，都是香港對抗中共的資源。這些資源當然有限，但是用在有限的現實政治範圍，用以自保香港，這些資源就夠用。用在無限的理想政治範圍，用以改革中國，這些資源遠遠不夠。香港的抗爭資源夠與不夠，香港人面對中共是勇武還是無助，就看香港人如何入手。

理想政治處理的是最終目標，現實政治處理的是過渡狀態。過渡狀態處理得宜，也可左右終極目標。香港非國非市，而是歐洲狀態的城邦一，《基本法》和一國兩制賦予香港城邦的法理地位，

一．香港乃英國在亞洲貿易航道設立的一連串城邦之一，詳見第二章的歐洲城邦歷史。

這個過渡狀態可以延長很久，香港人要在此過渡狀態中取得最大利益，延長最大利益，而不是因為焦慮或無助而放棄經營此過渡狀態，任由中共定義此過渡狀態而取消之，迫令香港成為中共治下的直轄市。過渡狀態經營得法，最大利益穩固下來，習以為常，可以將過渡狀態變成恆常狀態。

一九八四年《中英聯合聲明》簽訂之後，香港社會預備了所謂「民主回歸論」的政治議程，準備以民主建設香港的方法，在主權移交中國之後，用民主制度保存香港的社會制度和文化生活，並同時向中國輸出民主，意圖為香港締造一個容許民主建設的安全大環境。在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天安門慘案之後，「民主抗共論」成為民主回歸論的副主題，甚至是潛主題，就是用民主的制度建設，抗拒中共直接干預香港內部事務。而不論是民主回歸還是民主抗共之論，都是所謂泛民主派的政黨的指導思想和宣傳原則，用在政治意念鬥爭的層面，並不是香港一般人可以參與和感受到的日常運動。

這兩個香港民主派政黨操作的理論，是互相隱含的，也是互為表裡的——表面是民主回歸論，裡面其實是民主抗共論。這必會招惹中共的顧忌而壓制香港民主進程，因為這種以民主統一中國的運動來保護香港的理論，不操作的時候，只是溫和的愛國情懷，一旦投入操作，就是干預中共內政，甚至有顛覆中共之虞。再者，這是不切實際的、也不一定符合現實政治操作原則的思想，

一旦中共轉型為民主政黨或中國因為中共倒台而急速民主化，香港的一國兩制的國中之國的那種類似政治特權的安排，不一定會獲得民主中國政府接納，或者起碼會重新用民主中國的格局來考量和安排。以香港有限的地方議席力量，並不一定能遊說議會保護香港的一國兩制，民主中國政府絕對可以通過議會的民主程序，取消香港的一國兩制，要求香港開放邊界、向中央繳稅、支付軍費和負擔議會通過的特殊稅捐，並取消香港的國際身份。這將影響甚至危害到香港人的生命財產和文化生活。

九七之後，中共用人大的權力不斷將香港的普選日程推延，而且不允許撤銷立法會的功能組別，香港民主進程受阻，令這兩個理論都崩潰下來了。然而，由於香港並無新的、務實的政治理論可供政黨操作和民間認同，這兩個理論依然成為香港朝野民主抗爭的理論。民主是首先用來建港的，不是首先用來抗共的。擁抱虛幻的、危險的而且無法與中國政府妥協的民主回歸或民主抗共之論，不但與中共衝突，而且這些不切實際的理論，並不能積極鼓動全體香港人的參與，共同建設香港。

（二）民主鬥爭催化本土意識：從中國意識牌、本土民生牌到本土意識牌

二〇一〇年的政治改革方案一役，民主黨投共，出賣香港人，中斷香港民主進程，令選民震驚，很多人仍不理解來龍去脈。民主黨之敗，除了是貪圖安逸的仕途主義（Careerism）之外，是中國大一統意識所害，將香港的民主前景捆綁於中國民主之上。一九九七之前，香港民主政團打的是兩套牌，本土民生牌和中國意識牌，有時兩套牌一齊打，爭取福利、反貪污、支持艇戶安置上岸之類，是本土民生牌；中文合法化、保釣、平反六四之類，是中國意識牌。打兩套牌都有效，因為當時的殖民政府正要靠改善民生來有效統治香港，也懼怕華人提出中國意識，危及殖民政權。於是政府回應政團所求，做個順水人情，有時甚至好像打麻將的讓賽一樣「鬆章」給政黨打，用改善民生來建立本土歸屬感，轉化香港人的中國情懷，近乎無痛地形成了香港和平抗爭的傳統。記者招待會、示威遊行街頭諷刺劇、和平解散，成了香港抗爭的三部曲。

震懾殖民政府的中國大一統意識，在九七之後失效了。民間抗爭失去鎮山法寶。港共政府勾結地產財閥，並準備在地理上將香港融入珠三角，瓦解香港。政務司唐英年講明要將香港窮人驅趕到大陸居住，輸入大陸富人填補空間，面對橫蠻政府，民生福利

牌毫無效用。留下的中國意識牌，即使在一九九七之後轉變為民主抗共論、中港民主融合論，也令民主黨和某些服膺中國大一統意識的政團尷尬起來：假若不能妥善詮釋一國兩制下的香港本土利益，則香港政客會因為要遷就中共的政治安全、成全大陸的經濟發展之類而斷送香港的民主進程和經濟建設的。

民生牌打不了，擁抱中國意識的民主黨由於無法政治轉型為代表香港本土意識的政黨，他們的出路，就是從民意代理變成政治買辦，轉而投靠中共，成為中共的夥伴。本來，九七之後，民主黨就要大換血，更換領導及政綱，放棄中國大一統意識，改為詮釋一國兩制之下的香港本土意識，代表香港人與中共周旋，在政治鬥爭之中劃出中港之間的楚河漢界。可惜，這些為香港利益奮鬥的政治大手筆，並非此等萬年議員、終身議員想做的事。為了仕途安逸，民主黨終於將政治買辦的身份揭露了。

為此，在二〇一〇年中的政制改革之後，香港民間尋求新的香港政治理論，特別是在二〇一一年初的宜居灣區規劃事件和大陸孕婦來港產子事件，危害香港的規劃自主及人口政策自主，引起很多香港人對於香港城邦地理格局和香港人口構成的關注，香港城邦自治論於焉誕生，香港城邦自治運動亦於此肇端。[二]

二・討論在筆者的面書貼文區進行，歷時三個月，在二〇一一年六月中旬，理論成熟，筆者定下香港城邦自治的理論總則，並撰寫《香港城邦自治總綱》。面書成立HKAM群組，由成員負責推廣香港自治運動概念，筆者充當學術顧問及意念統籌人。

（三）無端愛國，忽然回歸

中共與英國簽訂的《中英聯合聲明》，判定了香港的主權歸屬：香港地區（即香港島、九龍及新界）是中國領土，英國政府於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交還香港主權，中國政府於同日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

中共蒙蔽大陸人的詭詞是「解放」[三]，蒙蔽香港人的詭詞是「回歸」。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英談判時期，香港人的粵語口語是「共產黨要收返香港囉」，即是中共收回香港主權的意思。由於英國是從滿清皇帝之手，割讓香港及九龍並租借新界，滿清將大統交予中華民國，而中華民國至今仍在，台灣仍未宣布獨立建國，中共也未消滅中華民國，故此香港主權是否在於中共，香港也無人深究，只是英國承認中共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就只得將香港交還中共，致令中共於國際法的義理上，擁有香港主權。在向一個有效實施統治權的外國勢力手裡索還領土的時候才確定主權歸屬，是國際法上常見的事。[四]

以政治現實而言，中共擁有香港主權，有權收回香港。香港在秦漢之後是中國領土，只是清廷於鴉片戰爭輸給英國後，才會割讓出去，成為英國在遠東的殖民地。滿清割地賠款，簽訂不平等條

約，國人視為國恥，況且佔領殖民地，強行掠奪剝削，乃西方一段不光采的歷史。然而，由於中共並非憲政共和政體，中共收回香港，猶如滿清政府收回香港，於國人而言，並不十分值得慶幸。尤其對香港人來說，滿洲與中共同屬暴政一列，香港被暴政的中國政府收回主權，本身又不能促成中國民主化，港人如何是好？

香港的原住民乃南宋以來的前朝遺民，於滿洲王朝之苛政，記憶猶新。比如是清初朝廷為了斷絕閩粵沿海人民接濟明朝遺臣鄭成功之艦隊，實行海禁，頒布遷界令。遷界令又名遷海令，康熙元年（一六六二年）由輔政大臣鰲拜下令，由山東省至廣東省沿海居民內遷五十里，房屋全部焚毀，不准出海。禁令使香港的漁業和鹽業廢置，田園荒蕪，內遷期間死人無數。廣東巡撫王來任、兩廣總督周有德，極力請求復界，康熙八年（一六六九年），朝廷認為海禁已收成效，允許巡撫所請而復界[五]，但頗多田園無人復還，錦田留下一間被榕樹纏繞的樹屋[六]，見證遷界令之殘忍。此堅壁清野之焦土政策，令沿海漢人厭惡滿清，積下仇怨，乃有支援反清復明之舉。

三．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之人民共和國成立，只是中共建政或建國，不是解放，因為民國之統治並非暴政，亦非帝王或境外政權統治。

四．英國將佔領的西藏交還中國，也在國際法理上確定了中國對西藏的領土主權。此前，西藏從元朝到清朝，是中國的藩屬國。

五．元朗有周王二公書院，上水有巡撫街，紀念兩位巡撫大人，崇德報功也。

六．位於元朗錦田水尾村遊樂場側。

中英鴉片戰爭前夕，欽差大臣林則徐嚴禁華人供應清水糧食予英國人（這亦是鴉片戰爭爆發之導火線），不少華人照樣向英人補給，甚至戰爭爆發之際，他們還為英軍提供情報。英國將領義律遊說英王，要求清廷割讓香港島時，其中一項理由，乃英國人需履行公義，保護提供補給之香港人。香港人乃與英人作「非神聖同盟」，抵制滿清之暴虐，後來香港人包容天地會、洪門乃至楊衢雲組織與中會[七]，支援民國之革命，實由前朝遺民驅逐滿清、光復漢室的志氣推動。[八]

再者，若論中華正統，中共繼承了法國的意識形態（社會主義）、德國納粹和俄國共產黨的統治技術（如大規模的政治迫害、屠殺異類和精密的列寧黨政與特務統治），不合中華體統。中華乃天朝古國，屬於文化國族（德文Kulturnation），以仁施政，以禮施治，自有堂堂國體。中華之正朔，不限於現代之憲政，亦不由民主共和，有則更佳而已。格之以史，中華之正朔有三，一曰奉名教，二曰恤民命，三曰禮文士。以此繩之，即使滿洲入關，南明王朝仍是正朔，而初入北京之滿清不成其正朔。宋朝滅亡於蒙古，日本舉國服喪，自此即不認中國，自立正朔，甚至鄙稱清朝為「支那」。明朝滅亡於清，韓國亦不認中國，自立正朔。日、韓的正朔觀，也是沿自中華。

正朔者，奉名教，恤民命，禮文士。名教即以禮治天下，祭天祀孔，崇德報功，供奉佛道。國府在大陸革命政權期間，廢了國君祭天之禮，但直至今日偏安在台，也祀孔奉道，獎勵文教，

並容許宗教自由。中共前身是中華蘇維埃，確曾是共產國際中國分部，且受其思想統制、幹部培育、軍令指揮與軍事援助，及至建政。且其崇拜暴力統治及無神論，至今三者依然不違。中國經歷三個殖民政權，一為蒙古之元朝，二為女真之滿清（另加日本扶植之滿洲國）[九]，三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共前身一九三一—一九三七），都不是中國的政權，且由於滿清與英方的條約並不是中國政權，故其合法性存疑，這也是民國政府及中共不承認滿清與列強簽訂之條約的理據。然而，民國政府可以是合法的中國政府，然而中共呢？

中共竊據中國，本身並非合乎中華體統的政府，只是佔領香港之英國，是更無理由之竊據，於是中共提出收回香港主權，英國只有服從，於是中共便利用《中英聯合聲明》的國際盟約收回香港，在國際法上奠定香港的主權歸屬。收回香港之後，由於中共傳承的是歐洲的左翼政治思想，與香港的右翼自由主義思想衝突。加上中港兩地本有南北文化之衝突，北方黨官理解香港、（間接）管治香港之難，可想而知。中共要員屢次說香港是一本難懂的書，並非無因。

七、楊衢雲乃輔仁文社創立人之一，為一宣揚革命思想之組織。楊衢雲曾任興中會會長，與孫中山多次並肩起義，享有盛譽。一九〇一年，楊氏在中環結志街的文社教室內遭清廷密探刺殺，英年殉命，今跑馬地墳場有斷碑，紀念其革命不遂之事。

八、此外，從太平天國、戊戌政變、辛亥革命、護國北伐、一直到中共在香港設立黨校（達德書院）及基地顛覆國民政府，香港都是中國革命的培育地、革命黨人的退藏地。

九、還有抗戰時期之南京汪精衛政府（一九四〇—一九四四）。

民主回歸之論，之所以能夠成為「主流民意」，中共與香港民主派都可接受，原因是此論之完成，民主中國遙遙無期，但「回歸」卻暗中預設了香港人自願歸順中共的事實。香港的民主派（包括若干左翼人士）認為，要香港有憲政民主，必先要在中國實現憲政民主，而後者由於是短期內無法達成之事，這便卡住了香港的憲政和民生福祉。而中國的政權又在中共手上，中共便可以用民族統一論來反制香港的民主派。這是必勝之戰。

目前香港支持民主回歸的選民，仍未覺醒過來。原因是整套論述遭到共產黨的思想植入。依循這套論述，必須同意香港民主制度乃由共產黨施捨的。中共自可蒙混過關，用政治語詞營造出香港自願脫離英治，港人歸順中共的假象。可是，由於中共好像秉持民族大義，用的是正氣凜然的詞語，民間質疑民主回歸之論，不與中共爭奪政治語詞的選擇權與詮釋權，卻順着中共鋪好的語言地獄之路前進，只能遭受火劫。故此，「回歸祖國」的觀念必須摒棄，而改用「主權移交」的觀念，因為中英雙方並未詢問香港人的意見就簽訂《中英聯合聲明》，安排香港的主權移交，「回歸」乃至「民主回歸」的說法，只是政治灌輸而已。況且，面對中共的種種削弱香港自治、殖民香港的政策，民間束手無策，只有被動接受。香港是現代社會，民間團體活躍，然而由於香港沒有代表整體利益的民主鬥爭意識，很多激進政黨和社會福利機構、社工等，為了團體的生存，變成爭取界別利益的小團體（sectorian groups），例如面對大陸新移民問題，有些社運團體或政黨以反對族群歧視的政治正確的尚方寶劍，無條件支持新移民

來港，博取有投票權或即將有投票權的新移民票源和福利個案顧客（clients），以維繫自己的界別生存，忽視整體香港的福祉。由於缺乏共同的利益意識，香港人的利益除了被地產霸權、官商勾結蠶食，也會被各種打着正義和為民請命的激進小團體出賣。

香港民主派在二〇一〇年政制改革爭議的舉動，背棄選民，向中共投誠，選民可目睹政黨缺乏整體利益而謀求政黨生存的變化，嚇得目瞪口呆。民主黨的修改建議，是容許在立法會的功能組別當中，增加區議會組別，用市民一人一票的方式投票予競選的區議員，表面是增加了功能組別的投票人，但實質是將功能組別合法化、恆久化了。新增的區議會議席，提名權和參選權都不在市民手上，市民只有投票權，這並非全部的選舉權利，而區議員在功能組別的份額多了之後，反過來增加了功能組別的合法性。由英治政府馴養出來的民主派，原是民意的和平代理人，代理市民的民主和民生議題的鬥爭，轉化市民的鬥爭，宣洩怨氣，使之趨向和平，屈服於政府設想的程序理性和治安秩序。如今冒進投共，即用文辭蒙蔽民智，說民主制度的精神就是包容。寬容或包容，是在野黨、無權力的小市民向政府要求的，不是有權勢或即將執掌權力的政黨向選民要求的。香港民主黨說「民主就是包容」，簡直荒天下之大謬！從事幾十年民主運動，也弄不清基本概念。+

+ 參閱陳雲〈民主就是不包容〉，《蘋果日報》，二〇一〇年七月十五日。

英國殖民者收編香港社運人士、政客和政團，靠的是「行政吸納」（administrative assimilation），即是擴大諮詢組織，舉辦民意論壇，開放政務官位，廣納言路，廣招人才，將外在的、街頭的政治爭議化為內部的、會議室之內的行政討論，這樣可以消弭鬥爭意識，可以吸收異見，有利統治。中共比英國殖民者更無能、或更惡毒，用的是治安之術：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為抗爭行動封頂，卻拂逆民意，無視於抗爭者的訴求，一旦抗爭者採象徵式的武力來引起民眾關注——如扔蕉、搶奪微音器（搶咪）、掃檯、衝擊警察封鎖線的鐵馬之類，便將反對者、異議者打壓，醜化為非法抗爭、暴力抗爭，試圖將之圍困、孤立和消滅，然後「加大力度」鼓吹治安論，正如中共用「尋釁滋事」罪來對付內地的維權人士一樣的來對付香港抗爭者，使香港社會「非政治化」，瓦解香港人的政治意識，使得土共、紅色資本家和地產霸權成為維護香港治安的主流力量，意圖行其高壓統治和瘋狂剝削。這是兩種殖民主義的比對，前一種是工業時代的，後一種是金融資本主義時代的。前一種依然要依靠本土的實體經濟生產力，並且建立了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後一種則不須依賴本土實體經濟生產力，只須壓住本土的工人階級，使之提供良好治安秩序，提供跨境金融操作和跨貨幣剝削的社會基礎。[十一]

警務處長曾偉雄上台之後，特別是二〇一一年七一遊行之後，中共命令香港警方開動維穩機器，以為可以將香港即將爆發的動亂在萌芽階段捏死，但中共太樂觀了。開動維穩機器，會犧牲香

港的法治和警察的政治中立[十二]，這最終會危及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況且，一旦社運領袖和言論領袖被打壓，社會抗爭會趨向零星化和暴力化，如大陸各地失去理性領導的暴力事件一樣。這些零星的暴力衝突當然可以被香港警方當作「治安事件」來強硬處理。但香港資訊流通自由，而且香港人也不如大陸人的好欺負。中共將香港政治「治安化」的做法，最終會丟失香港。

為甚麼港共會在民主黨投共之後，加強打壓示威者，並強力推出愛國教育、猛力禁制新聞採訪自由？港共加強打壓並以刑法、治安論來對付抗爭者，是否引起香港抗爭者作更為團結和激烈的鬥爭，視乎抗爭者可以集結多少勢力、民間政團是否居於同一陣線。民主黨在二〇一〇年的政制改革方案之中投共，引起香港抗共的陣營出現思想軟化與疑惑，而民主黨依然包攬一大批溫軟的香港中產[十三]，此可以分化香港人的抗爭意志，而令中共認為可以加強打壓異己。內地抗爭很多是以自殘的方式進行，如自焚、斷指、跳樓等，而不採取積極的、團結的鬥爭動員，這是因為極權

十一．順帶一提，筆者的看家本領是文體學（stylistics），這段論說散文，用了馬克思（Karl Marx）的德文散文風格，類似英文的精密散文（compact prose）。洋化中文要寫成這樣才好。

十二．如選擇性檢控示威者，如納粹黨一般的採取快速司法程序（Schnellverfahren），如二〇一一年九月二十一日，早上派遣警察部的重案組逮捕梁國雄、黃洋達等闖入「立法會遞補機制」諮詢論壇或自行上台演講的示威者，下午馬上提堂。

十三．那一批乘坐香港經濟起飛而得位得利的香港中產，並未承擔市民階級的責任，爭取自由民主，對抗極權，很多只是冷漠，或為家庭謀後路，甚至對於公義之事冷嘲熱諷。這是難民自保心態而來的政治無力感，或是經歷政治挫折而在心中鬱結良久，形成犬儒心態。

體制將人民臣化、奴化為原子般的個體，只能自己行動。[十四] 香港的公民社會，一向以共同宣言的方式示威抗議，殘酷打壓的方式引進香港，一個可能是集體反彈，另一個可能是退化至零星的、暴力的，或是自殘式的抗爭。這要看將來的情勢，也要看香港人的意志與識見。

香港淪亡，中共陪葬。如何突破中共的治安論？如何攻破中共以刑事罪名對付示威者？好簡單，就是不怕。不怕敵方抹黑，就怕敵方抹得不夠黑。不怕香港亂，最怕香港不夠亂。中共看穿了香港中產怕死之心，保存香港之心，但對於中共這種流氓政權，只要有與敵同死之心，他們便會忌你三分。比起香港人，中共更加需要一個治安良好的香港，以便維持跨境金融剝削，一旦中共不能跨境剝削（上市融資、發行新股、賣債券⋯⋯），中共便會給債務危機拖死。

中共是歹毒但愚笨的政權（歹毒的人，豈能不愚笨呢？）。它用治安論來統治香港，正正就是示人以弱——中共最怕香港治安大亂。只要你不怕死，莫說是中共，閻羅王都怕了你。港共抹黑示威者暴力之類，就是抹黑香港的治安。他們預計了示威者會辯護，恢復香港的治安名譽的。但是，只要示威者不辯護，坦然接受治安已經破壞了，香港大亂了。政府就自己捉弄自己。況且，中共淪亡，財產和人才都會歸到香港來！而香港由於有戰略

價值，一定有英美扶持，馬上崛起，而且接收中國的逃逸資本和人才。這是香港不怕死，也死得過的原因。即使香港淪亡，也只是一時的，城邦復興得很快，國家淪亡，就起碼四分五裂，亂足一百年。故此，以相互博弈而論，香港死得過的。

寄語港共：不要再玩弄治安論了。執法者也要醒覺：服從殘暴的命令，猶如同魔鬼做交易，得到的是一時的生計，失去的是永久的靈魂。正義人民當下的唾罵，歷史或法律在將來的清算，地獄的最終劫火，都在等待兇殘無道的人。不要以為行事沒有報應，不要以為地獄不存在，到知道的時候，便知道贖罪原來也沒有用。

受魔鬼的試探，與魔鬼交易，這是《浮士德》（*Faust*）的主旨，是人類恆久要面對的問題。我絕不會同情或諒解那些執行惡毒命令的香港警察，正如我不會同情那些與魔鬼打交道的人。他們必會自作自受；至於那些命令來自香港或來自北京，這是他們自己要交代的事，也不是我要諒解的事。

十四．內地作者胡泳《草根起義》一書提到此觀點。感謝網友介紹及評論此書。《草根起義》，葉蔭聰編著，香港：上書局，二〇一一。

（四）蠱惑之言：與祖國融合與邊緣化

九七以後，以紅色資本家、紅色學者和紅色官員為首的一群人，鼓吹香港邊緣論，說上海、甚至廣州即將取代香港，香港要邊緣化了。要解決香港邊緣化的危機，必須融入大陸，與珠三角結合，投入CEPA（中國內地與香港更緊密經濟合作的安排），參與國家的「十二．五」規劃之類。危言聳聽，不外乎說是香港由於缺乏天然資源，全賴中共不斷救濟香港，給香港各種生意機會，也勒住了上海和廣州、深圳，香港方能苟延殘存，香港人始可有一口飯食。

九七之初，邊緣化之言一出，香港社會恐慌。香港人不懂得，香港一向都是邊緣，正是因為邊緣，才可以獨力發展自己的優勢，成為國際城市，以大陸、東北亞、南洋甚至台灣、日本和韓國為香港的貿易腹地。香港政治買辦大力推行，高呼「背靠祖國，面向國際」的口號，一方面擺出平息謠言的姿態，另一方面則煽動香港人北上創業，將資金、設備和人員投放大陸，支援大陸經濟發展。大陸吸收了香港人的資金、知識和國際關係網絡之後，將香港人一腳踢開。這些香港人回到香港，終會告訴香港城邦的同胞，內地是甚麼樣的社會，香港人又要如何自處。

以前國人回中國，投身政治或實業，叫「貢獻」，不叫發展的。九七之後的北上發展論、融入中國之論，是欺誠之詞，不但沖淡港人的愛國熱誠，貼上求取私利的標籤，令回國獻身服務也變成經濟活動了。[十五] 這是消解華僑革命意識之舉。

北上並無解決香港經濟規模單調，反而扼殺本港行業之生存空間、耗損本地人才和剝奪本地產業升階的機會。中國內地並非經濟發達之區，而是經濟與制度落後之區，香港企業和香港專業人員北上，不是甚麼「發展」，只是延展、擴張、遷移。我們知道，企業的不當擴張，會導致企業倒閉。企業的對外投資，如果沒有本國的堅實支援（如美國對海外投資的各項支援），終會被資金接收之國吞沒。香港企業在大陸的延展、擴張與遷移的過程之中，儘管會撈到一點眼前利益，但會丟失本身的技術水平和道德水平，與大陸同流合污，造假混騙，撈到好處，卻沾染惡習，與國際社會脫軌了。港企和港人北上貢獻，大陸會提升一點，但香港確是整體下降，而且將大陸的商業惡習帶回香港。所謂與「祖國融合」的政策，由於是出自企業利益和專業人士的個別利益，犧牲香港整體利益和行業利益，而香港政府在整個過程中並無維護本土利益，這無疑會危害香港利益。當中，有兩個方面足以毀滅香港一百七十年的基業。

十五．開放改革初期，香港人北上除了謀生之外，多少也有報國熱情，頗多是有辱而無榮的奉獻，落得一身債務而回香港的。

甲、**掏空香港實業，製造經濟依賴**：中共策動的港企北上，由製造業開始，到貿易代理、商業服務和金融後勤，一步步蠶食香港的業務，與大陸融合的政策，將徹底清洗香港本土經濟。即使所謂CEPA，也會有雙方承認資格和執業的條款，除了令到香港失去技術之外，還會導致大陸取得香港技術之後，南下開業。香港人在心理上依賴大陸之後，大陸可強行通過其他措施，瓦解香港社區，如與建高鐵、消滅邊界地區、跨區人口遷移等等。

乙、**傳播惡劣習慣，敗壞香港體制**：大陸的經濟開發模式，行政上靠的是縣市的獨立行政，經濟上靠的是土地出賣。縣市可以制定優惠政策，鼓勵外資凝聚產業，形成產業群落，取代發達地區的生產基地。另外，縣市無償取得的土地（共黨在建政時期充公了所有私人土地！），或靠武力迫遷得到的土地，變賣之後，成為行政經費。香港商人和專業人員在大陸經營之後，將沾染內地的官商勾結、行賄貪污、乃至侮辱下屬（如性騷擾）的惡劣風氣，並視之為促進經濟發達的「中國模式」，以為政府獨裁、企業獨裁是經濟發展的法門。在對待政府方面，這些投資大陸的商人，會視香港的民主諮詢程序、法治制衡制度為經濟發展的絆腳石，不斷鼓勵港府權宜行事，武力對付反對者，這會令香港體制倒退，令社會風氣閉塞而乖戾。

另一個香港紅色力量散播的理論，是與大陸接軌論。可是，香港與大陸接軌的結果，卻與國際脫軌了。全國一盤棋，攬住一齊

死。中港同歸於落後，不利於香港，也不利於中共。問題在於，中共出於政權顛覆的恐懼，要一下子毀滅香港有生力量的慾望，大於要扶持香港有生力量、長期吸取香港有生力量的慾望。香港城邦論，就是要令大家冷靜下來，利益雙方，長期發展。

（五）不必寄望共產黨會民主轉型

香港民主黨的立命基礎在民主統一論、民主融合論，六四慘案是民主統一論的創傷，卻令民主黨奇蹟復生，拿六四來大搞特搞，將六四變成香港民主運動的象徵，民主運動的封頂之作：看噢，香港人可以公開悼念六四，香港多麼的民主啊！

它要香港人回歸，要香港人愛國，要香港人承認是中國人，只是詭詞，中共其實並不追求終極，它其實深明過渡之論，才可以拖出了六十年的天下。中共是恆久處於過渡狀態的革命政府。溫家寶總理久不久就出來呼喚政治改革、體制改革，卻毫無寸進，其效果只不過是說，中共不會停留在目前的殘暴狀態的，中共會過渡到民主的。這種呼喚，六十幾年了，從建政之前的二十世紀

三十年代，一直呼喚到二十一世紀。這就是中共的民主過渡論。溫家寶言論的客觀效果，只不過演練中共的過渡論而已。也僅此而已。

中共政權的過渡論，是它統戰華人的利器。中共宣傳國家是在過渡之中，便振振有詞，要求人民求同存異，顧全大局，放下批評，暫時容忍人權和自由之剝奪，建設這個黨國。中共要求人民要諒解其殘暴行為，是為了爭取安全穩定來建設黨國。中共是恆久處於過渡狀態的臨時政權，它幾乎是人類有史以來最長期的過渡政權了。不要一廂情願，以為中共會自願結束這個過渡狀態而走到憲政共和。這個過渡狀態，正是中共專政的安樂窩。

民主過渡論的變調，是不斷進步論。在海外游說統戰的人往往這樣說：「我們中國，人口多，底子薄，列強環伺，好不容易熬到有現在的中興局面，各方面都要給予國家耐心，容許共產黨慢慢進步，要體諒國情艱難，不要一步登天。路要一步一步的走，飯要一口一口的吃。即使是逮捕異見分子，國家也比以前進步了、文明了。」

我的擬答，是：「有些進步是涉及國家資源的，要慢慢來，如醫療和福利。有些進步是不涉及資源的，反而可以節省國家資源的，如逮捕異見人士。逮捕異見人士是根本不應該的事情，這種

逮捕，有進步的可能嗎？往昔是逮捕之後槍決，後來是勞改，現在是行政拘留，這是在進步之中嗎？再進一步的話，是怎麼樣的逮捕呢？是不逮捕，而由黨報進行人格污衊嗎？這種進步，有指望嗎？」

文明國家，是不必時刻強調進步的，卻要在關鍵時刻，回顧立國時期的先賢的理念。如美國總統就職，一般都是回顧自由、個性和美國夢，不會一味叫人民去進步的。這才是文明國家。叫人民去進步，其實是叫人民去遺忘過去政府的罪過。王朝中國，也不是強調進步的，而是回顧周文王時代的禮樂文明的，是不斷以古人之聖德，懺悔現今的罪過的。

香港的民主派沉迷於民主統一中國，在行動上無法全然代表香港人利益，與中共攤牌。二〇一〇年，政改一役，民主統一派的圖騰司徒華甚至帶領民主黨出賣香港的民主原則，他死後得到中共的讚譽。在民主統一中國的議程上，泛民與民建聯其實並無二致。彼此都是讚同民主統一，只是泛民大罵小鬧，而民建聯抑忍批評。當泛民減少吵鬧，或當民建聯諫諍中共，民主派和民建聯的政黨行為會歸於合流，令香港人無法選擇。

這是昧於事實的做法。熟悉香港歷史者，當知中共建政以來，一直破壞香港建立民主制度。英國戰後為順應殖民地自治的

潮流，早已準備香港給予香港市民民主選舉（如楊慕琦計劃），籌備設立市議會（Municipal Council）[十六]，由市議會支配公共服務，之所以沒有在香港實現民主，是當年恐懼中共滲透，故此擱置在香港啟動民選。彭定康推動民主，將功能組別變相一人一票，中共也反對。

民主統一論之能夠打動香港人，是因為香港人思想懶惰，這麼多年來也沒有發展出一套可行的民主理論，來取代民主派的論述。民主派也不真的是壞，只是蠢。為了避免中共將香港的民主派劃為「敵我矛盾」，香港的民主派便天真地認為，只要堅持民主統一中國、香港民主回歸和融合中國，中共就不會打擊民主派，將民主派劃歸「人民內部矛盾」，不是「敵我矛盾」了。誰不知，劃歸「人民內部矛盾」，只是等待收拾的家奴。被中共劃為敵我矛盾的，還會得到一點尊重和優惠。

中共的暴亂目前零星爆發，總有跨地區大幅度進行的一日，債務危機、天災、地震、核電廠爆炸，很多原因都可以引致民眾暴動亂或軍閥割據。到時恐怕想也來不及，中共已經要求國際參與，保證香港成為軍事中立區，不受內亂影響，香港被迫邁向自治。而即使大陸不發生民變或軍變，中共有一日想通了，放手成全香港自治，它得到的好處，遠遠大於直接統治香港，將香港弄死。到時只要香港的民主派，不要傻到要上街示威，反對中共賦予香港自治身份就好。

（六）大陸人並不是
你想像中的善良同胞

網上Youtube流傳一則〈殘忍！活體吊飾龜魚裝密封袋〉之片段。[十七] 片段中大陸奸商滅絕人性，用細小的塑膠袋密封養動物為鏈墜首飾，販賣圖利。由於密封袋所存氧氣有限，小動物最多生存一兩天。奸商行為固然令人髮指，更可怕的是旁觀者竟然與奮雀躍。他們是慣見的中國人民，模樣和聲線超可愛的、天真無邪的，並不是特別邪惡的。然而當記者問及他們感覺如何，「善良」的中國民豎起拇指答：「超好玩，太開心了！」古今中外的

十六・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香港重光。英國重新接管香港半年以後，曾遭日軍俘虜之楊慕琦（Sir Mark Young）在一九四六五月一日復任香港總督，結束英國的臨時軍法管治。由於在二戰結束前，倫敦當局承諾於戰後容許其殖民地擁有高度自治權以至獨立，工黨上台後，倫敦當局落實承諾。楊慕琦於同年八月二十八日大膽發表一份政治制度改革方案，希望「香港市民有更多責任去管理自己的事務」。楊慕琦開始向市民諮詢，於同年十月在立法局上推出政治改革議案，倡議設立市議會（Municipal Council），管理香港公共事務，當中三分之二為民選議員，其餘為官方委任。構想中的市議會接管當時市政局的功能，保留名稱，另外負責消防、康樂場地、娛樂場所牌照及車輛牌照，日後再管理教育、社會福利、警務及公共工程。市議會之管轄區域將逐步由港九市區擴大至香港全境，儼如城邦議會。配合方案，立法局亦會民主化。方案推出之後，通稱「楊慕琦計劃」（Young Plan）。雖然一九四七年英國殖民地部通過提案，但一九四九年香港立法局曾一度否決動議，認為市議會將在政治上與立法局權力重疊。改革方案終因國共內戰、大批難民湧入、香港前景不明而被倫敦擱置。共產中國建立之後，鑒於戰後東西方冷戰而香港夾於其中，香港必須由英國操持，以免中共滲透議會，一九五二年十月，英國下議院正式宣布放棄計劃。然而，此擱置之城邦自治計劃，仍成為日後市政局民主化及香港走向開放自由的潛在動力。

十七・來自台灣的東森新聞報道：http://www.youtube.com/watch?v=JeIRQX5qraw

語言裡面，找不到任何的修辭來形容這些麻木不仁之民。另一則，是大陸的富人將寵物犬染色改造，變成熊貓、老虎、駱駝、馬等形狀，而且在河南鄭州的公園展覽。[十八]此外，大陸女子當街被淫辱之事，司空見慣，公路撞傷人，為免賠償過多，索性倒車將傷者輾死，甚至如藥家鑫般的向被撞的農婦連刺八刀滅口[十九]，已經是公路常理。

二〇一一年十月十五日，廣州電台有則新聞報道：「兩車碾爛女童下半身冷血行人路過不屑一顧」。新聞如下：「廣東佛山黃岐的廣佛五金城內，兩歲女孩王悅在市場玩耍，一輛麵包車把她撞倒在地，前輪壓過，司機又加油門，後輪從女童身上壓過，以期殺死傷者減低賠償，女孩躺在路中心動彈不得，但尚有生命跡象。期間路人經過，無動於衷。幾分鐘過後，一輛貨車再次從小女孩身上碾過，此時已經奄奄一息的小女孩不停地揮動着兩隻小手，似乎在向路人求救。但冷漠的路人依然不顧而去，期間還有不少車輛經過，十分危險。七分鐘之內，共有十八位路人經過，甚至還有帶着小孩的母親，也有停下來看熱鬧的車主，但卻沒有一位願意拉小女孩一把，也沒有人拿起手機打電話報警，任由女孩在原地痛苦地呻吟，任由車輛從她身邊經過。最後是一位拾荒婦將小女孩從路中心抱到路邊，向店鋪找電話求助也不得，最後等到女孩母親出現。小孩的下半身，已是軟癱如泥。」[二十]

兩歲兒童倒臥街頭，如一件不斷被汽車輾過的貨物。南方電視的報道員，痛斥大陸社會無人性。傳統中國，不會發生這種見死不救的事，城市人即使不是人人出手，總會在旁守候，做出個隨時可以幫忙的樣子來，鄉下人甚至先把壞人拿住，毒打之後再送官的。假裝看不見女童輾爛的身體的大陸人，那種無視別人在死亡邊緣掙扎的冷漠，只有在日日目睹殘暴事情發生的社會才會有的吧。

經歷六十年暴政，特別是文革的道德大崩壞、公義大摧折，大陸人彷如活在不見公義的地獄。大陸經常發生救人而被傷者趁機敲詐勒索之事。二〇〇六年，南京男子彭宇好心扶起一位跌倒的老婦，不料老婦送院後反咬彭撞倒她，告上法院，索賠十四萬元。法官判彭宇賠償，所持的理由，是彭宇應該理虧，否則不會主動送老

十八・一日扮熊貓，一世做熊貓。很多染色有毒，而且很難洗脱，要洗脱也要經過痛苦而有毒的漂白過程，可謂造假而不仁。參閱 "The dog that's just dyeing to be a tiger: How Chinese owners turn their pets into exotic wildlife in new craze," *Daily Mail*, 9th June 2010. http://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1284646/Meet-Tiger-Dog-Chinese-owners-dye-pets-look-like-wild-animals.html#ixzz1ZuFFtYD

十九・殺人犯已定罪，乃西安的大學生。〈開車撞傷農婦 連刺8刀滅口〉，《揚子晚報》，二〇一一年六月九日。

二十・那位憐愛受傷小孩的拾荒婦名陳賢妹，五十八歲，廣東清遠人，猶如新約聖經路加福音十章二五節所述的撒瑪利亞人。事發於二〇一一年十月十三日。本文的記述，綜合來自《南方都市報》網站：「佛山兩歲小女孩掙扎血泊中 18路人冷淡走過去」，二〇一一年十月十六日。香港《東方日報》列為頭條新聞，〈冷血的中國人〉，二〇一一年十月十七日。同日，美國CNN電視台、《紐約時報》及《華盛頓時報》，英國BBC電視台、《衛報》及《每日電訊報》、日本NHK及《產經新聞》等，均有報道此事。十月二十一日，該女童終告不治。

婦入院，頂多是告知她家人來接她。二十一 法官認為仗義行善不符合民情，幫人該有個限度，他也講得對，可惜彭宇是例外。

也有歹徒假借老人仆倒街頭，勒詐好心扶起的路人，令人人提防，給大陸人的冷漠和無助，添了藉口。大陸的民法是合理的，世上也無國家夠膽訂立懲罰忠良的法律，但執法人員和司法人員辦事粗疏，判錯案件往往無法上訴得直，一般人害怕誣告，令歹徒勒索容易得逞。中共當局也經常設計，用「釣魚局」陷害仗義者，例如公安在公路假扮途人遇上困難，招手求助，然後控告司機非法載客。據說也有公安將圍觀聲援執法受害人的仗義市民錄像，事後逮捕。二十二 替毒奶案受害者抱打不平的趙連海義士，也被收監。放在以前，中共頂多是私下禁制趙連海，不會告上法庭判刑的。中國的官署、公安和法院都變得不可理喻，信不過，人民怕管閒事，不敢出頭。

《蘋果日報》報道，貴州公安局對付不甘心被政府逼遷之少女，將之關入公安局脫衣凌辱，女子裸奔出街，眾人圍觀，無人施以援手，連給衣服或報紙遮蓋的也無，女子全身赤裸倒臥街頭，民眾擾攘之後，公安局派員抓走女子。以報上刊登該女子身材之豐美，後果不堪設想。二十三 至於內地旅客縱容小童在香港商場大便，在地鐵車廂小便二十四，更是司空見慣，他們就如土匪打入金鑾殿，撒尿示威也。

地獄鬼國，匪黨賊民。中共是蘇聯境外殘餘的法西斯殖民政權，本性有如失去故鄉的盜匪、外太空投擲到地球的病毒。成立革命黨至今，中共做盡了冠絕古今、慘絕人寰的兇殘事，但從未悔改，只會在勢力強大之後變得更兇惡。被中共殘害幾代的大陸人，都因為幾代人啞忍暴虐而扭曲本性，成為中共的合謀人。為甚麼中共可以統治中國，為甚麼中國人可以容忍中共的暴政，甚至那麼多中國人在面對六四屠殺的時候依然甘於忘記血案，繼續默許中共執政，默許中共用思想洗腦來荼毒他們的子弟？這是單方面的政治壓迫嗎？人民是無辜的嗎？沒有人民的共謀，這種殘暴統治可能持續六十年嗎？

二十一．參閱維基百科的條目「南京彭宇案」。另《明報》社論認為，「一審法官犯錯，在彭宇提請上訴二審時，透過二審法官糾正錯誤，可以正視聽，釐清混淆，民眾不用再忌憚好人好事。可是在二審期間，彭宇與徐女士經當局大力運作協調下，達成和解，內容則秘而不宣。這樣，彭宇自稱好心救人，卻要賠償受助人，究竟真相如何，變成一個未解之謎。」〈小悅悅慘死，怎樣才能重整道德喚回良知？〉二〇一一年十月二十二日。

二十二．二〇一一年八月十九日晚上，濟南山大路發生有一千多名市民圍住當時毆打修車工人的女獄警林娜，一百多便衣員警混入錄影，事後根據錄影跟蹤在事件中正義感強的出頭者，抓捕六名，處以刑事行政拘留十日不等。〈濟南女獄警下跪事件：警方報復抓圍觀群眾拘留〉博訊，北京時間二〇一一年十月十五日首發。

二十三．〈維權女遭公安脫光 當街裸奔〉，《蘋果日報》，二〇一一年九月七日。報紙說該女子是維權女，實屬錯誤，她只是一般受害人，並非抗爭的領導者。

二十四．新聞見〈內地童港鐵車廂屎尿〉，《蘋果日報》，二〇一一年九月二十一日。

無悔意的殘暴，是中共統治的心法。中共為人民帶來無盡的挫敗和創傷，最終成為不可以脫離加害者而獨存的受害人，牢牢地成為賊夥，成為賊國的一分子。國民經歷傷痛之後的心靈創傷後，無法解釋事實如何可以發生，經常要找人辯解，卻無法面對痛苦，欲言又止，其他人想爭取民主和公義，這些受過創痛的人又恐怕人家被人陷害，於是將自己的經歷奉為教訓，勸解人家不要碰中國的政治事情。人家真的要碰，他們便心生傲慢，看不起那些沒有經歷過殘暴的其他人民：這些香港人、美國人太天真了，沒領教過中國共產黨的厲害。於是又有點喜歡自己的創傷，又有些喜歡當年創傷自己的人——共產黨了。[二十五]

人活在謊言與邪惡之中，渾身不舒服，我們希望香港可以保存元氣，等大陸人來看看，恢復仁愛的信心。當然，首先是香港要懂得自保和自愛。我辱罵中共的目的，並非真的憎恨它，也不是存心侮辱大陸人，而是要香港人知道保存自己的優先次序，而且要與大陸保持距離。仁愛始終是人類最大的動力。一旦憎恨中共，就着了魔，走不出來的。好的做法，是中共與我無關、中國與我無關（irrelevant）。我幫不幫忙，是出自我的仁愛，並非出自甚麼國民義務或責任。

由於中共不獨無心做好行憲的準備，而且各方面防範中國走向憲政，故此多年來將一切可能的反對勢力「扼殺於萌芽狀態之中」。自從江澤民政府在一九九九年遭到法輪功的攻擊之後[二十六]，

中共惶恐，原來悔罪的力量這麼大，民眾受到心靈感召的力量這麼大。故此，現在中共的維穩之策主要是三個重點：嚴密防範有聚眾能力的宗教活動、禁止民間結社組黨、嚴厲防止外國在中國策動顏色革命。殘酷的統治需要對殘酷麻木不仁的老百姓，共產黨堅決不認錯、不道歉，扼殺治下人民治療的機會，賊頭和賊夥組成的國家，是不會開出民主憲政的。由此可判斷，大陸是一場沒完沒了的瘟疫。大陸創傷不斷而政府從不治理，要將來的民主政府治理大陸人的心靈創傷，要耶穌基督或佛陀菩薩再世也！

討論大陸人的病態，一方面我是勸告香港人不要插手大陸事務，另一方面則要探討香港族群意識。有些新移民來了香港，卻支持共產黨極權政府，反對自由民主及不服膺現代價值，卻領取香港福利及佔用公共資源，反過來對付香港人，蠶食香港的價值，令香港走向衰亡。拙見以為，除了直系子女和夫妻之外，新移民須經香港政府甄選才可以取得香港居留權，香港要繁榮穩定，必須保證自己的政治安全和資源安全，必須取回這個權力。面對新移民，不是「利」的問題，而是「義」的問題。假如

二十五．筆者留學德國期間，德國政府和民間教育者（包括作家）在戰後下了苦功，治理納粹黨的創傷。故此我隨口可以講出這些受過創痛的民眾的心理。

二十六．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幾萬名法輪功學員和平上訪中南海，在靜默之中，包圍中南海，事情毫無先兆，震驚中外。

新移民願意信服自由民主這些香港《基本法》憲政精神及跟隨香港的風俗文化，甚至革新香港的風俗文化（往好的方面），我贊成政府給予福利補貼及優惠照顧，令他們順利融入香港，好好培育。為了照顧移民，不使他們變成備受冷待和剝削的一群，必須限制類額。

上面的論述，只是用了極其淺白的盧梭的《民約論》，公民之間以理智的締約而結盟。至於一出生下來便成為公民的人，例如土生的港人，由於是在理智建立之前已經被投擲進這個世界，是可以批判社會和改革制度的。入了香港籍之後，也可以在憲政之下或行使抗命權，批評政府、批評香港人，改革香港的社會制度，不論是走向民主還是極權、還是投共。這是自由選擇。然而，在入籍之前，香港政府有權力選擇何人可以入籍，也有責任告訴那些申請入籍的人，香港是甚麼樣的社會，他們要入籍，便要先認同這個社會。入籍之後，如果發現不對路，可以脫離，或從事抗爭。

至於身處內地的大陸人，大可不必理會。除非香港人自我作賤，否則你不會視這些在大陸尋常慣見的人為同胞，而且愚昧到與他們作民主融合。也除非閣下是地藏菩薩，否則你應該承認：你沒有教化他們的愛心或本領。

（七）對於香港，民主中國比共產黨專政更危險

「民主中國」的設想，乃民主統一派號召港人的意識形態。很多人以為中國民主化之後，一切就會變得美好，香港與大陸便能共享榮華。從政治上分析，這種想法並不可靠，事態之發展，甚至背道而馳。

急速民主化的中國，比起極權的中共，更能危害香港。由於香港未完成民主憲政及族群身份論述，一旦大陸取得急速民主而完成國族論述，香港將被佔盡道德高地，無法拒絕大陸的融合和苛索。中共在轉型或解體期間，資本必會逃逸，香港的龐大儲備和金融能量，將是民主中國覬覦的禁臠。一九九〇年，西德民主統一或融合東德，西德的人口、版圖大於東德，而憲政及國族論述早已完成，尚且耗費巨資，香港比起西德，可謂無能為力。

中國這部戰爭機器由國際屈辱、受害者情意結、生存空間緊迫、喪失領土的憤恨、對國際道義的不信任、工業紀律社會、中產階級的心靈狹窄、大企業家的愛國衝動、企業產力迅速增長但大量青年就業困難所組成。這九大因素，就是納粹德國成長的政治和社會基礎。現在可在中國大陸見其端倪。中文譯為納粹主義的，原名

「國家社會主義」（Nationalsozialismus），簡稱Nazi，是法西斯主義與軍國主義的極致。「國家社會主義」相信民族實力，不信任公民個性，相信國家權威與集體力量，不信任普世公義。

中國急速民主之後，很有可能滑入法西斯軍國主義，由「中共法西斯」變成「中國法西斯」，香港必須警惕，切勿將香港人的福祉押在民主的中國身上。香港的民主統一派，由於毫無當家執政思想，並無設想到萬一中國急速建立民主政府，以那群對香港充滿憤恨和索償心理的大陸人，是會蹂躪和虐殺香港的——包括香港數目超越男人的「港女」。中國一旦急速民主化，催生了法西斯軍國主義政府，四處揚威耀武，香港的劫難才真正開始。例如強制歸化中國籍、補回徵稅、上繳儲備金，徵用碼頭、鐵路和飛機場應付戰爭。即使徵用香港女人，也可以用民主手段做到：民主議會通過法令，以國民教育為名，規定香港少男少女要在中五畢業的時候，強制到大陸參加官方指定的勞動服務，當作是愛國教育的一部分，教官審核服務滿意之後，可免除服兵役，服務不滿意，便強制再服兵役。這才是法西斯的民主專政技術，以多數人的暴政（tyranny of the majority）之名。目前中共仍未可以用此技術，是因為政權欠缺合法性，無法激起官僚的科學理性能力而已。到時，香港無從拒絕大陸人來港。國際社會也毫無道德感召力來制裁民主中國政府。

不少市民眼看大陸人搶購民初國語課本、幼兒入塾讀經典之風、北大校園驚現六四塗鴉，故認為新一代不乏開明之士。民主是百年之盛業，國民道德建設，更是幾百年的大業。在凶險的現代社會，仁心與理想只能當作道德原則，是萬萬不能用作現實政治的操作原則的。為了保護香港，必須設想大陸發生最壞的民主政治。即是說，香港必須搶奪先機，保住文明根基，然後與大陸的民主政治互動。而不是將香港的命運付託於民主中國，因為民主中國之吉凶未卜也。意大利人個性散漫（得罪了！），不服集體領導，以做事亂七八糟聞名全歐，墨索里尼仍能奪取政權，法西斯因而冒起。雖則二次大戰中意大利不足為患，那些日子民眾借法西斯之名胡作非為都夠受了。這就是民主統一的政治現實。

從精神分析的角度看來，民主統一派不斷號召港人相信「民主中國」的投想，實在只是「動作搬演」（acting out）：不斷的重複祈求的動作，就以為完成工作了。[二十七] 因於中共無意平反六四，中共一直不聽呼籲，民主派一直呼籲，二十幾年重複下來，要求中共平反六四的動作便成為最高的行為模範了。六四屠殺後，「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聯合會」（支聯會）每年維持了大型悼念六四運動，堅持平反六四，建立民主中國。大陸人因啞忍暴虐而扭曲本性，不肯冒着被中共迫害的風險，故活動只能在

二十七・這是來自拉岡（Jacques Lacan）的精神分析理論。

香港舉行。支聯會成立之初，非常在意中共的看法，於是在組織名稱冠以「愛國」之名，並以此來取代中共諒解。由於支聯會與民主黨的領導人員重疊，舉辦單位便將香港爭取民主和譴責中共血腥鎮壓六四的民眾標籤為愛國市民，由愛國市民悼念六四並同場高呼爭取香港普選，民主回歸論便在六四悼念的場所「道成肉身」、彷彿變為真實的香港市民心聲了。

民主統一派的詮釋，無法觸及香港人的根本要求。參加六四集會乃譴責中共反人類罪行，而爭取普選權利，乃由於憲法早已賦予香港的，故此該項集會與爭取普選並無瓜葛，香港爭取到普選也無助於六四的平反。出現上述病症，乃由於民主黨人的政治盤算，將兩個議程捆綁，在為六四流淚之中爭取普選，結果反而令香港人無端端遭受心靈創傷：以為香港的民主如六四天安門慘劇一般，已經被中共鎮壓了！中共默許香港民主派舉辦六四悼念集會，並在二〇一〇年正式公開招安民主黨，其伏線在此！

警醒那些愛國民主派，不要再葉公好龍了，民主中國的巨龍，是會吞噬香港的。目前中共只是部分法西斯，一旦轉型或倒台之後，新政府有了民主授權和國族論述（nationalism），那才是真正的法西斯暴政或軍國主義（如納粹黨）：瘋狂建設、愛國豪情、壓制弱勢、領土擴張、四方攻略。極權的中共，令大陸背負政治原罪，不敢對香港動粗。香港人要趁早完成一國兩制的自治建設，也要中共接納香港的城邦身份，在亂世互相保護。

(八)城邦意識有助實踐一國兩制

由於中共並非正朔，香港人即使抱持中國意識，亦無助於理解香港問題，解決香港問題，反而會衍生中港同構、互相腐敗，或者反共救國、反共復國、民主建國等問題，增加中港之間的衝突，無法做得良性互動、互惠互利。處理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問題、香港的一國兩制的統治問題和一國兩制將來的走向，都必須重認香港的城邦自治歷史。中國和香港都必須正視香港的過渡狀態——自治城邦的狀態，將這個狀態好好認識和繼承下來，貢獻中華天下，而不是急於回歸到大中國意識，摧毀香港可貴的、也是中華共享的城邦傳統。做好起碼五十年的過渡狀態——中港分治的狀態，而不是一下子跳到終點——中華大一統，這是理解香港問題的重中之重。

香港的國際城市地位和香港人現代市民的身份，來自英國統治香港的一百五十餘年歷史，令香港與中國大陸有所區隔，避開歷次革命及時局動盪，令香港保存傳統中華文化及英國帶來的典章文明，期間香港接收歷次因中國災難而流亡的精英人口，並在關鍵時刻推動中國發展，如辛亥革命及開放改革。戰後由於東西方冷戰關係，香港獨立發展，形成整全的經濟地理格局，香港保

存大量農田及郊野綠地，發展工商貿易，並有自己的公共政策及各種制度。因為歐洲殖民者尊重地域文化差異，香港的粵語、典雅中文及嶺南風俗得到類似國家文化的對待而得以保存及弘揚，避過中共的文化滅絕運動。香港政府財政獨立，香港有自己的貨幣、護照、航權及國際身份，香港的典章文明、文化蘊藏、文化自主、經濟自主及政治高度自治的特性，使得香港具備城邦性格，可以為中國的現代化長期提供文化及制度之參考。

重認香港的城邦地位，繼續為中華推動香港城邦建設，有四個重點：

甲、一國兩制源自香港城邦

一九九七年香港主權移交中共之後，香港依照《基本法》實施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原則，其精神是傳承自英治時期的香港城邦格局，也服膺香港人的自由城邦市民的身份，並非憑空創造。香港目前的「國中之國」地位，其文化根基來自香港的城邦歷史。今後香港要實踐高度自治，文化上必須傳承過往香港的城邦歷史，而香港人必須敦促政府尊重香港城邦的地理整體性和文化主體性，在人口、教育、產業等政策，保持警惕，避免傷害本土利益，避免因為與大陸作地理、交通及移民等安排而損害香港的城邦格局。

乙、城邦性格確保一國兩制得以實踐

由於香港的行政長官仍未由香港人一人一票選出，立法議會也並未全面直選，況且《基本法》規定行政長官不可有政黨隸屬，故此港府之施政，並不能在制度上尊重香港本土利益及保護香港的城邦格局。在區域規劃（如宜居灣區規劃及鼓勵香港窮人內遷大陸）、跨境交通（如高鐵）、移民（無限度接受大陸孕婦產子及賦予其子女的香港居民身份）、教育（濫施普通話教中文及愛國教育）、產業（不能有效限制外地人購買香港樓房地產）、食物安全（不發展香港食水自給及農產自保）等方面，幾乎放任自流。

面對大陸龐大的人口與資金總量，假如香港不能採取有效的防護措施，則香港的城邦格局必會遭到滅絕，損害香港人利益，也間接令中國失去寶貴的制度參考及文化資源。

丙、城邦性格可以確保公共政策具備本土意識

在英治時期，香港的公共政策的考慮，必然以香港人為依歸。在主權移交之後，由於實施一國兩制，香港內務依然由港府全權處理，政府公帑依然用於本土市民。此政治自治之原則，理應無所改變。然而，事實並非如此。舉例，在大陸孕婦來港產子及其子女獲得香港居民身份的事件上，港府除了用機械性的資源調配

來考慮移民政策之外，喪失應有的政策判斷。每一位外來人口成為香港居民的時候，都會影響香港人口的構成及文化格局，港府必須以城邦自治的政治判斷來考慮問題（led by politics），確保香港全權處理內地移民的審批權，而不是用資源庫存來看待問題（driven by resources），否則必然出現以下的荒謬判斷：產房床位緊缺的公立醫院拒收大陸孕婦，但面臨殺校的中小學校，卻熱烈期待跨境學童來港就學。

其次，二〇一〇年財政預算案發放六千元予香港居民的時候，也因為港府缺乏城邦身份的認同，無法斷然拒絕不具備香港居民身份的新移民取得此六千元的權利（他們當中有經濟困難的可以循其他途徑取得救助）。香港社會並為此爭論不休。

其三，在接收外來移民的時候，並未有既定程序（可以是自願參與的），使其認同香港憲法精神及具備香港基本的文化風俗知識，並宣誓入籍。此影響了外地移民的文化融合，令他們沒有一個方法來取得文化身份，與本地人看齊，而要背負大陸人或新移民的標籤。

丁、香港必須展開城邦自治運動

一國兩制、香港城邦意識需要公民參與，官命互相提點，互相扶持，才可以同心同德，繼續建設香港。香港城邦自治運動是

根據一國兩制觀念和香港《基本法》憲政秩序的本土意識促進運動，敦促香港政府在制定各種公共政策和特別行政措施的時候（例如限制大陸孕婦來港產子），必須優先顧及香港人，以本土利益為本，在與中央或其他地方政府交涉時，維護香港本土利益，並向香港人負責。換而言之，香港自治運動是肯定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既定原則，並監督港府遵行，維護香港人利益的本土公民運動，不是香港獨立運動。

香港是城邦，是東方專制主義沙漠中的歐式綠州。在此綠州的邊界，有重重的荊棘林。荊棘是醜陋的，但在沙漠邊緣的荊棘林，卻有抵擋風沙的作用。香港要的是照顧好防沙的荊棘林，不是要改造北方的沙漠。香港需要一個深明其利益所在的、而又體認和尊重香港利益的中共，香港人只想自保，不是要推翻中共，改造中國。這就是香港的現實政治。

第二章

非國亦非市，香港是城邦

（一）香港城邦與中國命運

（二）歐洲的城邦：古希臘城邦、漢撒同盟市與殖民地城邦

（三）城邦與商人政治

（四）亞洲的城邦：租界與殖民地

（五）城邦的後繼者：英帝國成立的亞洲城邦組群

（六）城邦結盟促成聯邦制度

（七）香港城邦的政治：締約政治與商人參政

（八）香港人的城邦文化

（九）轉化族群政治，發揚城邦精神

(一)香港城邦與中國命運

未立國族（nation），先定城邦（city-state）。城邦是人才、資金、財貨、文化風俗和學術知識的集散地，城邦不成國家，但一地、一國能有城邦，是天大的福氣。

前蘇聯總書記戈爾巴喬夫曾經對中共元老鄧小平說，蘇聯的改革開放不如中國，市場經濟之進路困難重重，就因為蘇聯沒有香港。蘇聯沒有一個準備好輔助國家轉型的境外城邦。

本來，俄羅斯人的基輔（Kiev）曾是城邦，西元八八二年建立，後來受到拜占庭王朝保護，可惜十三世紀（一二三七年）蒙古騎兵入侵，血洗基輔，市民流徙，鄰近的城邦被逐個擊破，城邦孤立而不能自保，只能寄望於統一帝國，於是各城邦紛紛投靠後來的沙皇，沙俄與起之後，以獨裁手段統治，消磨了俄羅斯人的城邦。漢撒同盟（德文Hanse，英文Hanseatic League）的城市群，則因北

歐偏遠，而蒙古西征困難，大汗窩闊台亦於一二三四年病逝而中斷西征，得以保存。漢撒同盟市於一八一五年合併，演變為有三十八個成員的德意志聯邦，漢撒同盟解散，漢堡、不萊梅等成為自由城市（Freistadt），憲法保障其自治權，並於一八三四年成立關稅同盟（Zollverein），漸次演變成聯邦制的共和國[一]。

漢撒同盟自行解散之後，威尼斯依然以城邦國家形式存在，經濟及文化輝煌，成為歐洲文化遊歷的朝聖之地。[二]直至一七九七年，法國帝國擴張，拿破崙．波拿巴以解放威尼斯的封建統治為名，攻陷威尼斯，五月十二日，威尼斯共和國議會召開會議，向法國交出所有權力，威尼斯城邦瓦解。[三]

香港的情況剛好與基輔城邦及威尼斯城邦相反，英國殖民者從滿清帝國手上割去香港，成立商埠，與中原分隔，自此確立香港的城邦格局，成為東亞散播自由氣息與文明制度的基地。[四]英國移交主權予中共之後，亦以《中英聯合聲明》的國際盟約及《基本法》的小憲法保障香港的法治制度及自由生活方式不變，令香港可以避過上海租界、青島租界、條約口岸等中國境內城邦之併

一．德文Bundesrepublic；英文federal republic。

二．歐洲文化人所謂Grand Tour，一七八六至八七年，威尼斯城邦仍在，歌德遊歷意大利，親睹文化盛典，寫下著名的遊記*Italienische Reise*（*Italian Journey*意大利之行）。

三．即使互解，也召開議會，可見城邦之威儀。

四．香港協助日本之明治維新及孫文之共和革命，亦促進中共走向市場經濟及現代行政。見本書另述。

入中國內陸一體專政制度之命運。至於香港能否維繫城邦性格及發揮城邦自治，為中華世界樹立典範作用，視乎香港人能否認清香港的城邦歷史，有否自覺其市民身份，及中國當局是否珍惜國族發展之多元資源。如一切世間美好之事，城邦是珍貴的，但無人識寶，也會轉瞬而滅。

香港是為中國儲存人才、資金、財貨、文化風俗和學術知識的城邦，但由於是英國人建立的，中共要「長期利用」，為了要用民族主義加強政權之合法性，對內宣傳香港為「百年國恥」，香港「回歸祖國」乃鄧小平一代中共官長「昭雪國恥」之大功業。中共在理智上、在戰略上要保全香港的城邦格局，但在感情上、在戰術上卻不願意見到自治的香港城邦繼續存在。在戰略上要維繫香港，在戰術上要消弭香港，這是中共收回香港之後的大尷尬，中共舉棋不定之際，戰術將取代戰略，官僚的私利取代政治家的公益，香港的領土、人口和城邦文化將不斷受到侵蝕和替換，這將會犧牲香港人的福祉，也斷送全中國的福祉。

前者，我們香港人是感受得到的，後者，大陸人會認為筆者誇大其辭，過於「大香港主義」了。然則，到證實預言之一日，也許已經太遲，中共將步向俄羅斯、菲律賓或巴西的道路上去，一去不回了。然則，中國之亡，我是毫不惋惜的。也許，這才是歷史的正義才是天道。這章的城邦論，是一位香港人嘗試以人事挽回天道，以仁心感召天心，乞求上天之憐憫而已。

（二）歐洲的城邦：
古希臘城邦、漢撒同盟市與殖民地城邦

城邦是希臘的傳統，也是民主的根源，帕拉圖的《理想國》，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都以城邦為藍本。獨立國家主權是一六四八年威斯特發利亞條約（Treaty of Westphalia）之後的事[五]，即規定一國有固定的領土和治權，不容外界干預。此前，根據希臘人的觀念，即使某城參與某帝國，但只要有自己的法律、議會、文官和法庭，就是城邦。古雅典城邦的中心是衛城（citadel）[六]，周邊是城區和鄉村。香港即使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部分，但有自己的法律、議會、文官和法庭，甚至有獨立的貨幣、護照、郵政、海關、國際電話區號、國際組織締約權（例如香港比中國更早加入世貿組織）等等，即使中國不是聯邦制，但香港擁有的權力，比任何一個聯邦國家之一邦，甚至自治州（Freistaat; free state）、自治市（Freistadt; free city），來得更大。香港是城邦，無可置疑。甚至香港政治地理，也如古希臘城邦：維多利亞城（Victoria City）、九龍的城區及新界的鄉村。

五・德國明斯特市（Münster）和奧斯納布呂克市（Osnabrück）於一六四八年五月至七月簽訂的一系列和約，標誌着三十年戰爭的結束。簽約的一方是統治西班牙王國、神聖羅馬帝國、奧地利大公國的哈布斯堡王朝以及神聖羅馬帝國境內巴伐利亞公國，另一方是法蘭西王國的波旁王朝、瑞典王國以及神聖羅馬帝國境內布蘭登堡、薩克森公國等諸侯國。在一六四八年十月二十四日簽訂的西荷和約，正式確認了威斯特伐利亞這一系列和約，並象徵三十年戰爭結束。政治學者一般將該條約的簽訂視為民族國家的開始。

六・Citadel一詞來源於拉丁文civis，意為公民。希臘文是acropolis，高城。

民族國家（nation）是頗為近代的事物。在十七世紀的民族國家興起之前，古代文明薈萃和物產富饒之地，都是城邦，歐洲的有米索不達米亞的蘇美城市（Sumerian cities）如巴比倫和歐爾（Ur）、中美洲的瑪雅城邦、希臘的城市（希臘文polis）如雅典和斯巴達、意大利半島的羅馬、威尼斯、佛羅倫斯，中國在先秦時代的封建諸侯國、城市封邑（如臨淄、邯鄲）等，都有類似城邦的地位。在十八世紀之前，早期的歐洲國家，一般是軍事強權家族（王族）連結或霸佔了城邦或幾個城邦，又或者幾個城邦資助王族來保衛與執法，於是形成鬆散的聯盟。故此，城邦是現代文明國家的藍本。在建立現代國家的過程中，不能保存城邦的文化地理格局，不能吸納城邦文化，幾乎可以斷定，這是失敗的國家，永遠與現代絕緣的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這麼一個國家，因為中共接收中國大陸之後，上海的租界城邦，連同北京、天津、南京、杭州、廣州這些文化活力充沛的城市格局，乃至於澳門及香港城邦，都一一被中共摧毀或快被摧毀了。

在國族建立的過程中，城邦充當政治動員、資金援助、文化薰陶、人才輸送和制度奠定之功能，在國族建立完成之後，民族國家的意識形態及擴張意識，以擴張領土、全國制度一體化及對外施加霸權的方式，會消弭城邦的自由與寬容風氣，令到城邦的政治作用減退，但也有城邦能夠發揮自治意識，以自治市、直轄市的形態延續其身份，維繫其活力，依然可以成為重要的文化城市、文化都會。毀滅城邦，就是毀滅國族建設的生機之源，中共

當年毀滅上海的租界城市（類似城邦的地位），今日意圖毀滅香港的城邦格局，都是私心凝重、為黨不為國的滅絕中華文化生機之行為。

（三）城邦與商人政治

城邦是甚麼？城邦的英文是city-state，德文是Stadtstaat，概念都來自希臘文*polis*，顧名思義，是城與邦的混合體。是以城市為核心範圍的自治體（autonomous entity），有時是主權獨立的，但很多時是依附於一個主權體制（通常是帝國或王族）之下，成為其轄區或軍事保護區，或至少在名義上受到王族或帝國的軍事保護及外交領導。為甚麼城邦一般不能獨立的呢？原因很簡單：城邦是商貿之地，有自足的生態圈，有河流、海域、森林、農田等，但不足以自給自足，必須依賴商貿往來，也要依賴腹地（hinterland）支援，故此不能獨立自存。城邦的管理者由商人世族組成，不能征戰，故此必須託靠地域王族或海外勢力（如帝國殖民主義者）。故此，城邦市民必須精於協議，與外地結盟，服膺誠信及法治，始可以取信於天下。

城邦來自通商與貿易，歐洲的城邦通常是沿海的商港。原生的城邦發源於地中海沿岸的希臘本土城邦（如台比斯Thebes、雅典、斯巴達），希臘城邦奠定體系之後，隨後後繼的城邦眾多，有用軍事強行攻略而開發的城邦，也有商人自治的結盟城市，前者有古希臘亞歷山大帝開拓的城邦及現代英國殖民者設立的城邦，後者有北歐和中歐的漢撒同盟（德文Hanse；英文Hanseatic League）。古希臘時期，在亞歷山大帝的攻略之下，城邦沿海路貿易伸延，由地中海伸延到中東、中亞，直入北印度，至今印度及阿富汗仍留下希臘城邦的遺跡。另一路線，是由伸延到歐洲、北海及波羅的海，留下自由城市、自治市的傳統。歷史悠久、身雖死而魂猶在的城邦生活，可以說是歐洲獨有的文化現象。

資本主義發展初階的商人自治市，由商人世族、僑商或殖民地組成（例如德國人、丹麥人在北歐的商旅聚居地），例如北歐波羅的海一代於十四至十六世紀出現的漢撒同盟。十五世紀中葉之後，歐洲的國族建立運動（nation building）興起，主權國家開始用憲政法治、金融實力和軍事保護來主導資本主義，如尼德蘭（荷蘭）和聯合王國（英國）的出現，建立憲政國家和資本主義制度（法治、公共行政、股票交易所之類）之後，特別是十七世紀在波羅的海爆發的三十年戰爭（Thirty Years War，一六一八—一六四八），打擊了漢撒城市同盟，便使到威尼斯、不萊梅、漢堡、呂比克等城市在政治上衰落，不再成為強大的政治實體，然而，它們融入新興的共和國之後，依然繼續發揮經濟和文化作用。

（四）亞洲的城邦：租界與殖民地

亞洲的歷史發展，異於歐洲。中國在秦代廢封建、置郡縣，莫定中央集權制度，全國以吏治，乃至清朝，商人不能再如范蠡、呂不韋一樣左右大局，挾君王以自重，而要如石崇、沈萬三、胡雪巖一般，寄託於朝臣，乞討經商特權，在明清兩朝的衰世，甚至時刻擔心被皇帝抄沒家產。中國明代之行會、會館、鄉約、善社等，都是鄉社慈善組織，受到朝廷監視，其地位遠遠不及歐洲的商人會社，可以制定法律，統治城市。

秦之後，漢土無城邦，直至香港城邦在一八四二年出現，隨後短暫出現青島暨膠州灣的青島租界及上海法租界，才有歐洲式的城邦出現。香港之城邦，乃英國商人及華人商人、士人在此地共處，在英國殖民政府的普通法的法治秩序之下，可以自由貿易及結社，累積財富，安心發展商業，並以社會賢達或委任議員的身份參與本地政治（如伍廷芳、何啟、羅旭龢和周壽臣等）。香港商人及士人的政治地位雖然比不上歐洲城邦，但也是亞洲史上的例外。

上海法租界的政治與文化功能，啟動中國的文化革命、政治革命、金融革命的作用，乃至沙龍文化，眾所周知[七]，但德國在青島的公共行政建設，少為人知。德國佔領青島後，並未掠奪青島的金融與原料，而是把青島當作永久殖民地，準備長期投資建設，而且限制土地買賣，執行嚴格的地政規劃，避免工業初興之際便陷入地產炒賣。[八]短短十七年間，德國政府向青島財政撥款逾五百萬馬克，試圖建立了一個譽為「東方瑞士」的城邦。一九〇一年，德國殖民者在海泊河挖井，設水泵所送水到儲水池，向市內集中供水，並將市內污水、雨水和糞便分開排放。一九〇四年德國投資七十五萬馬克建設官設屠宰廠，發布肉類檢驗規則。德國還為人力車夫集中安排宿舍，內建食堂，澡堂，洗濯室，電燈，自來水，車輛統一製修，車夫統一著裝。殖民政府投資三十萬馬克，每年造林五十至一百公頃，立法保護森林，還在市內大量種植梧桐。[九]然而，由於民國政府及中共政府都急於成立龐大而一統的民族國家，故此收回這些租界之後，並不給予特殊政治地位，令這些租界的原有城市文化消弭，甚至連城市方言（如上海話）亦漸次消亡。青島今日的異國市容，可以令人憑弔中國失去的一個城邦，如上海的外灘（Bund）一樣。

印度、東南亞等地，在殖民勢力來臨之前，都是鬆散的部族勢力和王朝勢力，殖民勢力撤退之後，則紛紛獨立建國（印度、馬來西亞等），殖民據點城市，都成為國家的普通一員，只有新加

坡和香港例外，前者獨立建國，後者在今日則由中國收回主權，成為具備小憲法的政治特區，依照基本法，香港除了國防與外交之外，全權自治，故此也是延續了城邦格局。新加坡在馬來西亞聯邦建立之時，是聯邦的一員，後來馬來西亞覺得新加坡華人人口比例太高而華人資本家的財力過大，勢必左右馬來人的選舉政治，便威逼新加坡脫離聯邦而獨立建國，成為罕有的主權獨立而又有龐大經濟實力的城邦。這無疑是歷史的意外。當然，新加坡的華人很多是蘭芳共和國的後人[十]，有城邦共和的傳統。廣東梅縣的客家人羅芳伯於乾隆四十二年（一七七七年）在加里曼丹島成立「蘭芳公司」（類似「東印度公司」的商人統治組織），向清廷朝貢，復於一七九五年在沙勝越的加里曼丹建立「蘭芳大統制共和國」（至一八八四年），首領尊為「大唐總長」或「大唐客長」。倚仗清廷的庇護，招攬馬來酋長加盟，擴大版圖。第一

七、上海租界之興衰，可參考費成康：《中國租界史》，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一九九一，頁二六七至二七六。

八、德國有過教訓，工業大亨變成「地產諸侯」，將經濟拖垮。德國在二十世紀初，資產階級（容克集團）也曾一度熱衷土地買賣，不事生產，使到德國的資本主義經濟陷入困境（後來以發動戰爭解決困境）。韋伯對此十分憂慮，稱之為「資產階級的封建化」（Feudalisierung des Bürgertums）。參閱Max Weber, *Gesamtpolitische Schriften*, Tübingen, 1951, p.19.

九、資料採自〈青島傳統身體，殖民身體，和海灘身體〉，建立於2010/06/18 17:22，提取於2011-9-3. http://www.vanke.com/docs/about/vankeweekly/568qingdao/vankezhoukan0115600.aspx?documentID=d0254da1-d802-4cd4-a0f8-63357a2a2d0a

十、此點由黃世澤網誌文章得知。〈海洋亞洲對大陸中國〉，二〇一一年十月九日。

任總長是陳蘭伯，第二任是羅芳伯，於是國名就叫蘭芳共和國。這是海外華人第一次、也許是唯一一次的海外建國。[十一]後來中法戰爭爆發，荷蘭人重新佔領沙勝越，乾隆皇帝又始終不願意將蘭芳共和國納入版圖，蘭芳共和國因兵力不足而覆亡。此後，南洋華人一般以入籍掩藏身份，依附殖民地政府或土著政府，官商勾結，並不主導政治，即使泰國和菲律賓由華人主政，也掩飾華人身份，立國異域，不圖海外中華之舉。

(五)城邦的後繼者：英帝國成立的亞洲城邦組群

當城邦在十九世紀的歐洲過渡至聯邦國家之後，另一組城邦在亞洲成立，這是大英帝國的殖民勢力（商團加軍艦[十二]）沿着海路的遠洋貿易，在中東及亞洲建立的通商港口。由於英國殖民統治並不採取強行融合的殖民政策，而是採用扶植本地買辦勢力和保存本土文化的方法，當帝國勢力撤出的時候，這些城邦成為落後地區的現代化動力城市，長存不息，有些獨立建國（如科威特、巴林、卡塔爾、新加坡等），有些聯盟建國（如阿拉伯聯合酋長國），有些成為新興民族國家的自治特區（如香港）。伊斯蘭世

界及華人世界原本就擁有龐大的貿易勢力及自治能力（宗族、鄉社、行會、會館等），加上英國政府的法治制度及軍事保護，令這些亞洲城邦可以迅速成長。

城邦是歐洲傳統，亞洲的兩個現存的強大城邦——新加坡和香港，都是由英國殖民勢力建立的，若要與歐洲比擬，這兩個城邦之身份類似歐洲的亞歷山大帝開闢的希臘城邦與漢撒同盟的商人城市的混合體。新加坡城邦（一八一九——）和香港城邦（一八四二——）之建立，不得不歸功於英國強大的制度文明、公共行政與文化轉移能力，令前者可以領導南洋，後者可以獨步東亞。亞洲短暫存在過的城邦，則有普魯士建立的青島暨膠州灣殖民地（一八九七——一九四九）及上海的法國租界城市（一八四五——一九四三）[十三]，都在民國時期或中共統治之後消失了政治作用，文化作用也隨之消亡。

十一．黃世澤在其網誌有所指正，謂泰國也是華人建國，恭錄於此：「今天泰國歷任國王皆有一個華人名字，現任泰國國王拉瑪九世叫鄭固，因為現時拉瑪王朝（曼谷王朝）開國君主鄭華（拉瑪一世，他有一半華裔血統，與擺明屬澄海人的鄭信不同，但大家屬同鄉應無疑問，這亦解釋泰國潮語橫行的原因），要宣稱是吞武里鄭信後代才可以獲清王朝政府承認，以及泰國民眾承認，所以泰國是華人建國，這也是泰國之後軍頭首相皆有華裔血統之故，亦不用掩飾。」見「民建聯何以無恥到極限」，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十四日。http://martinoei.wordpress.com/2010/11/14

十二．當然，還有殖民官、傳教士、法官及醫師等。

十三．其他的法國租界，如天津、漢口、廣州（沙面）等，文化作用不大，從略。

新加坡被迫以城邦身份建國

新加坡早期有馬來人等土著居住，其最早的文獻記載源自中國明朝。明朝稱新加坡為「淡馬錫」（來自爪哇語Temasek）。一八一九年初，英國不列顛東印度公司僱員史丹福．萊佛士佔領新加坡。一八二四年，新加坡成為英國殖民地，最初隸屬於英屬印度殖民當局管轄。一八六七年，新加坡升格為海峽殖民地，與檳城、馬六甲並列一個轄區，直接受英國統治。

二次大戰爆發，新加坡被日軍於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五年佔領。日本投降，新加坡重光。戰後，英國一半是為了懺悔防守不力之罪，一半是來自世界的解放殖民地統治之壓力，加強殖民地的自治授權，一九五九年，新加坡取得自治地位。一九六三年，新加坡連同當時的馬來亞聯合邦、砂磱越以及北婆羅洲（現沙巴）共組成立馬來西亞聯邦，脫離英國統治。在馬來西亞期間，李光耀由於和當時馬來西亞聯邦政府在種族權利分配上意見不合，李光耀主張以「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的民族平等方式來取代「土著優先」的保護土著政策。人民行動黨與巫統的政治較量更在一九六四年七月及九月兩次引發新加坡種族騷亂。最後，首相東姑阿都拉曼以避免局勢惡化為由，在一九六五年八月七日要求新加坡退出馬來西亞。八月九日，以巫統為首的執政聯盟在國會緊急通過修憲，解除新加坡與馬來西亞的關係，新加坡一夜

之間被踢出聯邦，在倉皇之間獨立，總統李光耀要急於籌謀資源安全、工商業建設及國土防衛。[十四]

香港之城邦地位，乃清朝於一八四二年以南京條約割讓予英國之後奠定[十五]，然而香港島只可作商埠（trading port），面對龐大之大陸帝國，香港難以久存。故此英國復於一八六〇年以北京條約取得九龍半島為防衛屏障，再於一八九八年取得新界（九十九年租借期）為腹地，奠定香港的城邦格局——擁有商埠、農田、儲水塘、山林、礦石（花崗石）、漁業海域及工商業區之整全生態。香港的城邦格局甚為豐厚，與新加坡之單薄，頗為不同。

英國在香港開埠之前，香港有史前原住民、漢朝之屯兵、南宋之遺民（錦田屏山鄧族）、明清之遺民居住，因朝廷駐兵薄弱而衙門闕如，各地俱有武裝防衛，此地出產海鹽、稻米、鹹魚、香料（莞香）等，人口階級以農民、漁民及商人為主，也有若干士人[十六]，並有凶悍難馴之海上霸權——海盜張保仔，香港有極強的鄉社及漁民會社之自治傳統，正所謂「山高皇帝遠」，香港先民

十四．食水供應、招商、興建煉油廠及到台灣訓練空軍等。

十五．英國皇家海軍軍官愛德華．卑路乍於一八四一年一月二十五日登陸上環水坑口，並佔領香港。水坑口之英文Possession Street，紀念此事。

十六．香港乃邊陲之地，士子交遊狹窄，難有朝臣舉薦。清朝採用保護地方名額之法，薦舉偏遠之地的生員，故滿清時期，屏山鄧族始有進士及舉人、秀才若干名。

秉持《擊壤歌》之上古精神[十七]，抗拒政府管制，英國接管此地，亦不能強行統治，必須培養鄉村紳士及城市買辦以間接統治香港。滿洲覆亡、國共內戰及中共建政期間，香港充當自由避難所的角色，接收不容於中土的遺民及難民，發揮類似十七世紀的阿姆斯特丹（Amsterdam）自由城邦的作用，而這些南下的遺民及難民群體，例如上海一帶的商人，都有頗高的教育水平，即使來自廣東及福建農村的難民也有堅強體魄及勇猛鬥志，形成香港初期人口愛好自由、熱衷自治及反抗暴政的傳統民性。英國殖民者在香港採取格外自由與寬容的統治方法，與香港人不愛政府管制的民性（ethos）有關焉。

（六）城邦結盟促成聯邦制度

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王朝世家沒落，實施憲政共和的民族國家和以城市中產階級為骨幹的社會穩固起來——英國、法國、荷蘭、比利時、瑞士[十八]、意大利等，城邦的權力及生活方式融合在新興國家之內，城邦以直轄市、自治邦、自治州（如瑞士的canton）、自由市（德國境內）等政治形式寄存在大國

之內，正式結束歐洲城邦的獨存歷史。城邦在政治形式上消亡了，但城邦的文化地理格局依然清晰可辨，市徽、城牆及森林環帶大多保存，至於城邦精神，更是大行其道——城邦的自由精神與市民階級的生活方式，瀰漫在新興的共和國之內，乃至整個歐美自由世界。城邦的自由、法治、寬容與創意，成為普世價值的基礎。現代國家若以城邦結盟為立國基礎，維繫城邦的文化貢獻，較容易進入現代社會，荷蘭、德國、瑞士、北歐、美國，莫不如此，英國也是聯合王國，只有法國是例外，然而法國是一體化的國家，也是啟蒙運動與現代憲政概念之起源國——如盧梭之「民約論」，有強大的文化理念支持，可視為例外。

中國在秦朝之後，改行郡縣制度，是一體化國家，然而一體化之禍患，歷代可見。進入現代，面對中國的邊區族群問題、省區地方分權問題、為解決妥當的港澳問題、尚待解決的台灣問題，香港的城邦格局和城邦文化，依然是珍貴的中華國族資源。

十七・《文心雕龍・時序第四十五》梅註：「《帝王世紀》：帝堯之世，天下太和，百姓無事，有老人擊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今日元朗市鎮仍有一條路名擊壤路，紀念原初的自治精神。

十八・瑞士的若干自治州（canton），如日內瓦（Geneva）等，其實是城邦。瑞士聯邦（以前是邦聯）的拉丁文是Confoederatio Helvetica，簡稱CH，瑞士先佔了CH，故此中國只能用CN。

香港乃碩果僅存之城邦，舉足輕重

總括而言，原生的城邦是希臘式的孤立城邦，後來是系列城邦或城邦聯盟，城邦聯盟加強締約（如漢撒同盟市成立的關稅聯盟），成為民族國家，促成聯邦制度的訂立（如荷蘭、德國及美國、加拿大）。然而，也有新興民族國家未能保有城邦的文化而中道陷落的，中國是一例，馬來西亞及伊斯蘭城邦是另一例。中國在民國初年收回外國租界，中共建政之後刻意打壓這些租界城邦的文化，迫害城市精英，流徙城市人口（「下放」知識分子），令這些新生城邦的現代制度、文化價值和市民生活方式無法發展和流播，舉國都為專政的一體制度所控制之下。馬來西亞則因為忌憚新加坡城邦的財力和華裔人口，將新加坡剔出馬來西亞聯邦之外，致令兩者受到傷害：馬來西亞聯邦在初年走向專制獨裁和族群政治（優惠馬來人而歧視華人），新加坡共和國雖然提倡族群融和，但位居航道要塞，列強環伺，在強鄰之下掙扎求存，且要提防共黨作亂，故此無可避免地採取了專政，違背城邦的開放共融精神，至今雖然稍為開放，但仍未恢復當年的南洋城邦之自由創發。[十九]伊斯蘭城邦（如科威特、杜拜等）則在獨立後恢復伊斯蘭（程度不一的）政教合一統治，以致喪失城邦之自由開放性格。歐洲其他現存的城邦如摩納哥、梵蒂岡等，則功能單純，經濟活力亦不足。縱目世界，只有香港依然保有歐洲式城邦之完整格局及性格：政治自治、社會開放、經濟多元，擁有強大之文化保存及傳播力量。

香港是中華世界脫亞入歐，親近歐洲文明之捷徑，也是西方世界了解中國的橋頭堡。假若中國當局及國人之視野開闊，不想中華落入封閉殘暴的一體化統治，則今日兩岸四地分開統治的政體，各自保存特色及互相協調關係，也可締約為「中華邦聯」或「中華國協」（Chinese confederation），有自己區內的統一貨幣（如華圓Chinese dollar）及一致的外交政策。香港現代城市之歷史，悠久而不斷，此開拓中華天下之宏圖大計，以保存香港一百七十年的城邦資源，最為重要。

（七）香港城邦的政治：締約政治與商人參政

當今的城邦，有時是獨立主權國（如盧森堡、新加坡）、聯邦體制中的城市邦國（德文Bundesland，如德意志聯邦內的不萊梅、柏林和漢堡）國中之國的保護國（如摩納哥、梵蒂岡）及享有特殊憲法地位的特別行政區（如香港）。[二十] 城邦腹地不足，無險可

十九・馬六甲及檳城仍有若干城邦格局，至今仍有獨特的馬華文化，而且商業繁榮。

二十・澳門因為葡萄牙殖民者的財力與魄力有限，而且派駐的總督人才不濟，市政建設的典範不足，不算城邦，而且其獨立性格在一九六〇年代遭受土共破壞，故此只能算是略帶城邦性格的文化城市，不在此書之論。

守，時刻要面對來自大陸帝國之吞併與草原騎兵的侵擾，亟須機巧與世故之盟約政治（德文Vertragspolitik），與大陸帝國維持互不侵犯、互惠互利之微妙關係，方可自我保存，或在憲政共和建國時期，將城邦的憲政法治與自由民主之精神，大而化之，成為共和國之立國精神。保障香港城邦自治地位的《中英聯合聲明》是中英之間的盟約，保障香港一國兩制地位的《基本法》及「河水不犯井水、井水不犯河水」的口頭守則，則可視為港人與中共的盟約。中央與地方權力以盟約來界定，這實在是中華憲政之萌芽。

城邦之政治地位，於憲政共和及建立國族之後漸次失去，然而，在國家仍未行憲及共和之前，保存城邦的地位，乃有促進自由及國族良性發展而免於帝國暴政的作用。幸好，在中國土地上的現代城邦上海和青島的城邦史在一九四〇年代中斷之後，香港的城邦繼續存在，其命維新，弦歌不絕。然而，由於中國分封諸侯之歷史過早完結，民初之軍閥割據亦過早完結，中央集權體制不利於城邦之締約政治，契約條文往往受到道德禮教或宗主強權之凌駕，權力較高之一方——中央政府動輒更換法旨，而不是依照條文賦予之最大授權，寬厚而行，致令有權者弄權，無權者詭詐。

基輔城邦（Kiev）亡於蒙古，威尼斯城邦被拿破崙脅迫而交出治權，歐洲北部的漢撒同盟市締結合約而演變成聯邦共和國家。香港的處境猶如南宋之於金國，締結和約、輸金納

幣以求延續過渡狀態，南宋延命一百五十二年而無奈亡於蒙古，期間文化斐然，盡顯中華之文治與風雅，流澤於日本。

城邦之生存賴於經濟活力、國際關係、文化鼎盛與締約政治（德文Vertragspolitik）。九七之後，香港與中共乃國際締約關係、地方與中央的憲政關係，而不是中央征服地方而取得統治權，這是近代中國步入憲政之試步，因為憲政是在於地方之間、地方與中央之間的權力博弈與締約關係，而不是軍事臣服。中共不能信守《基本法》，香港人不愛護城邦、不捍衛《基本法》授予之自治權利，則香港人自毀長城，中國憲政之試步失敗，民主中國遙遙無期。

簡單而言，商人世家或殖民地受到帝國軍事保護，擁有高度自主權的城市，一般都會發展成大大小小的城邦，直至強大的國族興起為止。之後城邦便會轉型為國際城市，繼續發揮經濟文化作用，也有國族建設失敗（或本身是受到外敵指使的境外殖民政權）而毀滅了城邦的，例如中共的例子。城邦的力量，除了經濟金融之外，就是文化力量，所謂「軟實力」[二十一]，有時是文化產物

二十一．傳統的國力觀念，即國家的經濟及軍事力量，可稱為「硬實力」。「軟實力」的概念來自美國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院長約瑟夫·耐爾（Joseph Nye），軟實力是指國家具有強大吸引力的價值體系，可以在國內建立社會穩定性和文化抗激力，在國外樹立威望及促進其國家行為在海外的合法性。

的對外影響，有時是商人發揮政治影響力。歸根究底，商人必須理解城邦對其權利的保護作用，才會效忠於城邦，而願意與帝國勢力周旋到底，爭取城邦的利益，不會一下就獻出城邦而投降。

英國統治香港時期，與中共冷戰，但亦維持和平關係，英國駐軍的作用，在於邊界防衛及救災，而不是與中共戰鬥。為免觸犯中共及防止中共滲透香港的民主，英國擱置了戰後的香港民主自治計劃（總督楊慕琦提出的計劃），中共在戰後亦深明香港殖民地存在的意義，不主動收回香港主權，而是「長期利用，充分打算」，借用香港城邦的地位，緩衝東西方冷戰的衝突[二十二]，並以香港套取外匯、接觸國際及引入新知。英殖民政府亦在香港推行諮詢政治、廉潔行政、改善公共服務及提供福利保障，使香港進入全面現代化的社會。

商人可以無祖國，但商人必須有保護他們的勢力。香港的華裔商人雖然來自中國或南洋，但仍保持效忠香港本地，或最低限度不會大量投向中共（只有少數親共者如霍英東是例外），因為他們知道羅湖以北的政府不支持私人企業和市場經濟，也不保障商人的財產，甚至他們在中國家鄉的財產曾經遭受中共抄沒，或間接因為南洋國家在獨立之後，中共為了攀附邦交而離棄南洋華僑，取消他們的中國國籍，[二十三]令他們失去保護，遭受排華和種族歧視之苦[二十四]，身家性命備受威脅。

香港的資本主義及小規模的地方憲政在港英殖民時代成型，然而香港的豪門世家是由前朝及英國培養的，他們不是中共黨內勢力的延伸，回歸之後中共的商政世家也無法取而代之（反而鬧出醜聞）。因此，香港特區之內急遽推行憲政民主，將與大陸的黨政結構脫軌，而香港世家假若在民主化之後執政得法，也會勾結域外勢力或發展出地方獨立意識而不斷滋擾大陸政府，例如以鬧獨立的方式苛索利益。即使中共規定香港不可有執政黨，特首不可有明顯黨政傾向，香港將來的執政世家也有可能繞過限制，而且一點不難：即使在目前的政治環境下，港府高官也可以隨時由豪門世家收買。

香港如真的要發展資本主義和促使社會和諧，中共理應扶植或鼓勵商人組黨參政，先愛港後愛國，令商人的利益擴張可以與民意調和，商家受到民主投票的制衡，便懂得放權讓利，調解貧富衝突，令香港長治久安。九七之後，香港的商人的效忠對象由英殖政府表面上改為中國政府，然而中共對於香港商人始終有戒

二十二．二次大戰之後，美國極須化解歐陸之納粹主義遺毒，故此必須援助德國及重建民主以清除納粹，然而二戰另一遺毒——蘇維埃共產主義專制，則因為只禍及東方世界，故美國採取隔離政策對付，直至蘇聯瓦解。中國則因為有香港維持中西方之了解，而得到緩和，放鬆圍堵，反至美國採取共處政策（engagement policy），直至二〇一一年的美國重返太平洋宣言而結束。

二十三．根據中國血統和中國原居地而來的中國國籍。為了不放棄中國國籍，印尼、馬來西亞獨立建國之後，很多華人不願意入籍。

二十四．當年中共為了籠絡華僑，呼籲華僑捐獻或歸國服務，但為了爭取印尼及馬來西亞承認中共，建立外交關係，卻放棄華人國籍，迫使華人放棄中國國籍而加入當地國籍，受盡欺凌。

心，中共之殘酷與勢利，做事之毫無道義底線，香港商人也並非懵然不知，只好在外國買定政治保險。這始終是對中國對香港的長遠建設不利的。然則，假若中共承認香港的城邦地位，維護香港的城邦格局，則香港人斷無獨立建國之須要，反而會與中共和解，互相尊重，互不侵犯，香港商人認同香港城邦，而香港城邦最終也會歸入中國聯邦或邦聯的，這香港商人參政的國家安全顧慮也會隨之消解。

城邦精神：自由及生機之所

封建與郡縣，乃中國制度無法解破之結。封建有眾多諸侯國及城邦，但天子權威薄弱，征戰連連；廢除諸侯而設置郡縣，派遣官吏來統治全國，則減少叛變及內戰，卻削弱文化生機，也令中國容易被外敵一舉攻破京城而舉國投降，地方無諸侯可以有光復漢室之號召力。

清人袁枚在《小倉山房文集》，有「書柳子《封建論》後」一文，正是反省中央集權制度之弊。袁枚說，封建制度之下，如果天子不仁，「千八百國中，苟有一賢君，則民望未絕」。而成湯及周武王之前例可見，即使天子暴虐無道，百姓也有其他君王來投靠和求援。文人也可周遊列國講學，不必困於朝廷。例如孔、孟能夠遊說列國，「而諸侯敬，弟子從，則聲名愈大，千萬年後猶知遵奉為師」。如果孔、孟生於郡縣之世，科舉不第，只能局促於鄉土，寂寂無聞而死，甚至被皇帝誅殺。他認為周代實行分

封，「諸侯可驕不可叛，故周室得以久安」。西漢的王莽篡亂之後，劉秀以長沙定王之後「崛起南陽，削平天下，卒成中興之業，分封之效亦可見矣」。即便是在唐代，「安史之亂不旋踵而敗者有三鎮以平之」，而唐中葉以降，唐朝不被吐蕃吞併，不被黃巢消滅，也全賴藩鎮之力。

中國在秦始皇廢除封建諸侯之國而以郡縣制度一統天下之後，瓦解了諸侯叛逆之根，也同時挫傷了文化生機之源。目前中共也是地方分權而中央權力旁落，能否制度轉型到具有地方自治而又憲政共和之國——不論是否採用聯邦制度，當中香港之地方自治可以發揮示範作用。

(八) 香港人的城邦文化

現代化需要百年基業，中國境內，只得香港有百年基業。香港是首個率先實現整體現代化的中國地方。託庇於英國的開明統治，香港得以保存晚清人之保守與靜安、民初中國之豪邁與創新的民氣，加上英國的自由主義、懷疑精神與理性處事之熏陶，形成今日香港人的精神面貌：仁愛而自我保護、拘謹之中有寬容、

實惠而不貶斥文雅、市井而有俠氣，大概是清末民初的中國人與維多利亞時期的英國人之混合體。

往昔中國派學生出洋遊學，只能入洋人的某階層，學某學科的知識；請洋人專家來華，亦只能在某時期教某學科，接觸某部分人。香港則上至富豪大亨、法官醫生，下至跟班伙記、漁農商販，都能夠在現代的公共秩序之下生活，完成了社會的整體現代化，這是近世中國的文化奇蹟。正如史學家唐德剛先生所講，現代化的轉型，不能單靠一兩位思想家，「它要靠數不盡的智者和常人，乃至軍閥官僚、洋奴大班的綜合經驗、思想、試驗等過程，並配合主觀和客觀的機運，分期分段，累積而製造之。」[二十五]而在近代中國的土地上，有主觀和客觀的機遇，可以避開中原的政治動盪，選擇了適合的模仿對象，可以分期分段來累積現代化經驗的地方，亦只有香港。

赤禍之下，民初中國社會文明發軔之銳氣，在中原蕩然無存，在香港則託庇英國之保護，全勢保存。民初嶺南的新興公民社會（如學會、商會、善社、宗族與鄉黨）與上海南來的新興資產階級，俱受到英國法律的保護與滋養，逐漸建立香港的公民社會。香港保存了國學、正體字、舊式中文和粵語，清明重陽也放公假。香港若干總督，更是精通中文，特別是金文泰總督（任期一九二五—一九三〇）其中文之嫻熟，可以提筆為詩，與中國翰林唱詠交遊。他在一九二七年設立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提倡國

學，訓練精通古文之士人，令香港的公文風格及公共書體保存古風。此外，由於英國乃工業革命之源，飽歷工業社會之環境污染及精神摧殘，故經營香港，亦能及早在香港工業化發軔之初，就提倡環境保護及文化保存。環境保護方面，港府援助農業[二十六]，保護水土，設立郊野公園及城市綠帶，保護香港的城邦地理生態之完整，可謂功德無量。

文化保存方面，英國之紳士有浪漫主義之風，尊敬鄉野小民，認為是未經工業文明荼毒之高貴野人（noble savage），與中國士人之雅好鄉野一樣。中國之王朝風俗，在民國及中共統治時期遭受唾棄及破壞，但在香港竟然全體保存，不論是土生的新界宗社（祠堂）抑或是移民的盂蘭醮會（潮州移民），俱可以在香港保存，並且走向現代更新，如祠堂之財政用有限公司掌管，而盂蘭醮會則與潮州的僑商會結合。殖民地時期，新界風俗得到理民府的良好保護及英美人類學者的研究[二十七]，成為可靠的中國民間文化研究記錄。

二十五．《晚清七十年》全五冊，台北：遠流，一九九八，第三冊，頁一四六。

二十六．農業免稅，農戶放寬建屋限制，而且得到頗多政府無償資助及技術支援，一九六〇年代，香港農業可以供應四成蔬菜及肉食。英國殖民地政府之農政，可謂輝煌。

二十七．如英國人科大衛（David Faure）和美國人華琛（James L. Watson）的研究。科大衛目前仍在香港中文大學主持香港民間文化之資料庫的工作。

此外，英國外派殖民地之總督，是英王的全權代理，手握政治軍事大權，可以依照本地官吏之判斷，在殖民地權宜行事，有時甚至不惜頂撞外交部，而英國有議會及多黨制度，地方政府與中央之衝突，見怪不怪。例如：香港早期有試圖給予港人自治的楊慕琦總督、堅持在香港實施福利政策的麥理浩總督，後期有彭定康總督的例子。香港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經濟起飛，而港督直接面向香港市民，當年香港人的城邦性格，就是如此不知不覺之間完成的。

英國殖民政府保存中華文化之中，頗有精微之處，有助形成香港的城邦文化。早在民國建立之時，港府為了防範民主統一中國的思想南下，刻意抵制白話文運動及國語運動，在本地學校保留古文教育，培養國學家和粵語教師。大陸赤化之後，為了阻隔香港與中國大陸的文化聯繫，殖民政府不在香港推行普通話，甚至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不惜取消國語廣播[二十八]。上世紀五十年代，港府採用粵語為香港官方的中文交流語，在電台、學校及公共場合使用。一九七四年，中文成為英文之外的香港法定語文，粵語是官方交流語，公共場合的中文刻意古雅，以與大陸的白話文區隔。

在英國殖民政府的保存政策之下，不單止國學、古文與粵語漢音得到保存，粵劇、粵語電影在香港得到再生，新儒家的哲學得到發揚，佛道得到保存，外來的猶太教、伊斯蘭教、印度教、祆教等各有信眾群落，新興的搖滾音樂、流行曲、新浪潮電影也在

香港落地生根，最右派的佛利民思想和最左派的托洛茨基思想與革命馬克思主義，都可以在香港和平共處。

政治地理上，由於中英條約限制及城鄉生態之佈局，香港整體是一個城邦，幾個城區及多個城鎮。城區維多利亞城（中西區和灣仔）及九龍（界限街以南）[二十九]，以及元朗、上水、大埔等鄉鎮，觀塘、葵涌等工業區，荃灣、沙田、屯門等新市鎮。

香港乃遺民社會及難民社會，遺民社會有偏安之好，保留前朝事物自娛[三十]，並且貶斥當今之野蠻政權，難民社會則偏重個人家庭利益及眼前實惠，刻苦耐勞，發家致富為先，容易與現行政權妥協以自保的性格，然而經歷英國殖民政府在戰後幾十年的社會現代化工程，香港已經形成固定的市民性格和本土歸屬感。這些都要回溯到香港人口的構成。香港人口來源有三大部分，新界土生鄉民和水上漁民是滿清的遺民，民初時期移居香港的是民國的

二十八・當年是以取消方言為理據，香港電台的新聞廣播之中，國語、客家話、潮州話的廣播一併取消，獨存粵語。粵語成為實然（de facto）的香港話。

二十九・網友告知，一九六六年，戴麟趾在立法會演說，稱維多利亞城及九龍為本港的雙子城，港府將建設第三、第四及第五城於荃灣、沙田及青山（屯門新市鎮）。

三十・香港今日的口語，仍然保存銀紙、現金、碎銀（零錢）、五金舖、天橋、差館、獄卒、師爺、馬路等語，沿街仍有武館的青龍七星彩旗飄揚，告示仍有「請勿擅進」之類，大陸作家阿城來了香港訪問，還以為回到清朝。

遺民——主要來自上海的創新之地的商人，而中共建政之後移居香港的是共產中國的難民——主要來自廣東及福建的刻苦農民；其餘的歐美人士、南洋歸僑和南亞裔人士，隨商務、政務而來者，遭新政權排擠而避難香港者（如共產越南之難民），亦是移民或遺民。目前七百多萬香港居民中，九十多萬人持有外國國籍，部分立法會議員也可持有外國國籍。香港人來自五湖四海，加上英國的開明統治，社會服膺文明秩序多於服膺國家意識形態，居民的城邦意識、市民身份強於國族意識與國民身份，有明顯的香港價值，例如服膺工作倫理、仁愛他人、樂善好施，緊貼世界潮流（如環保和心靈健康）等。即使歸政中共之後，二〇〇三年香港的沙士疫症，大陸和台灣的醫療人員玩忽職守，但香港的醫療人員卻全體死守崗位，下自醫院清潔工人，上至醫生都有染病殉職者。而近年大陸放寬遊客來港，亦感嘆於香港人的排隊秩序及公車讓座予老弱之舉動。

總結歷史，香港先民的精神有兩種：一種是南宋至清初來港的墾拓者（explorers）精神，另一種是清末至中共建政來港的避秦者（freedom seekers）精神。前者是勇武的——掃除障礙以保護生存空間，後者是自保的——尋求個人發展而與世無爭，故此平日見到香港人多是溫文婉約，但危急時期卻是勇武非常，且富於自我犧牲精神。三十一 這些都是與大陸的華人截然不同的精神。在與極權政府鬥爭的時候，香港人都會記起香港的祖先精神遺產，好似美國人記起西部牛仔精神、台灣人記起渡海精神一樣。

（九）轉化族群政治，發揚城邦精神

為何筆者要在香港主權移交中共接近十五年的時候，提出城邦精神？吾人清楚看到，國家的君臨，不單不會使香港人看到前景和路向，而是使香港各方面都無所適從——因為中共就是一個前路茫茫、等待危機爆發的可憐國家，而中共至今仍是由革命政府掌握，臨時執政了六十幾年，黨大於國，憲政共和之日，遙遙無期，以香港城邦的文明、理性與寬容，只能配上憲政共和的政體，落入了中共手上，豈不兩敗俱傷？

中共處理香港，也是毫無新意，而且不夠務實，明知中共自己聲名狼藉，官員及黨員貪污腐敗，香港卻可在金融安全、對外融資、海外投資、國際經驗和制度更新各方面對中國有無可取代之助

三十一．香港有極多案件，是有人蹈海自殺而旁觀者紛紛跳入水救人的，甚至因此溺死都有的。保衛釣魚台事件中，一九九六年九月廿六日，保釣號的總指揮陳毓祥也為了個人的愛國理想，被日本戰艦逼迫之際，為了爭回釣魚台國土而在釣魚台海域蹈海宣示中國主權而溺死。屍身用五星旗裹還香港。陳毓祥乃歸化英國籍之大陸出生港人。二〇〇三年的沙士疫症，也有不少醫務人員因照顧病者而染病殉職或傷殘。

力[三十二]，但中共由於不認為香港人愛國，於是官僚只有墨守中共當年對付上海城邦的方法，用攤薄功能、流徙社區、摻雜外來人口、破壞城邦地理的方式，瓦解香港。中共官僚在香港進行愛國教育和普通話教中文，但卻無視香港有超過一半的外國國籍人口，而且在城邦推行愛國教育，狹窄的生存環境也容易滋生排外思想。而由於美國緊密觀察香港的變化[三十三]，一旦香港大陸化的臨界點超越了，香港的自治權受損害、香港人口摻雜大陸新移民過多，美國便不會給予香港特殊關照，反而會緊密監視。

解決香港問題，就是承認香港的城邦歷史和城邦地位。比起古代的帝國和現代的共和國，城邦雖然是過渡狀態，但也可以維持長時期的過渡，特別是香港的城邦狀態，在等待中國完成憲政共和政體和聯邦制度（或其他容許地方自治的制度）之前，中國政府應該容許香港城邦繼續發展，毋須急於將香港帶入古代帝國的狀態——現在的中共就是古代的帝國主義狀態。這將封閉了中國的去路，而令中國人選擇暴力革命，奪去中共的執政權，而不是靜待中共轉型。故此，中共容許香港城邦繼續發展，將是中共延年益壽之舉。將香港拉回帝國，情況恐怕猶如滿清王朝有能力收回香港主權一樣，共和革命終會爆發的，只是以更為不文明的方式爆發而已。須知，民國政府善待滿洲廢帝及遺臣，就是從香港學了英國的文明處事方法，而不是學了俄國革命黨的一套——將沙俄皇族滿門抄斬。

城邦生活之為哲學家及政治家津津樂道，不是因為其富庶繁華，而是因為其文明開放。城邦規模之小，可以容許市民參與政治和文化創造，投入社區生活，成為積極的市民（active citizens）。城邦是內斂的，不是擴張的，它沒有國家意識形態負擔，只有符合普世的文化價值——如公義、平等、自由，以及在此價值之下的文化生活——如宗教、慶典、藝術等，是故城邦雖小，卻不排外，而是容許外人參與其中，逐漸融和，也容許各地受到逼迫的人來此，馬上取得庇護。城邦的政治受到市民緊密監察，必須秉持公義而不能偏袒私心，否則必受千夫所指，無地自容。各位讀者，這是否有點像香港的生活呢？

阿里士多德的《政治學》說：「城邦（polis）是為好生活而存在的。」在其他國家形態中——如帝國甚至現代的大型共和國，人民是為了國家的好處而存在的，人民會受到國家的壓制的[三十四]，但城邦是為了人民的好處而存在的。德國的城邦諺語是「城市的風使人自由」（Stadtluft macht frei），入了城邦，享受的自由如風一樣的舒服和充沛。

三十二．中共持有三萬多億的美元儲備，必須趁早向外投資，購買石油、礦產、工業原料、農地、戰略性企業等，但由於中共人員的國際經驗薄弱，也有貪污腐化，對外之直接投資和收購合併，往往焦頭爛額，連在冰島買一幅地皮，也遭到人家拒絕。這方面，中共如果聰明，將來只能靠香港幫忙或出面做。目前中共借香港之名滲入國際社會，在香港註冊公司上市，或在港有業務，但股東會總裁都是大陸人，也有靠投資關係而取得香港身份證的大陸人，以香港人或香港公司名義獨資經營，拓展業務走向西方。然而這都不是真正利用香港，而是濫用香港，會拖累香港的商譽，同歸於盡。

三十三．從二〇一一年九月初的維基解密事件洩漏的美國駐港總領事館的密電可見，美國各方面掌握香港的內情，中共在香港的舉動，無所遁形。

三十四．財政賦稅之壓制、貨幣貶值之壓制，甚至以國防、反恐的名義的壓制。

城邦最為人稱頌的是它普世的價值觀、秉持公義的市民和豐富多元而不違反普世文明的宗教信仰與文化藝術。香港城邦意識之覺醒，首先是在二〇〇三年經歷二十三條國家安全立法的考驗與沙士（SARS）疫症之鍛煉，香港人經歷天與人之煎熬。二〇〇四年六月七日，經歷七一大遊行和沙士劫難之後，近三百位香港專業、學術界人士聯署《香港核心價值宣言》。宣言列舉的香港核心價值有八個，依次為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公平公義、和平仁愛、誠信透明、多元包容、尊重個人與恪守專業。[三十五]這是初階的香港市民文化宣言，稍嫌粗糙。民主、法治及（施政）透明是制度而不是價值，而且有些還是二合為一的，例如自由民主與人權法治。點算起來，這些核心價值，共有十四項之多，當然都可以歸結為：自由、公平[三十六]、仁愛，與法國大革命高舉的三大原則相似——自由、平等、博愛。宣言公布之日，香港特區政府發言人回應，表示「香港賴以成功的核心價值完美無缺，而政府充份了解市民對這些價值的珍視，所以會致力加以維護，不會令之受損。」發言人重申：「政府管治建基於法治、自由、平等、開放、廉潔等核心價值。」這算是官民雙方都同意的香港價值觀，往後可以整理和提煉的。[三十七]

二〇〇三年的七一大遊行之後，董建華延至二〇〇五年，抱病下台，曾蔭權替代之。二〇〇四年，曾蔭權為了取信於港人，對記者說「我飲香港的水長大，身上流着香港人的血，我絕不會出賣香港人！」城邦只問居住地和價值觀，是不問出身，也不問出

生地的，曾蔭權這句話，是香港族群政治的先兆，也是香港在沒有全盤考慮之下捲入中國意識之後而引起的反彈。至於二〇〇六年五月，他強調委任諮詢委員的時候講究「親疏有別」，也違背了城邦只問才能和功德的原則。香港城邦意識動搖了，向陌生的國族意識形態靠攏了。

為了向中共施加壓力，捍衛《基本法》賦予香港人的普選權利，立法會議員黃毓民發起社民連和公民黨議員五人在二〇一〇年發動五區議員辭職，於同年五月十六日同時參與補選，是為香港五區公投運動。這是全民決志的運動，雖然因為遭受土共冷處理和政府刁難而投票率不高[三十八]，但也顯示很多部分香港人命運與共的城邦市民心理。此後，大陸孕婦洶湧來港產子以取得全家居留權、大陸人來港炒賣奶粉與遊客態度惡劣，令香港與起排斥大陸移民的情緒，甚至鄙稱之為「蝗蟲」。二〇一一年八月，留

三十五・二百九十四位及來自不同界別、包括非民主派的專業人士，在報章刊登聯署聲明。宣言認為「近年香港核心價值備受衝擊」，呼籲市民以言論及行動維護這些核心價值。

三十六・法治可以包括在自由之內，因為自由之權利，必須以法治保證之。公平則是人人平等，誠信也可以包括如公平之內。

三十七・香港公民黨在二〇一一年九月十九日於《明報》的全版聲明，也有提到四項香港價值：「縱使被抹黑、曲解，我們依舊捍衛香港最後的瑰寶 民主 人權 自由 法治」。

三十八・約有五十八萬名選民投票，總投票率為17.1%，比過往為低。結果五名辭職議員以大比例得票贏得議席，重返立法會。民主黨不參與五區公投。

駐香港工作的海外女傭申請司法覆核，要求留港工作滿七年的，依照《基本法》享有香港居留權，大批高舉自己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抗議[三十九]，不支持外傭申請司法覆核。二〇一一年八月，中共副總理李克強來訪香港大學，引致香港警察侵害大學生示威權利。又有一批高舉土生土長的中產人士登報支持警察果斷執法。無論正反意見，無論是反共還是親共，無論是特首曾蔭權還是街上的示威者，高舉香港土生土長，已經成為代表香港本土利益和本土公義的指定動作，這標明香港已經不經意地進入族群政治的前沿。這是無可避免的，也是香港捲入中國國族意識而必須解決的難題，否則必會損害香港的國際都會地位和文化格局。

解決族群政治，促進族群良性融和而不是催化惡性排斥，只有重提香港的城邦精神。這是香港本土意識的唯一出路，也是族群政治的唯一解決方法。

三十九．特別是懷疑土共組織「愛護香港力量」宣傳車在外傭於九月三十日得到法院勝訴後，於灣仔鬧市抗議，煽動種族仇恨，並狙擊公民黨協助外傭打官司。外傭勝訴的新聞：〈12.5萬外傭爭居權勝訴〉，《東方日報》，二〇一一年十月一日。

第三章

一國兩制，城邦自治

（一）城邦與市民：香港的獨特發展

（二）長期的過渡狀態，令香港城邦得到精細治理

（三）香港非「國恥」，港人無「原罪」：香港的光榮歷史

（四）一國兩制是香港本有的：共產黨被迫給予一國兩制

（五）香港對大陸的貢獻多於大陸對香港的貢獻

（六）香港的憲政：法治精神就是要弄假成真

(一)城邦與市民：香港的獨特發展

英國統治香港的政治風格，與統治其他遠東及中東殖民地，有所不同。雖然都是城邦，但香港有中國的大一統的文化根源和政治腹地，英國必須小心謹慎，在香港採取的政治區隔，比起新加坡及科威特等城邦為大，新加坡、科威特等並無強大的文化根源及政治腹地，可以採用一般的殖民地政策，香港則必須格外留神，時刻要防範本地遺老的王朝及民國的中國大一統思想、中共的反資本主義思想及狹隘民族主義思想、本地左翼的反資本主義及反殖民地思想。特別在戰後中共統一中國及各地反殖思想蓬勃之際，英殖政府亟須完成香港本土的完善管治，培養本地人的歸屬感。然而，由於中共不會容忍香港獨立，亦不許香港推行全面民主以免萌生本土立國的意識，故英國無法採用扶植自治領（dominion）的方法，只能用下列方法加強香港自治及達到城邦意識：

甲、**獨立的經濟及財政政策**：港幣獨立運作，不再與英鎊掛鉤；香港財政全權獨立處理，連儲備金也不須寄存於英國；獨立關稅區等等。

乙、**港督全權處理香港政務**：只須匯報而不必請示如何統治香港；港督統率駐軍；官員及議員由港督任命等等。

丙、**獨立的國際地位**：郵政獨立；電話區號獨立；對外只稱香港（不稱英屬香港）；對內則稱「香港政府」（Hong Kong Government），簡稱港府，英國宗主簡稱英倫（英國倫敦）或倫敦，並不稱為「中央」或中樞。英女王戲稱「事頭婆」（雜貨店老闆娘）。

丁、**殖民政府主導的現代化社會工程**：英殖政府在戰後三十年間，用開明專制的統治風格，用言論自由、官費教育、公共房屋及公共論壇等方法，締造了近乎現代（quasi modern）的香港社會。[二]

戊、**獨立的語言及文化教育政策**：香港考試資格獨立，毋須跟從英國；中英文同列法定語言；大學享有學術自由（然而大學校監仍由總督擔任）等等。

一．從殖民地到獨立建國的預備狀態，如新西蘭、澳洲及加拿大預備立國的狀態，名義上承認英王為國家元首，但國土完全自治。

二．說是近乎現代，是由於憲政民主、統治術和人文知識這三方面，是殖民政府刻意收起的，不予傳授的，儘管也不會禁止香港人學習和探索。

己、**獨立的香港中文**：提倡粵語為實然的官方中文；維護正體漢楷；維持古老的職官稱號（如布政司、按察司、銓敘科、理民府）；堅持香港的、王朝中國式的優雅外文翻譯。（如香港翻譯英國首相Margaret Thatcher為戴卓爾夫人，而不跟隨中國大陸翻譯為撒切爾夫人或台灣的翻譯柴契爾夫人；美國Virginia州為維珍尼亞而不是弗吉利亞。）

然而，亦由於英國的政治區隔，香港並無國族之憂，香港人可以迅速學習西學，脫亞入歐而不自知，比起日本人，香港人並無國族負擔，生活更為西化，更容易融入歐美社會。此外，香港本有的嶺南文化得到英國現代政治制度庇護及提升，可以獨樹一幟，兼容並包，超越廣州省城而有本土之創新，單是思想流派，便有中國新儒家（錢穆、唐君毅、牟宗三等）、現代佛學（印順法師[三]、霍韜晦等）、歐陸哲學（關子尹等）、英美哲學（勞思光、李天命等）、自由經濟思想（張五常）、馬克思主義（托洛茨基派及新左派），美術有嶺南畫派，國學有饒宗頤……在戰後短短二三十年間冒起，彈丸之地，思想哲學之盛，可以與中共統治之大陸匹敵。

英倫三島民情各異[四]，英國政術有堅持也有融和，英國統治香港，也機靈而精微。早在侵佔香港成立殖民地之初，英國統治者已謹慎處理官方行文，避免觸動中國人的文化自尊。例如一八四一年成立殖民地，中文則稱為「開埠」，以通商之海港掩

蓋政治之基地。今日動植物公園的佐治六世銅像旁之銅匾，中文寫香港開埠一百周年紀念（一八四一至一九四一），英文則寫to commemorate the Founding of the Colony of Hong Kong（紀念在香港建立殖民地）。英軍登陸之Possession Street（佔領街），中文則用土名「水坑口街」；曾參與侵略中國之英國將領或外交官，其名字在香港一律另譯，以免勾起華人之國族舊恨，如樸鼎查（Pottinger）在港譯為砵甸乍，額爾金（Elgin）在港譯為伊利近，二人在港島俱有街道紀念，也用港譯。

一九六七年港共暴動之後，港府驚覺官民疏離，民間社會在工業化之後迅速壯大，必須改弦易轍，由統治（rule）轉為管治（govern），政策轉變之際，衍生一套新的公共語彙。當時政府對外的英文宣傳，不再稱香港為Colony（殖民地），改稱Territory（轄區），中文則維持香港、本港之名；小學的國文課本，改稱中文[五]，國史改稱中國歷史；治內的華民政務司，改名民政司；統治則改為管治、行政、管理與治理，不一而足。香港民間如明清遺民，不知有國，出國曰出埠或離港，回國曰回港（或返唐山），中國是唐山，國人是唐人，中文是唐文、唐字（客家人的

三．曾在香港弘法，後期移居台灣。

四．各有種族根源（盎格魯、撒克遜、基爾特等）、宗教（天主教、英國聖公會等）及法系，例如蘇格蘭法屬大陸法系，並非普通法系。

五．然而，直至上世紀八十年代，香港中文大學的大學一年級的中文補修課程，仍稱「大一國文」。中文系的學生免修該課程，其餘學系一律修讀。

講法）。港府親民之餘，在言文上避免承襲大陸或台灣的公共語彙，此舉既可障隔國共影響，又可建立新的港人身份。

王荊公詩云：「看似平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市民」之名[六]，是最重要的名詞轉換，可替代共產中國的「人民」與民國的「國民」，有若干權利與義務，卻無國族的意識形態。「市民」一名，暗中奠定香港的城邦意識，沿用之久，港人不察其奧妙。[七]九七過渡期，為處理香港土生南亞人士的國籍，造出「族裔」一詞，避免種族、血統、民族與國族。至於國家、國立、國民、國人等，香港只是民間沿用，維繫民國血脈，港英用「政府」與「官立」取代之，如用政府獎券（government lottery），不用國家獎券，如用官立學校（government school），不用國民學校[八]。惟英皇、皇家（royal）則照用如儀，蒙賜「英皇」或「皇家」冠名之機構，遍及英聯邦國家，乃品質之嘉許，如皇家香港天文台，並無效忠英國之意。

本來，推進現代社會及資本主義，亟須國家之強制權力，然而香港有英國的政治領導及普通法輔助，民間亦有民國之創新氣象，故此香港之現代化並無國族意識形態的負擔，毋須排外以立國族（如德國、日本、韓國的例子），可以兼容並包，實踐城邦的自由與寬容。香港之自由與寬容——特別是在宗教自由和種族寬容方面，可謂獨步天下，外國人來港旅遊，都覺得自由自在，毫無壓力。

香港之治不同於英國任何殖民地，原因是英國無法於此地建立「代理政治」。香港的人口結構，乃一歷代遺民與各省難民交織之社會。他們有些是因早前協助英國人與滿清政府開戰，戰後深恐清廷秋後算帳，紛紛走難到來香港。數字上顯示，香港開埠時的人口約六、七千人左右。到了一八五一年，香港整體人口已達三萬三千人。及後太平天國起義，大陸居民出逃，一八七〇年整體人口到了十二萬四千人。香港城邦成為逃避國家災難之地，正是歐洲人說的「城市的風使人自由」（德文Stadtluft macht frei），「何處有自由，何處可為鄉」。

委任買辦、鄉紳、族長之類的代理政治，在香港頗為難行。香港並非單一部落社會，代理政治的先決條件，乃要找出當地的長老，以便統治。在幾次的香港人口猛增的週期，移民混入許多幫會組織。幫會本是反清的秘密會社，後來成為犯法營私的幫會。早在英國開埠之前，原住民各自群居，彼此不服，經常械鬥，何況復再混入各種外來勢力？此地原住民互不心服，加上難民湧入，人口流動迅速，故此，英國人的處理手法，便是與華人互不干涉，大家各自行事，容許地方及社群自治。雖則此地不斷出現

六．英文citizen、法文citoyen與德文Burger，都同時有市民及公民的意義。中文則分別清楚。

七．移民法例則用「居民」（resident）。

八．香港民間有「國民學校」之名，在離島長洲。

形形色色的罪行，但以戰後初年的香港警察數目而言，嚴重罪行不多。

開埠以來，香港有兩項善政值得稱頌。一是確立地方的自治權力，另一則是中英文化之融和。地方的自治權力緣於港督的權限。原則上港督直接聽命於英國政府，間接聽命於西敏寺議會。限於當時航運技術，往返倫敦需時，要花費一年之久，兼且英國是老牌民主國家，各級政府、各個政黨之間的角力及博弈，司空見慣。許多重大的政策遂由港督全權決定，港督可以權宜行事，享有剩餘權力，甚至敢於頂撞英國政府，維護香港政府的自主管治，避免香港介入英國本國事務。二次大戰以後，倫敦每每要求香港政府遵循其指令，以維持英國本土的經濟利益。基於保障香港商業自主，香港政府均違抗無理命令，甚至不惜損害英國利益。一九九〇年，殖民政府將《人權法案》引入香港，法院可依照人權法案，用類似憲法審查的原則，對時下法令做違憲審查。這是賦予香港法院處理憲法的地位，港督權力間接下放於香港法院，可謂開創本地憲政先河。

《史記．貨殖列傳》曰：「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所謂善政不如美俗，良好的文化交流及文化教育可維繫殖民宗主與香港市民之和諧。英人冒上殖民地統治之惡名，不能名正言順施展權威，只能懷柔統

治，用文明施教來統治香港，循循善誘，令港人學習西方文明，以間接促成香港獨特的中英文化揉合的特色。

香港開埠之初，十九世紀中，許多洋人都有華人情婦，其出生的後代形成華洋混合社群，即本地第一代的世家大族。當中最為著名的，便是何東家族。其次，香港之歐亞混血之盛，也令香港人有特殊面貌及體質，頗多出現於明星身上。另外，英國人鼓勵新界宗族移民英國開餐館，頗多落地生根，嫁娶洋人，融入歐洲文化。另外，廣東人擅長烹飪，深得英人愛好。至於英國人之愛好——郊遊玩樂，各式球類，華人幾乎全都學會（板球例外）。香港甲組足球聯賽（Hong Kong First Division Football League）於一九〇八年成立，獨立營運，是全亞洲首個足球聯賽。香港人也學會英國烹飪，混合出地道食物，如果醬多士、奶茶等。制度方面，香港人融會英國人的法治、堅毅及務實，加上嶺南人的實惠周到及隨機應變，令香港的工業製品、行政服務及商業服務，既能符合規矩，也體貼市民或顧客要求。雖說香港脫亞入歐，但並非全盤歐化，而是融會貫通，成就香港城邦文化，如旺角街頭，招牌林立，人來人往，卻是各取所需，和平共處。

(二)長期的過渡狀態，令香港城邦得到精細治理

進入現代社會，需要恆久的鬥爭過程和修補過程，經常要回到基本假設——如人權、自由的憲法精神，重新省視。西方用了三百年的過渡期，香港則用了一百七十年的過渡期。在後進的民族國家，如法國、德國、日本、中國，這個過渡期，經常會受到國族意識和國家意識形態的過早干預而中道摧折，乃至法國有五次共和、德國有三次共和，德國和日本則需要戰後美國的佔領、指導和援助，才可以完成憲政共和。中國於一九一一年後一九四九年的兩次共和運動，都以失敗收場，至今台灣偏安不定，中國大陸則尾大不掉，而且面對奸險的國際金融環境，美國在圖利之後甩掉拯救世界的責任，中國在國內國外都被期待要負起大國的責任。此乃營國之難，營大國，更是難之又難。

香港則因為一直都是城邦，前途無有著落，而在恆常的過渡狀態，得以擺脫國族意識和脫離意識形態爭論，不必辯論姓資姓社，不須訂立國語國文，可以精細處理現代化期間的治理問題。這是中國社會難得的經驗，必須好好研究和繼承下來。

由於香港並無兩黨輪替式的議會，不能用政黨輪替來更換意識形態（左翼與右翼之輪替）及政策（增加福利與節約開支之輪替），故此殖民地時期，香港頗多新政，都是以解決一時一地之問題，漸次形成傳統，之前並無國家議會式的辯論及張揚，以致鼓起意識形態，日後難以制衡。有者，是呼應英國本土的政黨政治而已，例如麥理浩時期採取工黨式的福利建設，首相戴卓爾夫人採取公共服務改革，香港亦有跟隨。英治時期的香港政治，乃大混雜之政治，無法在意識形態上劃一，在平行政官員之微細調節而已，舉下列四者，可見香港城邦之縱橫政術：

甲、**財政上採取保守主義**：控制政府規模，節約政府開支。

乙、**福利採取社會主義**：不須全民醫療保險，但公共醫療保持極高水準，而且只是收取象徵式費用（領取福利者免費），信任市民不會濫用公共醫療，也有若干措施（如排期及環境擠迫）驅使富人不會濫用公共醫療。福利救濟政策亦然，並無勞工保障，但又有近乎失業救濟之福利補助。

丙、**產業政策採取複合措施**：強力規劃工業用地及周邊工人居住之屋邨，爭取出口優惠，支援理工教育，卻放任工業區及工廠大廈之產業組合；工業區有土地優惠，但無免稅優惠

丁、**經濟民主化、政治民主化及文化民主化的互相調節**：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港府容許三種民主趨勢，但各有調整。經濟上採取放任態度，鼓勵創業及各種生計自由，但政治上將民主範圍納入市政範圍（市政局）、諮詢架構（地區行政）及官辦論壇（香港電台），官方資助的文化則全然官辦，防止共產主義思想滲透。

戊、**重商主義**（Mercantilism）**與消極的消費者權益保障**：為免企業被訴訟纏繞，香港並無嚴厲之消費者法例及集體訴訟，但用行業監管及賠償基金保障工人及消費者，如破產欠薪保障基金、旅遊業議會應付旅行社倒閉的賠償基金等。

香港政治環境充滿冷戰時期的國共糾紛及左右翼意識形態衝突，以上的現代行政安排，假若要付諸香港議會辯論及政府意識形態宣傳，則非常耗費政治能量，而且亦非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香港環境可以應付得了。當然，達成上述的城邦管治，必須依賴官員廉潔奉公，而且準確轉達及集中市民意願或業界意願，在英國殖民官之下的華人政務官要充當民意收集者及轉化者的工作，將民意轉化為可以用行政技術加以管理或駕馭，政府的諮詢委員會要囊括各種意見，並委任立心公正之社會賢達，這都需要港督及行政局成員勞心勞力，幹練處事。當然，殖民政府容許香港之學術自由、新聞自由及言論自由，也是扶植民間制衡。

至於日本，明治維新掃蕩過時的幕府制度，天皇得以親政。然而，天皇制度結合中央集權，仍屬神道設教，未曾過渡到理性的君主立憲。崇拜天皇之缺憾在於無法處理民族的非理性力量，必會征伐鄰國，為國民的意氣尋覓一個出處。戰敗後的日本被美國廢除天皇憲制，國軍只有自衛之名，禁止自行出兵海外，喪失部分國家主權。這是日本脫亞入歐之挫折，至今仍未恢復為正常國家。

現代社會的特性，如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議會民主，是無盡的過程，需要不斷反省，重拾根本，反覆改進，現代化甚至可以視為恆常的過渡狀態，走向終極答案和過分樂觀的現代計劃——如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及近年的新自由主義等，都以災難收場。香港過去以殖民地自治市的過渡身份，進入現代社會和資本主義，不須關注終極的國族問題，雖然未可到達全面的現代化，建立憲政共和，但也避過了過早的政治摧殘[九]，在華人地區之中，現代化的成就最是輝煌。

九・例如為了建立國族而毫不深思地推行單一性質的國語、推行本土經濟保護主義、推行國民教育及軍事紀律訓練、排斥外來移民等。

（三）香港非「國恥」，港人無「原罪」：香港的光榮歷史

《道德經》有云：「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器（勢）成之。」此語說明了道德可以開出形和勢。英國佔領香港，大陸歷代政權視之為國恥，並嘲笑港人為殖民地奴才、洋奴，而不知大陸人在異族之滿洲或異類之中共治下，亦不過五十步笑百步矣。王朝時期的領土觀念，特別是邊陲地區的領土，與今日的主權國家觀念不同，邊地並不是神聖不可侵犯、不可割讓或租借的。明朝嘉靖皇帝可以慷慨讓出澳門予葡萄牙人曬晾貨物及居住，滿洲割讓香港及新界雖是被迫，但也並非恥辱，況且滿清仍留下九龍城為衙門駐軍之地。

即使將英國奪取香港之行，視為帝國主義入侵中國，港人仍無「原罪」可言。

原因是當時大陸執政者為滿清異族政權，以天下侍奉滿洲八旗，而不是以天下為公，官制上也以滿洲人為正官，漢人為副官，以次等人對待漢人。滿洲是大魔頭，相比之下，英國只是小魔怪而已。況且，舊日歐亞之間並無便利國際通商的關稅同盟（如現在的世貿組織），歐洲工業國家必須用軍事擴張及佔領的

方法來推銷貨品，否則無法抵禦入口國的關稅屏障或貿易限制。英國侵佔中國領土，目標在於影響中國，意圖將中國改造為現代化的貿易夥伴，英國之行徑，如王夫之說的「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上天假借它的私心而實行大的公義），國人無須視英國為仇寇，更不應將莫須有之罪加諸港人身上，視港人為投靠外敵之民族叛徒。

另一個大陸人強加香港人身上的，是「負疚論」。大陸人受到中共的歷史教育，常說香港多得大陸照顧和保護，才有今日之類，又說香港只不過是趁大陸動亂之際發展起來，接收大陸的逃逸資金與人才，而且佔有大陸外貿交易的關鍵位置，又享有廉價供應之食水與農產，乃有今日之繁榮。這些言論的目的，是要香港人產生負疚感，日後獻身贖罪，服務國家的時候不計較利害得失，補償過去香港所獲得的非分之利。中共在香港推行愛國教育，目的就是要香港人背負愛國不足、獨自享福的原罪，終身去為（被中共騎劫了的）中國付出。這是包藏禍心的國民教育。首先，香港只是被動接收大陸逃逸資金與人才，並無主動招攬，大陸首先要自我檢討，為何要逼迫資金和人才逃來香港。此外，對外貿易是互惠互利，香港購買大陸之食水及農產，也令大陸在艱難時期，得到寶貴的外匯收入。尤其是東江水，當初周恩來的原意是免費供應香港，但香港政府堅決要付錢購買，後來就節節加價了，而且香港本身想要發展水庫和海水化淡，也因為強迫接受東江水而作罷。今日之東江

水，貴於海水化淡，東江水的保證收益（每年三十億元），成了廣東的國營上市公司的優勢資產組合。十

況且，以前大陸在戰後直至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廉價供應香港的蔬菜和豬雞，除了套取外匯，也兼有打擊香港農業、製造依賴的任務。頗多新界菜農和養殖戶，深受大陸農產傾銷之苦，秋冬大陸蔬菜大量傾銷香港，本地蔬菜滯銷乃至傾倒街頭。要等到打風落雨，鐵路海路不通，才賣得好價錢，否則經常無錢賺，八十年代之後，頗多新界農戶被逼結業。中共之陰毒與遠慮，遠遠出乎一般善良香港人的想像。

相反，香港接收大陸資金及人才，有為大陸儲備之功，而且在香港的自由和法治環境，得到提升和發展，大陸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開發改革時期，香港輸入的資金、人才和技術，成了市場經濟的寶貴的啟動資源。

英殖政府除了引入自由及法治之外，也保證了中國文化在香港之生存空間及發展機會。中國人不信奉系統信仰的一神論，而是信奉天人合一的巫教（shamanism）或泛靈論（animism）。巫教認為人人可以修養心性、交通天地而成為聖人，泛靈論認為天下萬物皆有靈魂寄託或自然精神，泛靈論發展起來，成了中國的民俗宗教（folk religion），以自然崇拜、圖騰崇拜、祖先崇拜、聖人崇拜以及地方神靈崇拜為核心，缺乏統一信仰體系和宗教經典。英國無心將

香港的華人改信基督教，只是採取協調和融和的態度，保證華人社會的消極自由，並且分而治之，採用微細技術管理，在華人各個社會群落（scattered field）採用本地化的現代管理（localized modern management），這成為日後東亞頗多地區的管理經驗。例如政府借出球場，利用盂蘭節的醮會，促進僑社團結，並派出警察及民政官員，將節慶安排符合現代的安全及人權觀念。

思想自由與政府寬容是英國在資本主義形成時期總結出來的價值。資本主義在威尼斯、荷蘭發端，在英國得其大成，除了英國是有國族本體可以保證資本主義的上層制度而行使公平之司法之外，也是由於英國有洛克（十七世紀）、阿當．史密斯（十八世紀）及馬克思（十九世紀）之資本主義理論研究，橫跨三個世紀。英國在工業革命中嘗到各種苦頭，自知放任工具理性發展，足可挫傷了當地文化生機。故此在香港實施之政術，乃以自由統攝理性，避免落入官僚專制（官僚理性主義）[十二]。自由主義政術要旨是賦予權力，其權柄是「包容與適應」（tolerate and accommodate），包容有競爭力和市民需求的事物（不論新舊），並使政法制度與之適應。

十一．大約十年前，粵海投資因為經營不善，導致資不抵債，需要母公司拯救。北京政府決定，將廣東省政府持有的東江水業務注入粵投，使之有一穩定的現金流，以償還欠債。結果，供水業務自此就成為粵投的「現金牛」，現時大約佔粵投的五成營業額，而且盈利表現優良。參閱林忌博客文章「特區政府浪費食水的無恥謊言」，http://plastichk.blogspot.com/2010/05/blog-post_18.html

十二．官僚理性主義，見本書第七章。

港府的官民溝通，連結了賽馬會、滙豐銀行、四大商會、律師會，鄉議局、東華三院等機構。即使激烈組織，港府也給予保留區、法外之地（reserves, enclaves and niches）等安排，如安置國民黨餘部於調景嶺，安置土共於土瓜灣、北角等地落戶，寬容幫會於九龍城寨落戶，寬容托派、無政府主義團體在文社、工會等存在。港府寬容的民間組織，莫過於革命組織「興中會」。一八九五年二月廿一日，孫文在香港集合陳少白、楊鶴齡、尤列、陸皓東、鄭士良、程奎光等舊友，並與楊衢雲的香港輔仁文社合併，成立興中會總會。總會的辦事處，以經營貿易的商號「乾亨行」為名，設在香港中環士丹頓街十三號。此外，孫中山革命得力於日本商人梅屋莊吉之資助，折合一百九十二億美元。[十二] 兩人於一八九五年在香港結識，成為莫逆之交，當時梅屋在香港中環皇后大道八號開梅屋照相館，英國醫師詹姆斯．康德黎（James Cantile）經常光顧，而康德黎正是孫中山的醫學院老師，康德黎引介兩人認識。[十三]

另外，據日本歷史學家濱下武志研究，日本明治維新初期，一直以香港模式為學習對象，以便取得現代管理及海外通商的知識，擺脫鎖國政策。香港採取華洋結合的制度，有英國制度的公司法，並結合非制度化的廣東傳統經商模式，如精細之佣金計算、銀圓匯兌、交易手續費等。[十四] 以香港的成功經驗為引介，日本以此為楷模，「脫亞」建立一個歐洲模式的國家。濱下甚至明言，香港對日本的影響，應寫入日本國史之內。[十五] 孫中山為了

革命奔走，期間與宮崎滔天、犬養毅，甚至日本台督兒玉源太郎交往，接受三井產業的資金和日本防衛部門提供的軍火，並與日本致函日本首相大限重信，應允開放中國市場予日本工商界為酬報，互惠互利，彼此繁榮，稱雄東亞。[十六]

香港彈丸之地，卻是綜合中英文化精粹，可以演化文明，光照東亞。香港協助推翻滿清，締造中華民國，並影響日本明治維新及共產中國進展，這是知識與制度的力量，當中，英殖政府經營香港累積的經驗，即使是出自私心，也是功不可沒。

十二．梅屋莊吉投入中國革命的捐助總額，估計折算到現在高達兩兆日圓（約一百九十二億美元）。孫中山生前曾親筆書寫「同仁」之匾贈予梅屋，同時還在梅屋長穿的一件和服上揮毫寫上了「賢母」兩個大字，稱頌梅屋莊吉夫婦像慈母般不索求任何回報支援中國民主革命，像慈母般照料自己和宋慶齡。參閱毛峰〈中日尋找松本樓歷史智慧〉，《亞洲周刊》，二十二卷，十九期，二〇〇八年五月十八日。

十三．孫中山年二十九，梅屋年二十七，梅屋後來開電影公司致富，實踐當年之諾言：「君若舉兵，我當舉財相助」。見江迅，〈孫中山在日本的默默支持者〉，《亞洲周刊》，第二十五卷，第四十一期，二〇一一年十月十六日，頁三十八至三十九。是年為中華民國建立一百周年，中共與台灣各懷鬼胎，日本人卻有誠實紀念，參閱〈日人辦孫中山展，見證中日友誼〉，《明報》，二〇一一年十月八日。

十四．濱下武志《香港大視野：亞洲網絡中心》，馬宋芝漢譯，香港：商務印書館，一九九七，頁一三二。

十五．濱下武志，頁一四一至一四二。

十六．往昔通商障礙多，必須用軍事佔領、結盟等方式進行，否則將面對關稅及配額障礙。中國內亂之後，日本之侵略，也可以視為軍事佔領以擴展工商之途，因為對外軍事佔領是有大企業支援的。

（四）一國兩制是香港本有的：共產黨被迫給予一國兩制

滿洲入關之後，為了在精神上臣服漢人，威逼漢人剃髮易服。剃髮是剃去前額頭髮，易服是放棄明朝衣冠，改用滿人衣冠。滿洲屠城滅邑，明朝遺民逼於淫威而投降，但依然與滿洲立下「三不降」之俗例，就是「男降女不降，老降少不降，生降死不降」，女人和兒童不穿滿服，死者入殮，則穿明朝衣冠，髮辮盤在頂上遮蓋前額，是為「生降死不降」。即使香港之主權移交至中共手中，亦要遵守一國兩制原則——中共絕不干預香港內政。若果一國兩制乃中共施捨給香港人，「絕不干預」一語亦成一紙空言。本文將闡述中共被迫給予香港一國兩制之因由。

現代香港的概念起源，乃出自英國幾項與滿清政府簽訂的條約。其中包括一八四二年簽訂的《南京條約》，一八六〇年簽訂的《北京條約》，以及一八九八年簽訂的《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前兩份合約性質相似，均是要求滿清政府將國土割讓出去；《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則不然，乃租借香港九龍界限街以北、深圳河以南地方及附近二百多個離島，為期九十九年，到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屆滿。歷來中英雙方均對「租借」的概念有著不同詮釋。英方認為「租借」等同割讓，而中方則認為「租

借」意味仍保留宗主國的地位。直到一九四三年，盟軍要對抗軸心國，西方列強宣布放棄條約口岸租界，方有日後收回香港的言論。由此可見，中共能夠收回香港，並非如其所言「香港一貫是中國的領土」，而是根據國際協定的慣例，由中英談判而得。既是按國際協定進行，便需替香港訂立一套合乎人權的憲法，保護既有的制度和生活方式，避免共產主義入侵自由世界。

再者，要管理一個發達城市，不可能依賴原有的政治買辦來統治，必須建立憲法方可。就以鄉議局為例，新界因是租借地，有年期限制，殖民政府除了實行土地官有的政策、將原居民持有土地的中國式永業權（類似英國土地法的free hold）改為租地權（lease hold）之外，必須小心翼翼應付擁有土地的原居民，原居民為了捍衛地權，便組成捍衛利益、維繫鄉情的鄉議局。在英治時代，鄉議局捍衛鄉族的本來利益和生活方式，與殖民政府周旋，與理民府（新界民政署）談判土地買賣價格及商議徵地補償制度，為鄉民申冤陳情，與學救災，慈善廣濟，化解徵地糾紛，避免流血衝突，是殖民政府的管治夥伴，更是香港地方自治運動的先驅。即使日後成為中共在香港的合作夥伴，他們也是出於維護原居民特權而靠攏中共的，是中共的非神聖同盟。殖民政府攏絡這些非神聖同盟來管治香港，政治上是不牢固的，然則由於服膺民主政治，也不須要真的製肘香港的地方勢力，只需要訂明規則，自由競爭便可。是故，法治精神是香港的管治精粹所在，其

餘的便靠殖民政府與各勢力團體周旋，達致共識或至少是互不侵犯。例如殖民地政府與本土商人買辦世家及親台、親美的勢力，是達致共識，共存共榮，但與土共團體，便是互不侵犯。

要資本主義如常運作，需要法治，包括權利清單（Bill of Rights）及獨立司法。貫徹這一套可以實施與任何人的司法系統，需要新的制度——憲政，以公平（equitable）為本，絕對的道德與天理問題，變成可以計算、可以量刑的人間技術。這樣，借貸和投資的風險才可以量度，鼓勵依靠信貸的商業冒險（如抵押借貸）和日常生活（如信用卡消費）。

在政治而言，理性是用締約關係（如法律）來規管公民行為，意圖保障全體公益，達致合理的公共秩序。可以說，沒有理性主義下的規範，根本不能建立法治，資本主義亦也無從說起。即使自由主義及亞洲價值，乃香港優良傳統，仍無法脫離理性規範。

香港進入責任政府的理性規劃的時刻，乃六七暴動以後。英國人為防止再次爆發暴亂，推行一系列有利民生的政策。麥理浩時代留下種種善政，包括公共房屋、強迫九年免費教育、社會福利、工業邨、新市鎮、立體城市（商場大廈）、官辦文化設施等等。這些都是可以永繼的文化遺產（build to last），令人遺憾的是，由於當時英治政府要抵抗中共在香港進行顛覆活動，加上百萬大陸難

民的湧入，香港過速從小社區（small community）進入大眾社會（mass society），迫使政府採取標準化的城市設施和軍團化的公共秩序。這套法西斯管治術，短期內固然可以滿足發展需求，卻扼殺社區的生成，破壞香港的核心價值，乃一服糖衣毒藥。要撥亂反正，必須確立穩固的憲政基礎，此地才能持久發展。由此觀之，即使沒有中共插手，香港推行憲政改革亦是大勢所趨。

既然共產黨被迫給予一國兩制，便安心當其虛君也罷，否則香港民心背反，中共將從此失去作為世界上一個文明政府的資格。且以一個真實的例子，讀者即可明瞭當中利害：在法治仍然嚴明的香港，二十三條國家安全立法的法例和判例，將會清楚界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甚麼樣子的國家，有助中共正式在香港的法律上「建國」，這是中共那群人設想不到的效果。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仍未行憲[十七]，一旦香港有人觸犯二十三條立法，香港的法庭陳詞、判決及法學家的議論，將令中共十分尷尬。

索回香港，為香港立憲行憲，輔助香港將來獨立。世界上，竟有這麼蠢的統治者。

十七・行憲是施行憲政的簡稱，包括頒布合乎法理的憲法、軍隊國家化、黨政分家、司法獨立、民主選舉國會、民主選舉國家領袖及人民依照憲法享有全部法定人權。以此衡量，中共自一九四九年建政以來，無一合乎憲政。更何況，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由於規定共產黨領導，故此也不合乎憲政的法理原則。

(五)香港對大陸的貢獻多於大陸對香港的貢獻

香港無負疚於大陸。中共常說香港多得大陸照顧和保護，才有今日之類的謊言，目的是要香港人產生負疚感，而獻身贖罪。中共在香港推行愛國教育，目的就是要香港人背負愛國不足、獨自享福的原罪，終身去為（被中共騎劫了的）中國付出。香港能有今日的成就，全賴市民艱苦奮鬥，英治政府因勢利導，彼此合力經營香港家園。

歷史上，明朝中國派遣鄭和經略南洋，幾乎令中國成為南海之海上霸權，然而由於王朝中國恐懼對外貿易及向外移民會流失國力，並增加海外叛逆，故此下令停止派船外出。清朝與對外貿易，也是抱持懷疑態度，有時不惜限制商人貿易，甚至以國家干預的手段，使得外商虧損而退。以往清廷對外朝貢之管理方式，就是規定朝貢使節於指定城市入貢，然後再將貢品送到北京。私人貿易，則不依循朝貢方式，而是自由進行。香港開埠以後，即打開海上商業之路。《南京條約》訂明清廷需要開放沿海的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處港口，進行貿易通商。同時，香港乃連接東南亞與東亞的據點，可作新的中轉站。此處資源貧乏，英人唯有放手一搏，將香港塑造成經濟自由的城市。得益於

英國的精細管理及海商法，香港很快成為周邊地區的經濟核心及匯款中轉地，使香港成為轉口港及銀行中心，商業、航運與銀行業並駕齊驅，衍生強大經濟成果。加上香港言論自由，港人出入境自由，資訊、意見與國際人員往來無阻，令香港人可以中肯判斷國際情勢，締結國際人脈，本地一些世界級的航運鉅子，例如包玉剛與董浩雲，都是借助此優勢而創業。及後的金融行業，更須要法治環境、廉潔社會及新聞與資訊自由之環境配合，股票定價、指數制定、交易規矩等，都需要誠信的制度，令各方願賭服輸，大陸在這方面，時至今日，也有一大段落後的距離。

至於大陸對香港的貢獻，卻是錦上添花，不足言恩，頂多是互惠互利而已。顧汝德（Leo Goodstadt）對此深有研究。其書《官商同謀——香港公義私利的矛盾》駁斥了不少大陸人南下貢獻香港的印象式言論。這些言論之出現，往往是英治政府用以鼓勵內地及南洋等外商投資香港，歡迎外商來香港落戶，維持香港自由經濟的說辭，不能作準。例如是上海人來港振興本土工業，一直是香港流傳已久的神話。但根據數字上顯示，在香港的上海人口，僅佔總人口不足3%，而當中有四分之一的上海人從未接受教育。[十八] 而且，同期之輕工業生產貢獻，廣東人不遜上海人，甚至猶有過之。[十九]

十八、見《官商同謀——香港公義私利的矛盾》，香港：天窗，二〇一一，頁三三〇。

十九、前書，頁三三三。

中共不承認當中之實情，反而煽動民眾，責怪香港人佔了大陸便宜，危難時就要威逼香港人「還債」了。近年來，中共借為國家貢獻之名，向香港間接徵稅。例如香港與建京港高鐵香港段一事，特區政府花費六百六十九億，純為中共包辦一條無有航運效益而且造價特高之鐵路工程。

(六)香港的憲政：法治精神就是要弄假成真

香港的憲政之路並不長久，亦不穩固。殖民地時代，英治政府畏懼共產黨入侵本地，遲遲未肯與港人合作，落實自治，將香港變成自治領（dominion），還政於民，然而香港亦受到英國法治及憲政之保護。及後中共與英國簽約，九七年後香港主權移交中共[二十]，港人也無從過問。英人在九十年代彭定康總督時期，方始急速推行本地民主進程，促成區議會、兩個市政局[二十一]及立法會變相全部選舉產生，並與中共制訂《基本法》，給予司法機構違憲審查的權力，目的都是為了用一部小憲法和民選議會來填補英國撤離香港的憲政真空。

然而，九七之後，中共不斷扼殺本土民主化進程，撤銷兩個市政局，並不斷拖延特首及立法會的雙普選，甚至挪用人大釋法的方法，阻截香港終審法院解釋基本法的權力，以免《基本法》成為香港實然的憲法，香港有行憲之事實。

《說文解字》序文有一段乃如此描寫：「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崇拜帝王圖像是外國傳統，中國傳統是用文字牌位的，而且中國人也不尊君。中國人的國土觀念是文化的「天下」而不是政權的「國家」，是不尊君愛國的。華人受得了長期的夷族統治（如滿清）和殖民統治（如香港），也可以長期遠離國土而僑居海外（如南洋華僑）。牌位「天地君親師」，君王夾在天地神明與親人師長之間，並非獨大，居中調和而已。

儒家正名之學，用於當今法治社會，一樣合適。《基本法》寫明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中共以此承諾來接收香港，是默許香港一貫管治方式和生活方式可以延續。假若香港真的如中共所說，中共不是接收香港主權，而是重新行使對香港的主權，則即使在殖民佔領時期，香港仍是中國領土，中國主權從未喪失——起

二十．中共的講法是恢復在香港行使主權。香港主權從未交到於英國手上。

二十一．港九區域的市政局及新界區域的區域市政局。

碼並無全部喪失，滿清政府仍保有九龍城寨的管理權，則香港人在一九九七年之前就享有一國兩制，香港只是姑且託管予英國而已。中共為香港訂立《基本法》，承認香港的政治治理方法和市民生活方式至少五十年不變，只是用一部小憲法承認香港自治的正當性。《基本法》的憲法地位曖昧。它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頒布的地方法律，但中國法律又不在香港執行[二十二]，香港變了中國的法外之地。形同滿清時期的外國租界。然而，因為香港對中共長期有用，香港可以延長中共的民主過渡和市場經濟過渡，增加中共統治的安全系數，故此中共自英國手上索回香港之後，不得不為香港頒布《基本法》，為香港實然地立憲、行憲，輔助香港成為法外之區，甚至將來香港在戰亂時期獨立，也可以用基本法為藍本。

由於中共並未行憲，權力不受制約，《基本法》約束中共在香港的權力，猶如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間立下盟約。在香港，這是城邦的締約政治（Vertragspolitik），在北京，則是君主立憲。君主立憲是王權過渡到民主共和的安全方法，英國首行此法，德國、日本亦然，滿清政府也曾嘗試。憲政是人民與政府立約，但主要是地方政府之間、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的立約。假若中共在香港實踐一國兩制成功，則中國憲政之路會走得順利。香港的一國兩制失敗，則中國將面對革命，締造第三共和。[二十三]

可惜，也由於中共仍未行憲，而香港先走一步，施行憲政與民主選舉，若果中港雙方沒有共識，則令中共寢食難安。是故中共在收回香港之後，堅決延長香港的普選日程表，堅持收回《基本法》的剩餘權力，毫不猶豫地採取人大釋法，牢牢地將《基本法》當作地方法律來處置，尤其不喜歡反對黨和市民提出的司法覆核及憲法審查，避免賦予《基本法》實然的憲法地位。

《基本法》賦予的雙普選，是貫徹香港法治及高度自治的必須基礎，也是填補英殖民政府撤出香港之後的民主政治及憲政真空。這是保證香港制度的法源和香港人生活方式不變之大本。香港人如果不珍惜自己的自治權利而放任中共取走，任由黨官干預香港內務，逐漸將香港的內政交託中共處理，則香港就變成大陸的普通地方政府，香港不再是香港，中共收回香港，也失去香港了。要挽回香港，靠的是中港兩方平心思考一國兩制，以互信互諒，重新出發。

二十二．除《基本法》附件三列明的全國性法律之外，這些法律包括國旗國徽、領海之類，由香港政府另外立法執行。

二十三．第一次共和運動是一九一一年，一九四九年的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其原初的目的而言，也可以說是共和運動。

第四章

香港政策，大陸優先？

(一) 宗主國與屬地的矛盾

(二) 英港與中港，關係大不同

(三) 香港人對中國無拖無欠，不是「老奉」要報國

(四) 自治觀念下的土地與人口政策

(五) 宜居灣區規劃：危及香港的地理完整

(六) 移民政策啟動香港的原住民意識

(七) 新移民問題癱瘓了香港的政治思考

(八) 香港要有本位思考：移民審批權和入籍程序

(一) 宗主國與屬地的矛盾

香港特區政府首屆行政長官董建華上任之初，講出了一套政治正確但政治愚昧的名言：「香港好，國家好；國家好，香港更好。」他口中的國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主權移交的沖喜之下，香港人寄望中國經濟利益外溢，惠及香港，而中國為了面子也必會支援香港到底，大家用這些虛幻的假設來考慮這句話，一度活在蒙昧的美夢之中。直至二〇〇三年中共要求香港特區政府要為《基本法》二十三條有關國家安全的條文自行立法，限制香港人的自由，港人方才覺醒過來，原來香港與中國之間是有利益衝突的。往後，香港人在七月一日慶祝香港回歸之日，五十萬人大遊行，董建華倉皇辭廟，託病辭職。這是中港政治權力的第一次交鋒。交鋒的結果，是中共從授權香港特首間接統治香港的做法，改為直接交託任務予香港特首，有時甚至繞過特首而用欽差大臣發話，直接指導香港內政。「一國兩制的含糊面紗揭開了，中港衝突擺上檯面。

殖民宗主與海外屬地之間，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恆有權利界限之爭。政府之間的權界之爭，其結果是壓制臣服、懷柔統治還是楚河漢界、分治分立，視乎兩地之歷史關係、發展程度、制度和文化的差異。香港從英國殖民地過渡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下的特別行政區，宗主與屬地之爭，並無結束，反而延續下去，而且因為中、港兩地的關係與英、港兩地關係之差異，而愈演愈烈。中港權界之爭，結果是慘劇式的臣服與消解，還是喜劇式的自治與互助，端看今後港人的本土意識、主體性思想與中共的政治智慧與國際政局。

權界之爭，首先是國體問題——立憲與行憲的問題，其次是政令下達和經濟利益爭奪的問題。香港以前沒有成文憲法管轄，主權移交中共之後，香港有成文的類憲法或小憲法——《基本法》，這部《基本法》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頗多法律不予行使的之下[二]，在香港執行的。香港是中共法律懸空的地方，而香港卻原則上有權詮釋《基本法》。《基本法》在位階上低於中共憲法，但中共仍未施行憲政（行憲），而香港卻因為要確保主權移交之後的法治而被迫「行憲」了，《基本法》是香港自治的法理基礎，甚至

一、例如中共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於二〇一一年六月來港高調巡查，於十七日發話要港府解決住屋問題，之後曾蔭權答應考慮恢復興建居屋。

二、除了《基本法》附件三列明的全國性法律之外，見《基本法》第十八條。聲明：本文作者並非法學家，本書是以現實政治的角度來理解中港之間的法理關係的。

在戰亂時期，在緊急安排下，是香港臨時獨立的憲制準備——例如香港立法議會取得中國政府的默契之後，宣布中國政府因戰亂而無法行政，《基本法》第一條及第十八條擱置，直至中國組成合法政府而邀請香港以某種形式加入為止。

這個尷尬的憲制安排，令北京寢食難安，這是為何人大要死死抓住香港的憲法詮釋權的原因。然而，由於香港本身的自治歷史和自由傳統，中共踐踏《基本法》和干預香港內務，將激起香港人的護法及護城情緒，刺激香港自治運動。筆者的見解是，香港是中國潑出去的水（領土、人口和資金），一百五十年，自成一邦，有自主的城邦地理和人口生態，中國收不回來的，勉強收回來只是兩敗俱傷。只要香港這個載滿清泉的小池塘不干犯大陸，還提供大陸甘泉，互保互助，就大家算數了。

(二) 英港與中港，關係大不同

英國與香港殖民地之關係，在於互通有無。英國在一八四二年自滿洲手上取得香港，此前，英國與香港住民大抵並無瓜葛或積怨，英國乃歐洲之憲政民主、法治、工業技術及金融服務之發

源地或中興基地，香港住民臣服於英國，除了輸去若干商業利益及政治權利之外，得來的是現代化經驗之傳授與自由之保證。二次大戰之後，東西方冷戰啟動，中國大陸難民因戰亂、政治迫害及飢荒而湧入香港，英國加速香港的工業化及現代社會進程，為香港人提供政治庇護、生計安頓及個人發展，英國在經濟總量膨脹及產業升階期間取走的商業利益，港人不大介意。而且英國可以代理香港利益，向中共或國際交涉，前者如英國化解港共的「六七暴動」，後者如英國代香港爭取紡織品出口配額、航權等。英國授權總督治理香港，權力界限受到法律及慣例規管，利害關係劃分明顯。英國本身也是多黨輪替的民主國家，對殖民地的權威統治受到司法傳統及議會監管，在香港也靠民生福利建設消解民主權利訴求，故此香港與英國之間大抵可算是和諧的、可商議的。在香港經濟起飛的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英國恰好面臨經濟呆滯，香港殖民地的民眾氣魄一度高於英國宗主。這與香港主權移交中國之後的中港經濟發展趨勢，截然相反：中國氣勢如虹，香港意興闌珊。香港被新的宗主國壓住了。

一九九七年主權移交之後，中國大陸與香港之間的關係，卻是錯綜複雜而危機重重。先說大陸的民眾心理。大陸毗鄰香港，雖然有法制及邊界隔阻，但收回香港的感覺，令大陸人覺得可以影響香港，特別是開放改革之後，大陸經濟總量不斷提升，他們覺得香港即使發展較早，但香港停滯下來之後，大陸迎頭趕上，

足以君臨香港，中共又不斷宣傳祖國照顧香港、利益輸送香港，令大陸人自覺對香港有恩。此外，大陸人普遍視香港人是歷史逃兵，是英國治下的滿清移民及民國與共黨難民，逃過巨劫而得到繁榮及發展，對內地同胞有所虧欠。香港某些有中國大一統情懷的人，也自覺僥倖，可以託庇於英國而避過民族災劫，香港人彷彿對大陸人負有政治原罪，覺得要回大陸布施、報恩甚至贖罪，於是對大陸人的氣焰及狂妄，逆來順受。

政府方面，中共視英國統治香港為等待昭雪之國恥，然而對香港人卻是心懷警惕：香港是境外培育的逆民，即使香港人在專業操守、公民道德甚至愛國情懷都比大陸人為高，但借助香港來推進中國制度現代化的時候，始終不能坦然面對香港人的逆反心理。故此在戰略上中共要利用香港，保存香港，但在戰術上必須消弭香港，取代香港。然而，大陸因為金融安全及民主化遙遙無期的問題，始終不能取代香港，長期利用香港的戰略有其必要，但用人口、地理、文化教育等方式消解香港的戰術卻又必須進行，早晚會達到臨界點，觸發中港兩地的權力界限鬥爭。在政治猜忌和利益爭逐之下，港人不會信任中共會如英國一樣，可以代表港人利益，甚至從各種跡象看來，中國從內到外，處處瓦解香港的經濟整全性，蠶食香港的利益，連金融服務，也計劃用深圳的前海金融區來侵蝕香港。

（三）香港人對中國無拖無欠，不是「老奉」要報國

大陸的問題，並不只是中共領導層病了，而是全民都病了。大陸人是一群在規則不明的扭曲環境長大的、經歷種種天災人禍的倖存者（survivors），每個人心中都有罪疚和怨憤。要成長、要入黨、要謀職做事，都要認識潛規則、鑽研漏洞，久之，每人都犯了罪，也被人家的犯罪而氣惱。那是一個充滿倖存者的罪疚與憤恨的病態社會。佛教叫這做「怨憎會」。[三] 他們怨恨自己的命運，但無法改變，卻又責怪別人不施予救助。他們憎恨極權者，卻又暗地感謝極權者，令他們有幸成為眾多生存競爭的勝利者。你批評中共，他們會跟你過不去的，因為你正在摧毀他們的「光榮歷史」。各位看大陸來香港那些撒野的自由行旅客，那副輸打贏要、呼呼喝喝的臉孔，便可以清楚看見倖存者症候群（survivor syndrome）。

治理這種社會，要聖賢坐朝，要平民覺悟，這幾乎需要神蹟。當你連平民都放棄了，那個地方就沒救了。看透了大陸平民的心腸，就會懂得放手，放棄大陸。我們不都是精神科的醫護人員，

三・佛學名稱很多是古文，譯成英文，也許某些讀者容易明白些：where grievances meet hatred。

香港人面對病態中共，面對病態大陸人，很多人是沒有免疫力的，都會被感染到倖存者的症候群：罪疚、怨憤與狂傲，覺得香港倖存於大陸的種種災難，是有虧於大陸，要自覺回饋了，要獻身報國了。

然則，如本書第三章所言，香港無負疚於大陸。中共常說香港多得大陸照顧和保護，才有今日之類的謊言，目的是要香港人產生負疚感，而獻身贖罪。中共在香港推行愛國教育，目的就是要香港人背負愛國不足、獨自享福的原罪，終身去為（被中共騎劫了的）中國付出。

在大陸經歷滿清、民初混亂和中共暴政的時候，香港並無侵奪中國的財產和人才，香港只是在英國統治之下，正常過日子，被動地接收大陸的遺民和難民與逃難資金，幫中國保存精銳，後來卻多有無償的捐獻，例如接濟鄉親、故鄉興學、技術傳授等。香港有恩義於中國，卻無負債於中國。假若無香港，這些中國難民會夾帶資金逃亡台灣、美國、泰國一帶，散失於世界，中國在開放改革之時無法回收，就好像蘇聯當年的難民四散，戈爾巴喬夫經營改革的時候，無法呼召俄國僑民回來幫忙。香港匯集了中國的難民、人才和資金，有保存民族精銳之功，香港是中國的恩公，不是債仔。香港人要理直氣壯，以恩公的身份對待大陸人。當然，忘恩負義，是中共的本性，他們反過來說：香港欠了他們的，來香港發債券、上市集資、發行新股，明明是香港人提供資

金拯救國營企業渡過難關，解決銀行的呆壞賬，令中共避過毒債危機，中共卻說是送禮，或者施恩。香港股市的最大弊端，就是無法核實國內資產之真假，帳目詐騙也是中國企業無法在紐約上市的原因。中國企業大規模在香港出現，是因為美國監管機構拒絕接收他們，令他們不得不集中來港上市。香港是雪中送炭，也是火中取栗，圖利之餘，也為中國企業承擔了金融爆破的風險。

由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起直至開放改革，大陸都是靠食香港的外匯，當時還是一百港元對大約四十七元人民幣的。有港匯寄回大陸的家庭才可以換取「僑匯証」，有「僑匯証」才可買米、油和副食品，港匯救活不少人。大陸供港的副食品，只在大陸市場便宜，來到香港就貴了兩倍，而且品質控制參差。至今近年，根據中國國家商務部統計，二〇〇九年，大陸對香港貿易順差超過一萬一千億人民幣，十三億人平均可以每日分到四元。香港仍是大陸最大的境外投資者，佔四成有多，香港的投資養活數以百萬計大陸家庭，港資企業在全盛時期單單在珠三角就僱用超過一千二百萬工人。大陸九成的民間慈善事業是香港人提供資金和人力的。[四] 雖然開放改革時期港商的投資是互惠互利，但沒有港商的資金，大陸要找日本、台灣和美國的資金，肯定要吃盡苦頭，而且也不會如港商一般將技術及貿易關係慷慨附送。

四．參閱Kelvin心靈驛站博客文章「沒有香港，大陸會餓死一億人」，http://hi.baidu.com/kelvin02/blog/item/7575613462411d2f5ab5f52a.html

香港經濟起飛，在於五六十年代的輕工業基礎（隨後發展商貿和金融），當年是英國（工業革命之祖！）為香港籌謀科學技術和磋商海外關稅和爭取配額，美國為香港開放市場，日本為香港轉移電子技術，這些才是香港有負於義國友邦之處，是香港人要記住的。至於中共為香港廉價供應農副產品和日用品，只是套取外匯的需要，互惠互利而已。強制定額銷售（不是「供應」！）香港的東江水[五]，更是不安好心：香港政府當年已有技術開闢更多水塘及海水化淡，只是英國人不願意得罪周恩來總理，就領一個順水人情。況且大陸供應的是準備流入大海的天然河水，並非符合安全標準的食水，而大陸供水的一切工程開支和設備都是香港政府付錢的、或給予免息貸款的，供水設備還順帶用於供應廣東境內需求。在當年，是大陸寶貴的外匯來源。[六]相對新加坡從馬來西亞購買的淡水價格是每4540升（一千加侖）0.8美分(二〇〇四年的數字)，香港從中國大陸購水的價格是每4540升2.1美元。差不多是馬來西亞向新加坡提供的水價的262倍，而且年年加價，幅度驚人。[七]這些才是香港購買東江水的實情。

香港人由於過去不懂得政治宣傳，也不理解歷史，一見中共的人口若懸河，便會以為中共的人好有見地，將中共講的一套話語，套在自己身上，變成中共的思想奴隸而不知如何反駁。香港的恩人，是英國、美國和戰後的日本，台灣的國府有一些（資助香港的民間書院），幾時輪到中共呢？中共盜竊了香港的工業、商務，最後是金融，香港人被中共勒詐金錢，香港的強積金購買

了中國的銀行新股，其實是注資拯救國家。此外，香港還要為連年數以十萬計的大陸人提供戶口、福利、醫療和教育照顧，方便他們南下產子享受香港的自由生活，為大陸人的下一代提供「境外培育」[八]，這才符合事實吧？金融海嘯之後，中共想增加內需，結果銀行新發的信貸卻投到房地產等金融炒賣去了。這些遲早要償還、要埋單的，中共近年箝制香港，就是要利用香港救駕。

香港被迫接受中共統治的代價，即使純是經濟而言，也令大家的港幣薪水和港幣資產蒸發一半。中共奪走香港的貨幣自主權，方便人民幣變相與美元掛鉤，維持特低的匯率，令香港損失慘重，一直抵受跨境的金融套利而無法翻身。此外，香港帳面上的儲備，有兩萬幾億港元，另加各類政府物業、基建及公營機構的

五、舉報，南旱北澇的氣候趨勢，令廣東擔憂境內缺水，故此原因以按量收費方式供應香港。港府有望爭取東江水在二〇一二年按量收費，不必將過量供應的水傾倒出海。然而，二〇〇九年至今的東江水費用依然按年遞增6.3%。參閱〈東江水擬明年起按量收費 港府或可減開支〉，《明報》，二〇一一年九月二十二日。

六、參閱李家翹：〈為何香港依賴東江水〉，《明報》，二〇一〇年八月八日。

七、基於合約規定，以往香港每年必須購買最少約八億立方米東江水，耗香港政府公帑逾二十四億元。但因為近年香港平均降雨量充足，水塘因此滿溢，在一九九八年至二〇〇三年期間已把約值三十億港元的東江水排入大海，更引發傳媒大幅報道，稱此舉為「倒錢下海」。參閱林忌博客文章「特區政府浪費食水的無恥謊言」，http://plastichk.blogspot.com/2010/05/blog-post_18.html

八、港府統計處調查顯示，來港產子的大陸人，九成以上父親為港人的本地誕生嬰兒最終會來港定居，而父母非港人的本港嬰兒則近七成會定居香港。該處更首次發現，超越八成的大陸人認同本港教育制度良好，這是大陸父母決定將子女定居香港的首要考慮因素。〈來港生仔 主因香港教育好〉，《蘋果日報》，二〇一一年九月二十一日。

財產（如公務員及教師的退休基金），如果全部用來抵押舉債，在危難的時候，足以拯救中國在危機時期的破產政府，但這是香港人願意奉獻的嗎？中共國庫扒空了，國家財產化公為私之後，中共的新政府將在破產之中整頓政治，到時香港人的財產就要用了擔保（bail out）一些人心中的「祖國」了。香港政府已經失去財政自主權。這就是所謂主權回歸的代價，也是香港財金官員無事可為、不敢碰觸儲備金為香港謀幸福的原因。你質問他們為何沒有長遠財政政策，這個就是答案。由於政府失敗，香港人仍未有保護先保護共同利益，再圖謀個人利益的思想準備和行動，曾蔭權的香港政府也是賣港的政府，故此中共可以一步一步剝奪香港的財富。剝奪了之後，那些賣港求小財的人最終也是回到香港，面對破落的香港河山。

（四）自治觀念下的土地與人口政策

英國當香港是城邦，給予港府全權自治。中共則當香港是封建藩屬，架空香港特區政府，直接指揮港官，行其滿洲王朝式的秘密政治。香港的保安系統——特別是警察系統，明顯已經不聽命於保安局長，而是有北京公安部甚至有時是國安局直接指揮。經濟民生事務，港府在曾蔭權治下幾乎毫無作為，目的也很清楚：中

共授意地產霸權為香港諸侯，剝削市民，令市民成為地產霸權的奴隸，時刻陷於匱乏與恐懼之中，不能反抗政府，那麼中共便可以利用香港的金融市場來拯救大陸的經濟危機了。

鄧小平保證過香港資本家不必擔心，中央駐港聯絡辦公室（中聯辦）的研究員強世功的《中國香港——文化與政治的視野》明顯講出，中共授意資本家治港。最大的資本家，當然是地產財閥。強先生說，當代中國不是現代形式的主權之國（state）而是文化形式的歷史之國（country），是古典的國家形態而不是現代的國家形態，黨國體制則是「傳統中國的政治遺產」，走向天朝大國和大同世界，既然主權國家和公民契約立國只是西方近代產物，中國毋須跟隨。中國有中國的軌道，是以封建觀念，以差序格局來開展的國家。[九]

香港的一國兩制之得以構思，正是由於中國有王朝與藩屬的傳統封建體制，藩屬是容許各種制度的，一國多制的。[十]他說：「在香港問題上，中國共產黨超越了現代西方的政治理論（無論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理論，還是民族國家理論），可這種超越的東西究竟是甚麼，似乎沒有人能夠說清楚……然而，正是在現代西方政治理論難以解釋的關鍵點上，恰恰展示了中國共產黨最深層

九・強世功：《中國香港——文化與政治的視野》，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二〇〇八，頁一五一。

十・強世功：《中國香港——文化與政治的視野》，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二〇〇八，頁一四九。

的思考實際上延續了儒家傳統的天下觀念。這種『天下』觀念超越了階級和民族，也超越了主權國家概念，而把政治秩序的差序格局與圍繞地緣展開的中心與邊緣關係的思考結合在一起。……只有理解中國共產黨理論與傳統儒家理論在最深層次上的一致性，才能理解中國革命的特殊性，即它是正統馬克思主義的一個例外，也是現代民族國家理論的一個例外。」[十一]胡言亂語，卻可顯示中共的治國思想。

在此封建理論之下，香港的愛國特首和愛國資本家成了諸侯，香港是他們的封邑：「在中央的決策思維中，所謂『繁榮』就是要確保『兩制』下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不變，而資本主義制度的核心就是要保證資本家的利益；『穩定』就是理順香港內部的政治關係，理順中央與香港的政治關係，前者要照顧工商界的政治利益，後者要確保國家主權和愛國者治港。經濟『繁榮』是政治穩定的前提，政治『穩定』是經濟繁榮的保證。因此，在中央『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政治責任中，香港工商界無論在繁榮問題還是在穩定問題上都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十二]這是坦白得令人驚怕的中共治港思想。

港府的地產套利術

上世紀八十年代，面對工業及資金北移之危機，前港英政府想出高地價政策一招，利用房產價格長期上漲的預期，將港商在內

地賺取的利潤用樓宇投資回收返港，於是不需境外徵稅（也無法這樣做），樓房投資也可吸納國際游資、大陸的流失資金（flee capital）和南洋的避難資金。買房需要借貸，大量資金以房產的方式寄存於香港，有利銀行發展金融業務。港府的配套措施有六：一是限制土地供應製造市場緊張；二是以填海換取豪宅地皮拍賣，將海港兩岸的美景私有化，善價而沽，以豪宅價位帶領整體樓價上揚；三是以聯繫匯率固定幣值；四是銀行專以樓宇物業來抵押商業貸款；五是容許樓宇貸款採用無限個人責任，無法供樓的買主要個人負債，不可交回物業便脫身（即是不能如分期付款買機器一樣）；六是默許地產商出盡哄騙之術，詐騙消費者。六法齊下，樓價穩步上升。由於房產也涉及建築、裝修、家居消費等業務，在游資充足、貸款便宜的年代，可以帶動社會經濟。

間接徵稅及規訓市民

政府不必加稅，靠賣地就可應付公僕加薪、大型基建及不斷改善的醫療、教育和社會福利，維持治安良好，公共服務完善，令富豪世家、專業人士和跨國人員在此地安居。填海破壞香港海山美景，地產壟斷令地租騰貴，小商戶難以立足，但此法可回收境外利潤及吸取外資，提早套取稅款，充實府庫，徵稅又多來自

十一．陳冠中對此亦有精闢之評論，見〈民族國家與帝國〉，《蘋果日報》，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七日。

十二．強世功，頁一七八。

富豪和中產階級，再以公屋、教育和醫療補貼勞工階級的基本生活，只要地價平穩上升，外來資金源源流入，大家相安無事。高地價政策的政治經濟協作，是香港實存的社會契約。

港府假手地產商人，間接向市民徵巨稅。香港地產商的角色，與羅馬帝國時期的稅收包銷商（tax collector）近似。帝王將轄區（通常是新征服的郡）收稅之權外判予商人，商人向帝王承包固定的稅款之後，多收的稅金歸己所有，於是向庶民連哄帶騙，上下其手。英國舊時亦一度將某些稅收外判（tax farming），由諸侯代理，此法在香港發揚光大。特別是新開發區和大型屋苑及商場，地產商兼營商場及物業管理，用私人的嚴厲方法規管居民的生活及商場的公共空間，輔助政府規訓（discipline）市民，令香港人日漸習慣於過度管理的公共生活，形成順民甚至奴民的性格。加上中產階級動輒背負三十年的樓宇借貸，更不敢亂說亂動，只能默默工作。香港的中產，有中產的專業服務，卻無中產的階級覺醒和文化修養。

英國統治香港不採用政治代理人，由政府直接向各界別、政團及階級打交道，特區政府卻用了代理人制度，而且是怠惰又惡毒的那種，使到政府自己不必有所作為。地產商是港府的收稅代理人，也是規訓代理人，甚至是商業市場的調節者（market regulator），代理了政府財政收入（歲入）、規訓人民及管理市場的三大任務。地產影響香港的政治與文化深遠，香港在牌面是中國的特別行政區，實際是地產行政區。

（五）宜居灣區規劃：危及香港的地理完整

跨境的地產霸權，才是香港的心腹大患。臨界點，在二〇一一年達到了，因為宜居灣區規劃事件及大陸孕婦來港產子事件，觸犯了香港人的城邦地理及移民政策，啟動了原住民身份的意識覺醒，香港人終於忍不住了，發起自保運動了。

二〇一〇年年底，粵港澳三地政府倡議研究「環珠江口宜居灣區、建設重點行動計劃」，將香港、澳門、廣州、深圳、東莞、中山六個地區融合，諮詢過程不動聲息，後果卻是非同小可。該規劃建議香港的郊野公園、邊境濕地和荒野與內地用鐵路和車路打通[十三]，郊區成為住宅區，市內的金融和航運物流服務部分內移，舊區和古蹟成為內地人的文化旅遊消費區，叫「城市客廳」。規劃得具體而細微，這類巨型城市（mega-city）的鋪張概念，也是浮誇而過時，後工業時代的先進國家，摒棄多時。現在正是重回城邦與村鎮的優良傳統的時期，而不是甚麼「做強做大」，然而大陸卻拿這一套來強迫香港，包括與建毫無效益的高

十三．從大陸穿透香港郊野的車路，竟然稱為「綠道」，英文亂叫做green way，其實是country road。

鐵，穿透香港邊境，以便由北京皇城象徵式地直達屬地九龍，助長地方政府以區域發展為口號，變賣國土謀利。

香港是高度發展的國際城市，更有地理和生態上自給自足的城邦佈局。宜居灣規劃有兩個目的：稀釋香港的國際城市地位，並且殺滅香港的城邦佈局。在經濟上扼殺香港，在政治上殺滅香港。一箭雙鵰，此乃毀滅香港城邦生態的外科手術式的大動脈放血行動。香港邊境的綠帶和郊野，保護香港的生態完整和農業生產，是香港自主城邦的綠色長城——英國人用邊境的綠野委婉地隔絕北方夷區。此計劃是用外科手術，將保護帶刺穿、放血，毀滅香港的城邦性格，然後植入外來的癌細胞或細菌病毒，侵佔宿主，使得香港成為廣東省境內的一個普通商業區，而且人口以內地富人為主，香港本地窮人將內遷大陸。該計劃之下，香港將徹底的城市化和士紳化，打散原住人口的身份認同和共同價值。此後，香港民主鬥爭所依賴的本土族群意識便沒了根基，民主勢力自然瓦解。

英國人悉心建設的香港城邦生態格局，是香港人的福氣，也可以算是中國人的福氣，卻是中共的心腹大患。宜居灣區規劃的操作模式，是運用內地政府的強力行政權力，「輔助」港府規劃土地及興建高速交通網絡，再用地產財閥的市場權力，界定各地的地產價格，然後用地產的力量將香港窮人（九成的香港人！）逐步流放內地。這是跨境運作的中港官商勾結之下的超級地產霸權

勢力。為此，筆者在面書大力抨擊此規劃，並在報章撰文反對，也參與論壇演講。[十四]

中共是冷靜而殘酷的現實主義者，用時間換取空間，是中共慣用的謀略。中共在二〇〇三年的《基本法》二十三條國家安全立法失敗之後，在二〇一〇年將直選時間一再推延，換取得來的時間，改用「空間政治」的方法瓦解香港，破壞香港的城邦性格，將香港民主運動的社區基礎拆解。

從董建華到曾蔭權，香港政治大轉角：由保存香港城邦，轉向瓦解香港城邦。董建華籌謀香港經濟轉型，構思建設經濟、民生、文化等，也保護中下層生計，推出二元經濟與本土經濟。到了曾蔭權，撤手不理香港的經濟轉型，放任地產財閥壟斷經濟和扼殺本土生機，強硬興建高鐵連接內地，魯莽促成珠三角「宜居灣區」規劃研究，放言要香港窮人內遷大陸，香港要成為高增值的大陸人的「宜居」城市。

當中的轉變，出自中共經歷二〇〇三「七一大遊行」而作的政治收緊策略，出自香港官員的怠惰，出自大陸地方政府借助「香

十四・參閱陳雲：〈「宜居灣」毀滅香港城邦格局〉，《am730》，二〇一一年二月十五日。三月十九日參與城市大學的研討會並發言。記錄見〈陳雲：香港城邦保衛戰——宜居灣區規劃的民間研討會記錄〉（梁玉熹記錄）。網上閱讀：關注珠三角跨境灣區行動計劃https://sites.google.com/site/bayareadiscuss/discuss/chenyunxianggangchengbangbaoweizhan

港概念」將珠三角「做強做大」的浮誇意圖，更出自北京對香港政策的政治領導錯亂，甚至領導真空，任由官僚話事。又或者，領導香港政策的，只不過是一位按章工作的共黨官僚，並非政治家。[十五] 例如要保持香港的金融城市地位，卻又要用深圳的前海替代中環，這是自相矛盾的，只是不同的官僚提出方案，未經政治判斷便拼湊一堆，強推出來。

由於宜居灣區規劃反對者多，二〇一一年三月十四日上午十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閉幕後，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與採訪十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的中外記者見面，當中回答香港有線電視的記者問題，承諾將「堅持一國兩制的方針，認真執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嚴格遵守基本法。中央制定的十二五規劃都是支持香港的發展，中央的規劃絕不會代替香港的自身規劃。」[十六] 然而，總理的話不能作準。深圳推出的前海計劃（金融城市）、廣州推出的南沙計劃（商港），香港政府都有參與，都準備投入。二〇一一年九月初，粵港澳三方的「共建優質生活圈專項規劃」又提出來了，準備將香港的綠帶和郊野公園與大陸連接，這是宜居灣區計劃的殭屍復活。

由此可見，中共官僚千方百計要瓦解香港城邦。假如中共是正常的政府，應珍惜香港的城邦格局，將香港建設得像瑞士一般，有道德崇高的公民，自主的司法和政治，整全的經濟結構（由農業、精密工業、服務業到創意工業），講究誠信與規章的服務，

使中共的富人可以在香港寄存和管理財富，使香港繼續發揮金融城市的樞紐和屏障作用，幫助中國企業集資，阻擋國際大鱷對中國的金融掠奪。國際政治方面，吸引國際社會及民間組織來港設立地區總部，聯盟日韓，拉攏南洋，使香港可以協助中國成為亞洲大國。

在達致現代化的國族（nation）之前，一國之擁有城邦，猶如希臘有雅典、意大利有威尼斯和佛羅倫斯，德國有不萊梅、漢堡與法蘭克福，是莫大的制度力量和文化威力。在國家仍在亂世的時候，城邦將國族的實力集中、鞏固和提升，可以持續為國族建設輸送制度支援和文化動力，這是香港之於中國現代化的偉大貢獻。香港保存了王朝中國和民國的遺風，也引入歐洲工業革命與憲政革命的祖源——英國的遺風，是中華復興的大寶庫。[十七]

城邦是由悠久的歷史、整全的地理格局和繁富的社會生態組成的，歷史文物、地理格局或社會生態切割之後，城邦必亡。毀滅香港的城邦格局，可以為中共舒緩革命威脅，換來苟安的局面，但也令中共無法鍛煉自己，無法抵擋種種山雨欲來的危機。古時

十五．國務院領導香港工作的是國家副主席習近平，據說甚有機會出任共黨總書記兼國家主席。
十六．參閱全國兩會的官方記錄：http://news.hexun.com.tw/2011/5360/127897790/
十七．香港城邦之論，詳見本書第二章。

夏桀無道，人民就用「吾與汝偕亡」來互勉，推翻夏朝，成湯革命，是國史上第一次革命，人民的口號就是：我和你攬住一齊死，也要消滅暴政。二〇一一年，利比亞的正義人民也是這種心情，用人肉抵擋政府的導彈和飛機轟炸，消滅了自己的肉身，也同時消滅了霸權的奴隸。香港城邦之保衛，也許要用到這種志氣和決心。但願不必。

(六)

移民政策啟動香港的原住民意識

歷史契機，往往出自無心，香港歷史將記下二〇一一年。這一年，港府的財政司在公布財政預算案之後，遭受反對，決定首次向香港居民派錢六千元，新來港的大陸移民則無資格領錢。另外，大陸孕婦大量湧入香港產子以取得居留權及家族福利，香港民間有輿論稱之為「蝗蟲侵襲香港」，這無意中啟動了福利政策的原住民資格與權利的辯論，催生了香港族群意識，啟動了香港城邦意識，啟動了香港自主自治的議程，思考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原則，甚至思考後一國兩制的問題。

大陸人看清楚香港的公民權利與義務：香港的福利是在地的，香港人回到香港便有福利。香港的納稅也是在地的，不在香港工作就不必納稅。這種政策本來是簡省行政成本用的，但卻被大陸人鑽了漏洞，產子之後取得身份證，有病就帶孩子下來看病，適齡就下來讀書，往後就回歸大陸去了。[十八] 由於香港的福利和稅制不配合，香港在大陸的境外人口將形成香港福利的沉重負擔。

大陸孕婦南下，香港公帑北上。香港人是繼續思想懶惰，盲目跟隨所謂政治正確原則，以不啟動族群排斥為藉口，不敢去面對新移民問題，振振有詞打壓甄別新移民的意見，還是承認危機，迎接挑戰，思考香港的本土公民原則[十九]，思考香港的族群意識，以香港族群意識為基礎，融入新移民？

面對大陸孕婦來港產子的熱潮，不論採取策略思考還是採取行政措施，結果都是一樣，都會衍生香港的族群自主意識。各種行政措施的總體走向，會累積出這個結果。香港的公共資源有限，只能有序地、有原則地審批內地孕婦來港產子，限制其子女的居留身份權利，甚至不賦予居留身份權利，至於香港人的妻子來港

十八．參閱〈內地港童求醫增　威院告急　兒科工作量多25%「像計時炸彈」〉，《明報》，二〇一一年八月三日。

十九．本土公民原則是在政策意識上將享受全部公民福利的原住民和享受部分公民福利的外來移民區別開來。

產子，則香港必須要取回大陸移民配額的審批權，方便甄選外來人口入港，融入香港社會。

除了直系子女和夫妻之外，大陸新移民須經香港政府甄選才可以取得香港居留權，香港要繁榮穩定，必須保證自己的政治安全和資源安全，必須取回移民審批權。面對新移民，不是「利」的問題，而是「義」的問題。假如新移民願意信服自由民主這些香港《基本法》憲政精神及跟隨香港的風俗文化，甚至革新香港的風俗文化（往好的方面），香港人不會吝嗇給予福利補貼及優惠照顧，令他們順利融入香港，好好培育。香港庫房有的是錢，香港人要談的不是錢的問題，而是族群文化意識的問題：香港人願不願意那些倚仗中共而仇視香港人的大陸人入籍香港？香港人願不願意看到信仰極權政府的大陸人拿着香港護照在外招搖撞騙，敗壞香港名譽？香港人能否容忍有些新移民來了香港卻支持共黨極權政府，反對自由民主及不服膺現代價值，卻領取香港福利及佔用公共資源，反過來對付香港人，蠶食香港的價值，令香港走向衰亡？至於那些過境產子的大陸人，香港可以給予私家醫療，但不應給予居留權，這需要修改《基本法》。修改憲法，是行憲的正常現象，甚至是必須的行憲過程。

無法修改《基本法》第二十四條有關移民入籍的規定，則香港政府須採取行政措施，迫使大陸孕婦來港產子規範化，而她們回內地之後，港府應保持聯繫，知悉其居港意願，及早準備，並且

為內地來港定居的新移民安排宣誓歸化。宣誓歸化可以採取自願原則。新移民滿十八歲者，來港定居或取得居留權，可以自願選擇，宣誓效忠香港的《基本法》裡面的憲政價值。這是一個無法律約束力但禮儀莊嚴的儀式，它可以使新移民經歷精神洗禮，充滿信心，也使得香港人不必再歧視他們為外人。

二〇一一年六月，十萬名外傭申請司法覆核，要香港容許她們居港七年之後，有權申請入籍香港（但依然受到入境條例的限制）。[二十] 本書撰寫之時，政府仍在上訴，法院仍未判定，他們能否順利申請入香港籍，將又深化香港國民身份的討論：在大陸人居港權的香港法院判決中，強化了香港的原住民身份（依照英美普通法系國家的在地出生原則），但是大陸孕婦在港產子的案例，卻模糊了在地出生的原則（香港原則）與大陸法系的國族血統原則（中國原則）。這次外傭的居留權案，並非在地出生原則（他們不在港出生），亦非國族血統原則（他們並非漢人），將是純粹的、依照香港原則的宣判。由於香港擁有類似次主權的憲制地位，香港「國籍」[二十一]的問題是實際存在的，每一次的居港

二十・〈下月司法覆核 政府勝算低 做定應變 10萬外傭隨時做香港人〉，《蘋果日報》，二〇一一年七月十四日。筆者認為，即使港府設立移民法例審核，也有幾萬外傭可以入籍。她們改行做其他工作，香港一下子多了很多可以排擠大陸人的底層勞動力，而且識得講英文和西方禮儀。如果香港不是被地產霸權和大陸移民問題困死，這是中小企（特別是招待行業）的人力資源佳音。

二十一・這個國是用中國傳統的意思（諸侯、世族之國），也是西洋的古老城邦的意思，英文的state，請勿誤會為國家（country）或國族（nation）。

權（香港入籍的原則）爭議，都會將問題澄清，直至原則確立為止。至於此原則靠的是修改《基本法》第二十四條[二十二]，賦予香港移民審批權來徹底解決，還是制定香港法例事後補救[二十三]，還是用人大釋法的笨拙方法，又考驗中港雙方的智慧了。

外傭居留權的司法覆核，好似觸犯到香港人的本土利益而令某些團夥的人走出來叫囂反對，並咒罵公民黨協助當事人訴訟。對此，筆者有悠遠的文化顧慮。法治精神乃基於西方文化的兩個重要觀念：古希臘的形式理性及基督教的原罪論。形式理性是認定某個系統之內有其自足的理性原則，而這些理性原則不一定符合人類某個情況的實際利益，例如法官只能按照法例及法理判斷，而毋須顧慮判斷的後果，否則法律的詮釋將受到無可估計的世情變動而變得無可依循。原罪論假定人類的知性和良知有缺陷，不能充當全知者，必須接受某些理性原則（如形式邏輯學）或超驗理性（如上帝）的管制。香港人掌握西方的法治精神，從思想上、價值觀上，就是另外一個族群，與中國大陸人不同。即是說，基本法寫錯了，法官也一樣跟住錯的基本法來判決的，要道義，不是罵法官、罵打官司的公民黨，而是罵那些草擬基本法的人，罵那些阻礙修訂基本法的中共人。在香港，即使義人的官司輸了，有錢的壞蛋贏了官司，我們也不會打法官、燒法院的，因為我們知道法律是形式理性的遊戲，打輸了並不一定是理虧或犯罪，而是在法律的系統內輸了。這是極其弔詭的

形式理性。當然，在西方文化生活的人不必這麼費神去理解，香港由於受到東方專制主義[二十四]的衝擊，故此大家要學一點辯護之術。

香港受到英國一百七十多年的殖民統治，英殖政府也扶持香港以城邦身份成長，故此法治是不知不覺地引入香港的，上述兩個文化原則也是不知不覺引入香港的。西化夠深的香港人，不會懷疑法治，但西化不深的，或抱持愚昧的東方專制主義的中共匪民，便鄙視法治，認為是妨礙香港利益。他們這些人假設自己有掌握真理的能力，而這不是文明人應該有的態度。即使想一想這些態度，文明人都會覺得羞恥的。

二十二・《基本法》的修改動議的門檻極高，但如有共識，亦非不可為之事。

二十三・外傭有了居留香港的申請權之後，要證實她有固定工作和居所，而且與香港聯繫的緊密程度甚於其原居地，令入境處長信服外傭會放棄原居地而在香港居留，始可獲得批准。

二十四・中共的東方專制主義來自蘇聯的共產黨專政及沙俄遺風，加上秦始皇的秦政作風。中國儒家的禮治，輕微罪行則避免爭訟，由縣官主持調解，曉以大義，嚴重案件則依循法律審訊。當然，程序公義和搜證規矩，不及西方。英國殖民統治香港的裁判官（magistrate）傳統，也學了點中國儒官審案的原則，經常教訓人，曉以大義。這是其他地方的法官少有的。故此，香港真的是集合中西文化優秀之大全之地。

（七）新移民問題癱瘓了香港的政治思考

香港在九七之前，是工業社會，須要勞動力，而大陸難民在偷渡過程經過體格的自然淘汰，精神上也背棄中共，投奔自由，當年西方國家也有用收容難民來打擊共產國家威信的冷戰需要，港府收容大陸難民，以此為據。然則，九七之後，新移民問題變得複雜：香港過了渴求勞動力的工業時代，大陸新移民也不一定是投奔自由，歸順香港的社會價值，而是各有原因：家庭團聚、取得特區護照便利出國、貪圖香港福利和兒童教育機會、貪污者安置家小，不一而足。香港不再需要底層勞動力，需要的是顧及香港資源和發展需要的人口政策，包括移民政策。可惜香港沒有每日一百五十名額的移民審批權，以雙程證來港「旅遊」為名、產子為實的大陸孕婦，也沒計算在一百五十的名額之內。

然而，二〇一一年四月，大陸孕婦來港產子而危及香港本土資源一事，掀起熱烈討論，政團和社會福利組織，竟然機械性地用反對族群歧視和保護移民權利，紛紛採取了左翼的觀點，攻擊那些主張要限制或反對大陸孕婦來港產子的人是右翼法西斯，是三K黨。然而，右翼法西斯政治，在中國大陸，不在香港。香

港的某些左翼，真的愚不可及，左翼是反法西斯（anti-fascist）的，但法西斯不在香港，在中國大陸。中國大陸正向香港輸入某些信仰法西斯的人口，難道香港人不能加以辨別和攔截嗎？假若當年納粹德國向西歐輸入信仰法西斯的人口，難道西歐國家不會反對嗎？香港的左翼，口口聲聲反對香港的本土族群意識，硬說這些香港本土派是法西斯，卻不知道法西斯就在羅湖橋以北。真的替這些左翼嘆息，反了一輩子法西斯，連法西斯在大陸這個顯淺道理都不知道。[二十五]

香港的愚昧左翼——包括某些慈善團體，一向說不要搞分化，要共同向港府爭取，孕婦不分中港，共享資源。香港的醫療服務本來不錯的，政府也沒有藉口削去的，但今日的急症室和婦產科都被大陸人攻陷，才令到人手設備無法應付，令到本地孕婦要睡帆布床，甚至鋪在地上的床墊，而政府也大條道理說無法應付而擠走本地人，令香港人痛不欲「生」，行其「劣幣驅逐良幣」之政。故此，大陸孕婦與到急症室求診的大陸人才是香港公共醫療變壞的直接原因（immediate cause），而港共的親大陸孕婦、遠

二十五．嚴格辨別起來，中共只是法西斯的偏激版或滑稽版，但專政殘暴這些破壞工作仍是及得上的，捍衛領土、民族尊嚴、國族文化建設這些工作，就不配稱為法西斯了。這也是筆者在二〇〇〇的文章說明了。這裡只是簡單而言。除了建立軍備之外，中共目前也在搞甚麼文化軟實力、民族主義、國學、孔子之類的東西，也是法西斯建設工作的初期吧。

香港孕婦的惡政，是寄生於此直接原因的。我們一下子無法改變港共的反香港、保大陸的策略，但只要剷除這個直接原因，就可以用現有的醫療資源保障本地孕婦利益。有大惡，有小惡，有immediate cause，有distant cause，讀書明理，就是要分辨清楚大小遠近之別，分別應對。左翼那些傻蛋，就喜歡撈埋一齊講，罵就全部罵，幫就全部幫。這也是反智主義，與中共的反智主義非常合拍。故此，中共也培植香港的某些左翼，久不久來個小罵大幫忙。

再者，我們也不是反對權貴、暴發戶的大陸移民，只要他們服膺自由民主和香港風俗，經過港府甄選，他們是可以落戶香港的。各位千萬不要落入愚昧的左翼思想：喜歡貧弱而憎恨富貴。我們是一樣歡迎富貴的大陸移民來香港的，香港應該歡迎他們將財產和資金轉來香港的。[二十六]

中共是殘酷而冷靜的政治現實主義者。只要維繫統治，犧牲新移民，令港人與他們對罵，坐視香港族群鬥爭，轉移視線，分而治之。然而，提出香港本土意識，並非要犧牲新移民，而是要保護他們，融入他們，我們只是反對中共任意派遣新移民來港及放任大陸孕婦來港產子而已。已經居港而未取得香港籍的新移民，我們要他們服膺憲政民主和自由多元化。只要我們論述清楚，這些土共裝扮的假本土派、愚昧左翼便不能得逞！香港的本土派也

要有點耐性，清晰論述自己的合理立場，令那些願意融入香港的新移民安心落戶。我們是會保護他們的。

一些社會福利團體，服務新移民、爭取新移民權益是彼等既有的服務項目，一些政黨企圖拉攏新移民的票，也有一些不分青紅皂白，只顧佔領民族統一或世界大同的道德高地，它們機械式地維護新移民，不顧慮香港的資源，不禁令人惋惜：界別的小利益（sectorian interest）遮蔽了全港利益。新移民危及香港資源及人口政策，這是任何一個政府都必須處理的，但香港的政黨由於不準備執政，又抱持愚昧的中國大一統思想，故此只會批評人家歧視大陸新移民，而不會用香港本位的資源問題來思考。至於政府，也是用孕婦的產科醫院床位資源的配額來處理，不敢檢討移民政策。至於教育部門，則因為將來跨境學童數目增加，可以避免小學「殺校」，故此暗中歡迎學童來港讀書，歡迎大陸孕婦來港產子。如此荒唐的政策衝突，在香港政府之內發生了。

二十六．生育之政，是所有政治之首。《易經》說：「天地之大德曰生。」唐代名醫、藥王與醫神孫思邈的《備急千金要方》，開頭的第一門就是婦產科。港府必須保護本地孕婦的生育權，始可考慮其他外來產婦。

(八)香港要有本位思考：移民審批權和入籍程序

面對大陸孕婦來港產子的政治挑戰，曾蔭權政府採取的是政治決策真空的類無政府主義（quasi anarchism）。筆者無意為這個政府分憂，在此探討解決大陸孕婦來港產子問題，只是當作是探討香港族群意識的機會而已。

首先，應付大量外來人的服務需求，一個稍為智力正常的政府，都懂得採取區隔原則（separation principal），境外人士來港買樓如是，境外人士來港產子亦如是。在未能修改基本法，限制大陸孕婦來港產子取得居留權之前，香港可以做的，是行使《基本法》、香港法例及行政措施許可的方法，限制大陸孕婦來港產子。首先，是服務區隔。急症之外，公立醫院不接收並無港人丈夫的大陸孕婦。私家醫院接收這些大陸孕婦的，必須先取得入境處的同意，否則這些孕婦連入境也不許，遑論入私家醫院產子。由於立法需時，政府可以採取權宜行事的原則：由於產子涉及龐大的手術風險，私家醫院必要時是要動用公立醫院資源的，香港政府可以責成醫院管理局負責給予每年的緊急資源配額予私家醫院，私家醫院如果不能取得配額，則在手術出現危險的時候，不能優先動用公立醫院資源配合。這樣可以令私家醫院知難而退，不能濫收大陸孕婦。

當然，一切措施都敵不過蠻夷：大陸孕婦利用急症室的漏洞來港產子[二十七]，也有臨盆在即，由快艇送來香港分娩的。這是「來生不做中國人」的寫照。

香港必須取回移民審批權

香港人反對某些新移民來港，不應限制於佔據公用設施（內地孕婦來港產子）或福利（欺騙綜援、佔住公屋）的簡單議程之上。反對新移民的目標，是反共，反對中共用受過中共思想荼毒的險惡人口滲透香港，破壞香港，利用香港人公帑供養的福利金，在香港設立反對自由民主的政治基地。

以前的英國殖民政府歡迎內地難民來港（抵壘政策之前），是他們偷渡來香港，本身已經經歷過追求自由、反對極權的思想革新，偷渡來香港是政治信仰的血性體現，故此可以迅速融入香港的西方自由社會。現在的新移民，很多有忠於共產黨的思想，充當中共的平民間諜[二十八]，很多也會成為港共的投票機器[二十九]，是自由法治與憲政的蠹蟲。香港要掌握審批權，來了之後也要協助

二十七・〈內地孕婦 闖急症產子 52%〉，《經濟日報》，二〇一一年五月二十六日。

二十八・這當然是筆者的判斷，無法證實的，筆者也毋須理會人家的駁斥。

二十九・這也是無法證實的。投票是秘密的，也從未有過這類調查。

社會融合的程序，就是令新移民變成香港人。將來香港入籍的要求，是有基本的粵語或英語能力，或與香港有相當聯繫（親戚、工作等），服膺基本法的原則，宣誓程序，是熱愛香港，願意融入香港社會。

將來中港雙方有協商，也應取回大陸旅客入境香港的簽證權。目前，香港政府或民間應該發起一些運動，表明香港人的立場，希望自由行來消費購物的大陸遊客自重。當然，也見過一些大陸遊客有禮貌和懂得在地鐵讓座的，然而一般的印象是他們被中共壓迫太久了，缺乏安全感，又有一身匪氣，喜歡霸佔位置和資源，盡取利益。[三十]

由於大陸不斷走錯路，也許永遠不能走入現代社會，香港人必須忘卻大陸，但香港永遠無法擺脫大陸，因為香港永遠是大陸解決各種公私問題的活口。香港必須鞏固邊界，鞏固本土文化，建立族群意識，才可以人格自主，茁壯成長，並繼續充當大陸對外的活門。本位思考與族群意識是現代政治最險惡的議程，但也是無法迴避的議程。重申，我構思的香港本位和族群意識，是基於一般政府的資源分配原則——本地人優先的原則，族群意識則基於儒家華夷之別，基於《基本法》的自由民主與憲政信念以及中華傳統禮義及香港現代價值，即是基於憲政信念及文化習俗（很多國家的歸化標準都是包括這兩點），而不是基於甚麼血統、階級或籍貫。《基本法》不是完美的小憲法，但只要嚴肅待之，充分

行使，在中共的監察之下，可以弄假成真，逐步達致香港人的共同理想——建立自治城邦，在未來中華邦聯的憲政架構之內。

三十．〈內地婦公院病歿欠20萬　揭院霸耗公帑年走數3000萬〉，《蘋果日報》，二〇一一年九月十七日。

第五章

展開公民運動，維護一國兩制

（一）香港本土意識的形成過程

（二）解除殖民枷鎖，建立香港本土文化

（三）認識本土歷史，重建文化榮譽

（四）參與政治，奪回「大數」的話事權

（五）洗心革面，尚智行仁

（六）龍獅香港旗的精神象徵

（七）全民決志，城邦自治；
堅定信念，停止疑惑

（八）Hong Kong Diaspora計劃：
聯絡香港僑胞，傳播香港文化

(一)香港本土意識的形成過程

除了早期定居的王朝遺民之外，香港大部分的居民，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湧入的一百萬大陸難民的後代，難民後代大部分並無本土意識，有的只是個人意識（自保、自利意識）和舊中國的中華意識，要他們培養出本土意識，必須經歷正面的薰陶和災難的反面衝擊。正面的薰陶，來自英殖政府的社會工程和公民道德教育，前者如公共屋邨的共享設施的公共空間教育、香港電台市民論壇的公共諮詢教育，後者如清潔運動、廉政運動等，當然，零星的公民示威與抗命，也有功效，如蘇守忠一九六六年在天星碼頭絕食示威，抗議渡輪加價。

反面的衝擊，威力更大。積極的、正面的社會教育，只能接觸到積極投入的市民，反面的衝擊，連被動的市民也波及了，連親共家庭、中國意識強烈的人、冷漠犬儒的人，都無可

逃避，要思考自己的家園何在。反面衝擊和正面建設是交替、糾結地進行的。第一次的衝擊來自一九六七年香港暴動，其後有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門民運，以及香港九七之後的抗爭運動與隨之而來的殘酷鎮壓。六七香港暴動形成了香港自外與大陸政治的偏安格局，因為大陸的文革鬥爭在香港延續的後果是治安混亂和經濟蕭條，這切斷了香港人以前的抗日陣線、省港大罷工的中國意識。一九六七年的港共暴動，打擊了港人的中國意識，英殖政府趁機為港人灌輸現代市民公德和修養，並同時間改善政府施政，開放民主選舉，扶植一家象徵香港通俗文化的免費電視台（即TVB）[一]，容許中文成為官方語言，設立更多大學和文化場地，獎勵本土文化教育，形成旺盛的本土經濟和本土文化自豪。[二]上升的香港市民士氣，遇上大陸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開放改革，與內地的奮發圖強、開放經濟與開放社會的氣氛結合，形成空前的中港氣魄相連相盪的黃金時代。這個黃金時代，被一九八九年六月的中共殘酷鎮壓天安門民主運動打斷了，港人重燃的愛國心遭受創傷，無法彌補，只能以年年悼念的方式宣洩痛苦。大陸的思想開放和民主建設也停滯了，倒退了，鐵腕統治加上消費擴張，令大陸人慾橫流，

一、電視廣播有限公司在六七暴動之後獲得電視台牌照，在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九日啟播，是官方「御准」的平民電視台。

二、這個過程，可參考陳雲《香港有文化——香港的文化政策》，第三章第四節「大會堂、工會暴動與香港公共文化之濫觴」，香港：花千樹，二〇〇八。

公德私德敗壞，另方面，英殖政府在本地開放民主，企圖建立民主香港來抵抗共產黨的主權接收，令港人關注香港事務甚於中國事務。

九七之後，香港因貨幣遭受聯繫匯率「禁錮」、人民幣升值引起香港通貨膨脹、地產霸權肆虐、經濟結構單一化而令普通市民因經濟富裕而產生的自豪感降低，另方面，卻由於蜂擁抵港的自由行大陸旅客當中的種種劣行而令香港人的文化自豪感提升。大陸頗多暴富，靠的是倒賣、官商勾結或圈地強拆，也令香港人鄙視大陸來港奢侈消費和買樓的富人。二千年之後，由於青年和中產要保護自己的社區活動場所、市民記憶空間乃至平民生存環境，興起保育喜帖街、保育天星皇后碼頭、保育菜園村（反高鐵、保菜園）的運動，重義而輕利，或者重視市民共同長遠利益而鄙夷短線私人謀利的本土意識正式成形。這是貨真價實的本土意識。

香港形成本土意識之際，也萌生普世價值，二〇〇三年的七一大遊行反對國家安全立法之後，學者和政黨人士推出香港價值的宣言，高舉自由、民主、人權、法治、仁愛等普世價值。生活上也興起環保、綠色、低碳、關注地球、選擇本土食物、熱愛小社區生活、自給自足生活等樸素方式，這也令香港的本土意識有了普世基礎，甚至合乎世界潮流。

香港之外，別無家園；羅湖以北，便是異域。本土意識呈現出來的是一群青年的街頭抗爭活動，且牽動大部分市民意識的改變。例如元朗南生圍和西貢大浪西灣那些破壞生態的地產發展，即使是在私人產業上進行，也不會再得到市民的默許。

(二) 解除殖民枷鎖，建立香港本土文化

「事頭婆」（英女王）生日有假放、雅麗珊郡主訪港、戴安娜公主結婚、考GCE去英國留學、HKCE的成績等同英國GCE、英國會計師公會考試、英國ILL的資格等同大學畢業、去英國開餐館刨薯仔、學英文做生意、學會英文闖天下、見到西人官長自動點頭，大聲講「Good morning, sir!」

殖民地的統治要訣，在乎製造依賴（dependency）。依賴軍事保護、政治指導、產業保護、技術指導、經濟援助等，平和的殖民者，以製造依賴來互相利用或平衡勢力，惡劣的殖民者，則借助保護、指導和援助之名，形成掠奪或壟斷。英國給予香港現代行政（公共政策、公務員制度等）、軍事保護、法治、工業技術

指導、出口配額保護、英文教育[三]、西方關係，然而由於中共聲言隨時收回香港，英國不能當香港是英國的屬土，用照顧英國子民的態度來教育香港人，避免一旦中共收回香港而此地大逃亡，便要負上安頓屬土子民的責任。故此，英國這個現代制度的起源國、文化強國，帶給香港人好多傳統（heritage），也令香港人背負匱乏（lack）。特別在簽訂《中英聯合聲明》之後的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至一九九七年，匱乏更為明顯。這些八十年代留下的匱乏，包括農業保護、工業升階、政治技術、精緻文化、學術研究和西方人文哲理的匱乏，這些匱乏形成香港的自治基礎不足，無法抗衡新的、更為惡毒和不講原則的殖民宗主之降臨。這些匱乏，都是九七之後的香港人必須追補回來的，否則無法解殖民地化，實踐香港城邦的完整自治。為了香港的自治與成長，中共要離開，英國也要離開。香港人莊敬自強，處變不驚。

英國製造的依賴只是技術依賴，並非經濟依賴，而這種依賴雖然有意促成，但無意禁止（甚至讚賞）某些覺悟的香港人學習更高的技術。英國與香港的經濟分道揚鑣，香港在經濟上甚至比英國繁榮、自由和進步。即使是技術依賴，也給予香港人的英國標準（British standard）[四]的學歷和專業技術。中國製造的依賴是經濟上的依賴，而且是有意的、踐踏尊嚴的，不容挑戰的依賴。中共要香港依賴中共提供的表面是優惠、暗中是掠奪的所謂經濟援助，卻無本領達致香港在技術上的依賴，因為中國的標準臭名遠播。香港主權移交中共，是賠了夫人又折兵。

先說英國帶來的優點。英國帶給香港平民的最大好處，是得到學歷和技術提升，接通西方世界。香港的教育資格受到英國公開考試的對等承認，英國開放各種專業考試和會籍資格予香港人，英國的法、商業習慣和英文也是通行世界。香港人在英殖政府治下，學到的學歷和技術變成難民社會最可靠的流動資產，出外留學、經商、越洋司法訴訟都十分方便。[五]英國給予香港的產業配套和技術提升，也令香港人得到工資收入、晉升機會和創業致富機會，而這些機會是透過在自由世界的公平競爭而得來的，故此香港庶民的社會階級流動上升之後，也令社會有強烈的道德士氣（high social morale）和論功行賞（meritocracy）的人間正義。各方面的英國標準（British standard）曾是香港進入國際社會、位列世界先進之林的扶手杖和推進器。

英殖政府之勵精圖治，也間接增加了港人的依賴感，增加了九七之後的無力感。情況有些像中國人在清朝（外來政權）的民

三、對比澳門的葡萄牙殖民地，澳門人就得不到很多國際通行的文化優惠。

四、例如英國的建築標準、衛生標準及安全標準，即使香港在五十、六十年代因貪污盛行而偷工減料，也不至於有安全隱患，因為標準十分高，打個折扣也無妨。

五、在英國的協助下，香港老早是「海牙條約」的成員，香港人到歐美升學、就業方便。在香港，「海牙條約」指定專門負責法律認證的機構是香港高等法院，只要把香港的證書帶去金鐘高等法院認證蓋印，便可以帶到歐美國家使用。中國不是「海牙條約」的成員，故此大陸人出國做事十分不便，故此大陸人許多借助香港「過橋」。香港專業團體更與大陸辦理「學術互認」，大陸人先透過香港洗底，然後以「香港資格」走向世界。此舉或會連累香港。（感謝網友提供此註腳）

族人格墮落。滿洲雖然是境外政權，但滿洲是王族，清初四帝又算是賢德之君，令中國士人坐視皇權膨脹而依賴明主。香港人的依賴性格也由於信任英國殖民主建立的一套良好的制度，也不提防其奴化和匱乏之處，不會自我補回。一九九七，新殖民主來了，他們並非高貴的王族，卻不斷膨脹權力，但港人奴性不變，即使明知要反抗，也有無從入手之嘆。

殖民地剝削方面，由於英國並不與香港接壤而英國人極少移居香港，香港也不是提供農林原始資源之地而是提供服務的商貿城邦，殖民地剝削的感覺不明顯。英國銀行、英商會、建築工程公司、藥廠等也是世界有名，即使港府優惠他們在香港做生意，香港人也覺得是因利乘便，不覺得港府特別偏袒英商。

英殖政府統治香港的缺失和匱乏，在於未將政治、文化和學術的本領傳授予香港人。上世紀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香港的公立學校有優秀的中文文學教育和中國歷史教育，但英文教育只是工具式的語文教育，並無納入歷史、文學、哲理和宗教[六]。在政務範圍，英國人或英聯邦的人員佔據高位，無疑給予香港官員很多優秀的政治領導，而即使有官員獲得保送英國訓練，也是短期的技術或知識傳授，少有給予統治的道理和經驗。英國的研究隊伍、文化學術交流人員，也是短期來港採訪和調查，研究或訪問完成之後便離開，英殖政府也並無在香港設立足夠的研究機構（研究所、博物館、檔案館等等），本地大學也缺乏歷史悠久的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的研

究機構，研究範圍也不以本地為主，未能扶助香港建立城邦的文化身份和學術儲備。香港的政治參與，則是英國家長輔導式、或官方吸納式的，而不是獨立而主動的公民參與。

九七之後，中共只是新的香港殖民宗主。政治上，中共積極鑽殖民地的惡法和領地制度剩餘權力的空子。人口政策上，中共促使香港大量接收大陸移民人口。經濟上，中共積極發揮大陸資金和遊客的干擾力，又不斷灌輸香港領受了大陸的恩惠，製造香港仰仗宗主國施捨的齷齪形象，顯露了殖民地制度最惡劣的一面。以前英國為香港爭取到最優惠關稅和出口配額，並無大張旗鼓，因為這是宗主國的責任。中國給予的港股直通車、人民幣離岸市場、人民幣債券市場、大陸資金輸入樓市等所謂優惠，港府並不以政府全民公積金（香港沒有這個制度！）買入或抽取更高交易稅、物業稅等方法而令所有香港人得益，只是令香港的金融地產炒賣更為熾熱和動盪，令小市民蒙受損失。大陸自由行遊客也只是利益了地產財閥的商場租金收入和負擔得起貴租的連鎖企業，形成香港中小企的滅絕行動：商場的租金提升和遷就遊客的消費格局，逼走了本地中小商和本地民生店鋪，大陸客引致的市面和公車擠擁，乃至部分大陸客

六、六十、七十年代的殖民地英文教科書，仍有一些英國故事，例如Sir Walter Raleigh見到伊麗莎白女王（伊麗莎白一世）在街上遇到水窪，便脫下外袍墊住，使女王安然步過，不致周章繞道而失態。我仍記得英文課本寫The queen was immensely amused.爵士做的不是臣子的奉承，而是武士的幽默。

的不文明行為，更令接觸他們的香港小市民怨聲載道，也令香港的旅遊格局下降，令旅客市場單一化和低賤化。

挽回香港的城邦地位，繼續貢獻中華天下，香港人當下要做的事，頗為艱鉅：要承繼往昔英治時期的優良傳統，補回英治後期的匱乏，建立中西文化揉合的香港本土文化。假若中共並無改變作風，香港人將要用民間力量發動文化復興和經濟復興，與港共暴政和地產霸權周旋，甚為吃力。此外，更要應付兇惡、愚笨而愛面子的新殖民宗主。然而，由於中共仍長期需要香港的先進金融市場和國際地位，只要香港人覺醒而團結自強，也許中共出於無奈而接受或歷久而開竅，香港自治運動仍是有可為的。

一、認識本土歷史，重建文化榮譽

二、參與政治，良性互動

三、讀書求學，尚智行仁

四、堅定信念，停止疑惑

五、建立香港文化符號象徵

六、聯繫海外港人，擴闊世界網絡

（三）認識本土歷史，重建文化榮譽

阻礙香港人認識自己、肯定自己的，除了是殖民地匱乏的教育和鍛煉，還有民主中國、乃至文化中國的迷障。民主中國的迷障與奸險，在第一章演述過了。好多香港人因為缺乏正義的理論支持，不敢抗拒民主統一論，回到建設香港本土的事業上。怕人誤會是自私自利、不理中國同胞死活之類。然而本書第一章說明，大陸禮教淪落，中華文化不在中國而在香港，中共無心改善也無力自我完善、大陸同胞已經被中共毒害而香港人不能與之共處一國、中共崩潰之後軍閥會南下佔領香港、即使中國民主化之後極有可能淪為法西斯軍國主義國家，香港與民主中國融合只會兩敗俱傷，甚至賠上香港人的儲備金和子弟性命。

文化中國的迷障更大。香港人或海外華僑的中國情意結，本身是個「從未見過情人，卻苦戀而不得，於是自欺甚至自殘以贏得愛情」的心理癥結。打爛這個要人不斷獻祭的女神、母神，即是iconoclasm（打破崇拜偶像），是香港人的心靈革命，之後才有真實的政治，才有真實的前途。

海外華人憧憬的「文化中國」與無家無國之殖民者盤踞之殘酷中國，兩者不能相容。如真的要建立文化中國或文化中華天下，只能在中國大陸之外。文化中國的概念，是當年新儒家逃難海外而創造的。當時中共根基未穩，洗腦教育、摧殘文化與敗壞水土的行動仍未實施，加上東西方冷戰，若是台灣反攻大陸成功，恢復中國是有可能的。現在，六十年過去，狼毒之黨國加上一群狼毒之民，在中國故土恢復中華禮樂，看來是無能為力之事。

同是殖民統治，英國、法國、德國、甚至日本的殖民統治（統治台灣時期），都不及中共之殘酷與無理性，而中共之統治邊區，也比清朝統治藩屬來得殘酷，就因為中共是無家國牽繫的殖民霸權，行事無規矩法度、無道德底線。看清楚，便會對中共絕望、也隨之對中國失去希望。蔣介石早期統治台灣，也是非常殘暴，就因為他是一時失去家園的殖民者，後來認同台灣本土，在台灣建立中華文化復興基地，便開始文明統治了。

中共黨徒起初是一群社會游離分子（social outcast），受到蘇聯的蘇維埃集團的籠絡和收買，成立中華蘇維埃（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七），成為在中國執行蘇維埃殖民政策的代理人。他們起初是一群接受蘇聯津貼和支配的特務，後來發現蘇聯的指揮太麻煩了，例如要保證民主人士參與政治及保證少數民族自主甚至獨立，於是便脫離蘇聯自立，廢除中華蘇維埃，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此後，這群離鄉脫教的人成為無主孤魂，沒

有主人控制和沒有家園的殖民者。他們隨便改換姓名，不認宗族，隨便結婚離婚，隨便批鬥和殺害同志，隨便毀壞孕育他們的中華文化和中華大地。從立法會剝奪市民投票權之例，可見中共的極權病毒，已入侵香港，毀壞香港的憲政、公義與人心。中共的殖民霸權行為，猶如外太空投擲到地球的病毒，無家無國，其侵害行為之惡毒與無理性，超越人類史上的所有暴政。

中共的本質是病毒（virus）。細菌是惡毒，但有智力和自制力，一般不會害死宿主。病毒是惡毒、有智力但缺乏自制力，連宿主也害死的。中共在中國做的一切，有如境外政權、殖民主義者：大興土木、胡亂規劃、亂劃地界、胡亂遷徙、耗盡資源而且以鄰為壑，一切都是惡毒的殖民主義者行為、病毒的行為。一般的殖民政權，由於有本國文化和制度的制衡，不會太壞，中共是喪失國族認同的殖民主義者，脫離蘇聯之後，成了無人掣肘的無主惡妖。在中國歷史上，只有滿洲政府的統治狀態，才可以略為比擬中共之邪惡形態。同樣是共產政權的殖民主義者，蘇聯政府對待加盟共和國和東歐諸國，乃至俄羅斯本土，都不及中共之殘酷與瘋癲剝削。原因很明白的，蘇聯是有家有國的。中共則無家無國。蘇聯統治時期，仍有思想家、文學家、藝術家、科學家，人才輩出，無有間斷。中共統治中國時期，人才凋零，甚麼文化建設都沒有。用蘇聯來比擬中共，可以看出中共的邪惡，乃冠絕古今，人類千古以來之惡孽，非筆墨可以形容。很多海外華人，以為自己可以感化中共，可以玩「美女與野獸」的遊戲，是太天真了。

香港人不應對中共有甚麼希冀，也必須放棄對大陸民主化之後如何裨益香港的憧憬。對中共、對中國、對大陸人必須做最壞的打算，有意外收穫固然可喜，但不希冀就是。不仇恨大陸，也不歧視大陸人，而是對大陸沒有希冀，香港人自己打算。中共有一套傷害人民來惹起仇恨和恐懼的統治心術。不論大陸的事情如何令人激動、氣惱，香港人要心情平靜，無欲無求，無仇無恨。一旦真的仇恨中共，你就被它捆綁。

蘇聯會因為共黨覺悟前非而放手，任由東歐集團解體和民主化，蘇聯自己也很快過渡到民主政權（儘管帶有法西斯性質）。即使在極權時代，蘇聯也清算了斯大林的暴政，而中共至今仍未清算毛澤東的暴政。一切我們適用於民主化的理論——中產階級膨脹論、資訊開放論、人均收入提高論，都不能應用在中國身上。因為中共是缺乏主體意識的統治者，只是如超級電腦一般，執行一套綜合的統治技術，將中國變成matrix[七]一樣的世界：沒有壓迫性的主流意識形態，也沒有對抗性的反抗意識形態（no ruling ideology, no resistant thoughts.）。統治者如喪屍，被統治者也如喪屍。明白這些真相，香港人要放棄了中國的民主寄望。中國是無法抵禦真正的災難的（襲擊主要城市的地震、核電廠爆炸、超級通脹、大型流民暴動等），遭遇危難之時，是有可能暴烈地解體的，中國變成法西斯的軍國主義，已經是不錯的命運了。

這樣的政權統治中國大陸六十幾年，大陸可謂無可救治，香港人先要保護香港，不要沉迷於拯救中國的大業，也不要再用文化中國、鄉土中國等概念來痲醉自己了。特別是文化中國和鄉土中國的情意結，很多泛民中人，也無法擺脫，以致被中共劫持。

(四) 參與政治，奪回「大數」的話事權

殖民地統治的方法，是製造依賴，但只有蠢人才會甘於依賴，甘於受人擺佈。故此殖民統治必須愚民。然而，人是智慧生物，豈容愚弄？愚弄的方法是消耗智力，如清朝用八股科舉來消耗生員的智力，用毫末考證來消耗儒士的智力。英殖政府用的方法，是將政治行政化，將公益私利化。用的方法是切割（compartmentalise），所謂政治行政化，是將整體的政治考慮分割為各個行政措施，用研究、諮詢和檢討成效的方法，號召本地社會賢達參與其中。例如英殖政府宣稱不干預主義，從未實施產

七·母體。比喻集權國家好像電腦的母體經營電腦機械人系統一般，將人民變成無思想及無意志的行屍走肉。

業政策，但它用爭取出口關稅優惠、美國配額、土地供應、靠近工業區的廉租公屋、工業學院等方法，將產業政策切割為外交干涉、城市規劃、房屋政策、教育政策等範圍，只有港督會同行政局（Governor in Executive Council）知道產業政策的全局，一般人只認識各個切割措施的執行，若干年後，目睹香港的所謂經濟奇蹟出現，然後歌頌港府宣傳的不干預主義。[八]

政務切割之後，市民無法思考公共利益（公益），例如土地政策與城市規劃的正義、公共財政如何回饋市民、文化教育政策如何削弱本地文化身份等，為了補償這個公共事務的「參與匱乏」，殖民政府開啟了私利的奮鬥歷程，將市民的利益，導向私利範圍：用買樓階梯（公屋—居屋—私樓—豪宅）來置業致富，用教育來爬升階級，用創業階梯（小販—屋邨商場店主—街舖—商場大舖；山寨工廠—大廠）來滿足青年人的衝創意志（will-to-power）等。港府把持社會的大數（big sum），任由市民在細數（small sum）上奮鬥。由於英殖政府的大數仍算公允[九]，食利集團（rent-seekers）仍留在實業範圍（出入口貿易、製造業、航運之類），大數的膨脹可以下降（trickle down）到細數，而細數在香港經濟持續增長下不斷脹大，官民各得其所，社會歌舞昇平。

現在中共使用的教育階梯和置業階梯的統治術，用出賣官地來預先徵收稅款、充實官庫的政術（當然中共做得不盡不實），就是抄襲英國殖民政府的政術。香港城邦自治運動，是不甘於停

留在殖民階段，而是要走前一步，在香港建立公義社會，垂範中華。當然，期間香港衍生的政術（管治術）創新，也可裨益中共，使其政權延年益壽。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末，美國濫發美元，輸出美國債券，向全世界抽稅。香港由於不行使主權基金意識，在全球金融資本主義和衍生詐騙術的防衛與攻擊方面，可謂吃盡苦頭！香港龐大的、有主權國家操作意義的儲備金，投資去了哪裡？儲備金為香港人做了甚麼福祉？大家知道嗎？能舉得出來嗎？香港人無法過問「大數」，香港人只會在自己一層樓、股票基金戶口的「小數」上動腦筋。

九七之後，香港進入金融資本主義階段，與政府勾結的食利集團經營的不再是實業而是剝削實業的地產霸權，工業北移、中小企發展受到高租金的蠶食，加上政府刻意打擊小市民的創業機會和教育階梯，製造階級僵化，而過去的統治術因為經濟轉型而失效，即使修補也無法維繫，香港要重新思考和制定政策，緩解壟

八．這是事後概括的歷史解釋，當年行的卻是英國常見的漸進經驗主義（incrementalism），事情開展之後，政府逐步改良和補充缺失。政術切割的意思，是政府只是公布各個單獨的政務範疇，不會將全局效果整理給市民知道，提高市民的議政意識，故此是愚民政策。網友補充，英治港府不行全面工業政策，乃形勢使然，要政府資助發展某個行業，必要令政府對某行業有所偏袒，搞得不好，商業利益集團會在政府內滋長，製造民怨；政府支出大增必要加稅，一加稅就觸及民主化的敏感議題。再者，六十年代紡織及輕工業全速發展，港府可以成本較低的政策去促進，毋須以工業政策去發展，如貿易發展局、生產力促進局、工業學院、理工學院、職業訓練局等都是戴麟趾政府之產物，以彌補政府欠缺產業政策之不足。

九．因為當年香港儲備金不多，不能浪費，英國亦不會救助香港經濟，故此港府必須用得審慎。

斷，發展實業，並且運用龐大的公帑和政府資產在金融資本主義中為市民謀取公益。

目前的香港政府，是被中共和地產財閥騎劫了的政府，也被香港高官打劫的政府，不是我們香港人的政府。香港政府管理住龐大的公帑和共有資產，香港市民要參與政治和公共事務，討回大數的話事權。政治不是民主和本土意識那麼抽象的事，是關乎市民已經忘記了的共同家產，關乎嚴峻的民生發展。沒有政府的大環境配合，小市民的小數，是無法戰勝被官商勾結集團包攬的大數的。民主就是民生，投票就是投資，公帑是香港市民的錢，如何動用，政策要以民主過程商議和制定。香港貧困的人得到救助，珍貴的土地資源得到最有效益的使用，社會充滿仁愛、快樂和熱誠，很現實地說，是可以提升整體生產力的。

(五) 洗心革面，尚智行仁

雖然香港人不必對大陸有負疚感，但香港人要懂得反省，懂得解除無謂的精神枷鎖，才可以獲得城邦的新生。

香港很多人都有行路霸街和不避人的壞習慣，我十幾年前在《信報》和《明報》寫過了。缺乏對其他人的禮讓和關懷，源自公共觀念與公共生活之匱乏：香港政府將所有公共議程取消，化為私人議程（用進修、供樓，最近財政司用派錢代替公共財政議程），迫使港人自私自利，方便統治。人人自私之後，唯一可以統治公共生活的，便是極權政府。這是極為惡毒的統治術。哪些報紙雜誌天天鼓勵自私是好，哪些經濟學家及專欄作者日日鼓吹自私（selfishness）是美德（而不是自利self interest），認清楚他們，他們就是極權政府的管治夥伴。自私的人只能做下游的毫末工作，自利和利他的人才會懂得分析大局，縱覽大局而控制世界，孔子講的仁者治天下，就是這個道理。中國人傳統以仁義禮讓為本，對於私利總是不好意思去取。將自私變成香港中產的信仰，振振有詞將賺錢謀生視為天經地義，中間要經歷殖民政府開動意識形態宣傳，花幾十年的教誨和誘導。這個過程中，很多人都沾滿罪孽。

我們期望他們出來悔罪。市民自己也要悔罪：以前自己嘲笑過人家爭取公益、爭取民主的人戇居無聊的，現在都應該知道，香港人享有的民主、自由乃至市場經濟都是迷障，香港需要解放，重新得到自由去開創天地，政府也要提供發展環境，但毋須給予思想指導或個別優惠，設立甚麼數碼港、物流港、中藥港、鮮花港之類，淪為限制自由的計劃經濟。

香港人的先輩經歷戰亂和偷渡的考驗，來自五湖四海，人種極其優秀。香港許多青年，已經如先進社會的青年一樣，嘗試透徹理解世界和社會，追尋自己的理想，並且要創造一個人人可以追尋理想的社會。政治是複雜糾結的事，青年人參與政治，即使將來不從政，這種見識和經歷，都是可以轉移到其他範疇，成為人中之龍。正如德國人說的Gründlichkeit（down-to-earthness），透徹理解、貫徹行動、不低頭不妥協。這種精神，正是民主政治參與必須的，即使用於企業精神（entrepreneurship），也可以幫助香港將來拓展世界舞台，衝出香港，開展香港城邦的天下。

開拓香港城邦自治和香港人的文化天下，需要文化象徵——龍獅香港旗。

(六) 龍獅香港旗的精神象徵

龍獅拱衛，中英合璧，香港城邦自治運動之旗。中國龍，英國獅，龍獅香港旗蘊含中英合璧精神，記述香港歷史，守護香港城邦。此旗承繼香港英治時期的香港旗，加上漢字「香港」，底色由白色改為高貴與自由之貴族藍，象徵香港以本土為家，自立自治。



龍騰九天，獅行平野，獅龍合一，就是龍行大地，獅飛沖天。面對中共之狼，香港人不是羊，香港人是中國龍與英國獅的後代，如獅騰雲，如虎添翼，不與狼同日而語，也不與狼共處一室。

香港盾徽（Coat of Arms of Hong Kong）由英國紋章院設計，一九五九年至一九九七年代表香港。此旗為香港人熟悉，典雅高貴，方正均衡，蘊含香港文化及歷史。《詩經》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香港自治運動重新詮釋此旗如下：

龍是中華傳統，象徵生機與化育（viability and flexibility），香港是中華文化的保存所與守護人。獅是英國傳統，象徵剛正與勇毅（justice and bravery），香港是英國文化的繼承地與發揚人。香港人是龍與獅的後代，是中華文化與英國文化的混血兒。龍與獅立於香港領地之上，共同拱衛的盾牌，象

徵香港的文明開化，盾牌上的城樓，象徵香港城邦，城樓上的王冠，象徵香港傳承文化正統，自立為王。海上的帆船代表香港貿易通商的歷史，也代表海上航行的冒險精神。大獅頭上的王冠，象徵香港曾經接受英王統治，手握龍珠的小獅象徵香港城邦的統治者。自治運動保留王冠，一是傳承英國王風，二是發揚王道，以仁義治天下。

由於香港在一九九七之前，欠缺城邦自治之討論，故此並無精神標誌或紋章留下，至今難有共同象徵。用龍獅香港旗，是沿用熟悉標誌，感召香港人，況且香港人少有深究原有旗幟之意義，可作全新之詮釋。某些本土抗爭之左翼人士，或不能容忍吾人借助英國殖民地的文化符號，而主張必須解除殖民，將人返回無枷鎖的初始狀態（primal state），再來反抗中共及港共暴政，這是不切實際的。首先，我們無法回到初始狀態，這種解除殖民的努力註定是失敗的，故此也是中共可以寬忍的。再者，吾人與暴政周旋，必須取得資糧——即使是由舊殖民宗主給予我們的資糧，方可與新的殖民宗主鬥爭。手上無兵器——特別是用熟了的兵器，是不能作戰的。

沿用龍獅香港旗，有左翼的朋友提醒不要殖民地符號、不要奴化，這裡要解釋一下。由於香港的商港地位，也為了抗衡共產專制，英國為香港帶來的是文明多於奴役。英國撤退之後，

香港人自主地將英國文化學到手，並非延續殖民地奴性，而是主動在文化上自我賦權（self-empowerment）。繼承英國文化及歐美文化，是香港人的文化自強，也是中華文化之維新。我們用自由開明的西方文化，制衡中共的殖民霸權，因為中共代表的是歐洲的左翼法西斯的集體主義和官僚專制。可以說，香港的反共和自強，是延續歐洲戰後的反法西斯主義鬥爭。

龍獅香港旗中的城垛代表是一九四一年香港保衛戰，已有賦權於港人之意，並非懷緬殖民地歲月，而是將香港的自治運動接上歐洲的反法西斯、建立民主自治的光輝歷史任務之中。我們不需要為沿用殖民地文化符號而感到不好意思，因為現在是我們香港人自己選擇的，自己賦予意義的文化符號——龍獅香港旗。而這面舊旗幟，有了新的香港人的本土意識之後，已經屬於我們的，不是舊殖民地的了。

十．此段文章寫於二〇一一年六月十二日，為七一大遊行而寫。龍獅旗圖徽的重新設計，換上藍底色和加入香港兩字，來自網友「金屬」。

（七）全民決志，城邦自治；堅定信念，停止疑惑

香港要發達，無機會。要推翻專制，就大把機會。推翻了專制，平民鬆綁，就有機會發達。推翻專制的目的是自治，香港自治是解決一切香港積壓問題的契機。達致香港自治，可以是勇武抗爭，也可以是和平演進。目前，要整理自治的論述，廣泛宣傳自治是香港唯一的希望。民眾接收意念之後，變革往往由毫不相干的人、毫不相干的事發動，出乎意表，令人驚喜。族群的希望一旦傳開，便會永不止息，直至修成正果。將福音傳揚開去，連羅馬帝國都會傾覆。只要抱持希望，有正面的共同寄託，香港自治就必可成功。

「吾立身於此」，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一句話，開拓了宗教改革，也開出了現代德國。整句話，是Hier stehe ich. Ich kann nicht anders. 英文是Here I stand. I can do no others.中文白話是「我就站在這裡，其他的我做不了」，古文是「吾立身於此，他事罷休」。[十一]當年羅馬教廷政教合一、財雄勢大，勝於今日美國的霸主地位，但馬丁路德堅持自己解聖經，不服膺教廷，靠的就是這句話。

羅馬雖壯美，但馬丁路德立身於窮鄉。中國雖大，吾人立身於香港。香港（1841-）[十二]的現代歷史長過中華民國（1911-），更長過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民國可以當香港的兒子，中共連當孫子的輩份也夠不上。香港一百七十歲了，但香港人依然好像不知道似的，依然好像未成年少女，等待家長監護，求爹求娘求爺爺。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簽訂，香港人不懂得出聲，任憑英國養母盲婚啞嫁，造成今日的香港困局。政治是成年人的遊戲，香港自治運動，就是香港人的成年運動，coming of age of us Hong Kongers。我地大家累積起來，一百七十歲了，大家還能繼續假裝幼稚、向家長撒嬌，等他們安排命運嗎？政治是成年人的遊戲，香港人要覺醒，知道自己的年齡，不要再假扮兒童博取同情。沒人同情政治兒童的。香港人假扮兒童，只會被中共販賣或強姦，或兩者同做。

所謂政治信念，就是相信香港城邦是我們香港人的歷史，一國兩制的憲政制度是我們香港人的，《基本法》是我們香港人的，我們香港人有能力自治。至於那些問題：香港人能夠從中共取得自治權嗎？香港離開大陸可以生存嗎？香港有足夠治港人才嗎？這些問題，通通不須問的。有了信念，就有答案，就有實踐

十一．馬丁路德那句話是口耳相傳的，並無文獻記錄。英文翻譯是：Here I stand. I can do no others. 史學家相信因為路德說話時正被審問，場內群眾早已起哄，書記並未聽見路德之言，故未記錄。但群眾、當事人記得，故口耳相傳。

十二．英國在一八四一年登陸香港，一八四二年與清廷簽訂南京條約。

的道路。這種基於信念和熱誠的政治（politics based on faith and passion），是本土政治的核心。我地香港人要學習的。

時局險惡，抗爭維艱，傳授一點政術。「成大功者，不謀於眾。」並不是說，不與眾人謀，而是不與市井庶民謀。成就大事，靠的是關鍵的少數（critical minority），只要找到關鍵性的同路人，便可以形成滾雪球運動所需要的內核，滾動下去，累積數量。大多數人最初是冷漠旁觀、冷嘲熱諷，明白苦衷之後，便默然不語、點頭示好，最後是群情洶湧，一躍而上。終於，關鍵性的少數變成大多數。在政變、革命等時刻，大多數人是漠然不動的，少數人閃電式得手之後，大多數便轟然歡呼。[十三]

此句出自《史記．商君列傳》：「愚者闇（音：暗am2）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語譯：一般人被成規遮蔽，智力者看見事情還未萌芽的時候。事情開始的謀劃，和一般人是談不攏的，只能成功之後和他們共同享樂。講究崇高道德的人，不附和於俗人，建立大功業的人，不和普通人商議。能使國家強盛，聖人不必依循舊的章法。若果可以利益眾人，不必拘泥於禮節。

這套critical minority的政術，是我一生演練的，連英文名詞都是我獨創的，以前秘而不宣，今日在此公開。因為大陸隨時大

混亂，各種權力有如掉落地上的餡餅，誰人夠膽拿，誰就據地稱王。[十四]很多網友問怎麼做？我的答案：只要夠膽，誰都知道怎做。不夠膽，不能決志，叫你怎做，你也不敢做。[十五]

(八) Hong Kong Diaspora計劃：聯絡香港僑胞，傳播香港文化

做小事，靠理性。做大事，靠意志。入了中年，益加覺得成就大事，靠的是意志，而不是理性，也不是運氣。很多人做不成大事，就是缺了點意志，是志氣不足，不是運氣不濟。太平天國不能消滅滿清，就是怕北京難打，實則北京一攻即破。曾國藩不敢消滅滿清，是怕滿清餘勢未盡，實則滿清不堪一擊。亂世的政

十三. 網友留言：大家看看明治維新就知，倒幕運動小民甚麼都不知，但武士方面取到關鍵主導權就夠。長州藩高杉晉作八十人組奇兵隊決志功山寺，痛擊長州反倒幕之諸侯（俗論黨），道理就在此。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羅馬尼亞推翻壽西斯古的共產政權的革命，也是由幾個士兵在廣場抗命及向壽西斯古的公開演説喝倒采開始的。

十四. 這是托洛茨基在其回憶錄的講法。十月革命之所以成功，就因為沙俄的政權頹然倒下，只要夠膽上前的，都可以奪權。

十五. 網友留言：遠慮如曾國藩，一介文弱書生居然能夠籌款練兵，仲滅埋太平天國，英國人大為賞識，慫恿他劃江南建國，一念之差，差的就係勇字！

權如丟在地上的餡餅，只是無人發現，發現了也不敢公然撿拾，然後堂而皇之地說：「這是我們的！」很多人認為香港自治之路，荊棘滿途，我看到的除了是荊棘，更是踏平荊棘的意志。眾人的意志集合一起，眾志成城，可以踏平荊棘，無堅不摧。香港義人一旦決志，自治運動便開出康莊大道。龍獅旗的頭頂代表東方之珠，龍獅是印證香港為中西文流之都，亦是勇武意志之表。

取得公共意志好重要，若香港凝聚到此共識，要解決很多社會問題就容易得多，實踐自治，重整政治制度，香港勢必繁盛。於此，香港人除了莊敬自強，也可號召同道——移民在外的港人。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這批人離去，一度形成香港的人才斷層。今後，香港應聯絡他們，使他們知道家鄉的近況。

以前，我在港府民政局曾經構思香港僑民（Hong Kong Diaspora）計劃，當時是以香港文化外交之名來構思的，仿效英國文化協會（British Council）的做法，後來無法實踐了。即使在目前的政治條件下，港府也應該加強香港海外辦事處的僑務聯繫，設立香港的海外學校（包括中小學的港僑學校）、給予港僑歸港定居的輔導或優惠、協助港僑子女回流香港或回港接受教育之類。此外，向外推廣香港中西合璧的文化藝術及教育服務。

六四屠殺、九七前的移民潮、教育亂改革，一連串事件都令到好多香港人移居海外，海外港僑的人數龐大，而且歷久之後，維繫不少國際關係。二〇一一年港府派發市民六千元，首次觸動港僑的問題，因為港僑也可以回來領取。這正式啟動了海外港人的權利意識。此外，好多有民主選舉制度的地方，都設有「海外投票」，使身在海外的公民去領事館、代辦處之類投票。香港連囚犯都可以協助投票的，海外投票當然可以做到。

在海外協助方面，香港的代辦處可以取得中共的認可，行使類似次主權的地位[十六]，協助有困難或遇難的香港旅客和港僑。一些新領取香港護照的大陸移民，假若在海外遇到麻煩，也可以由香港的代辦處出面解決，以中共大使館為後盾，執行一些不大方便的政治任務。

十六・次主權的觀念，參閱沈旭暉：〈解構香港次主權——從曾蔭權致電菲律賓總統談起〉，《明報》論壇版，二〇一〇年八月二十七日。

第六章

香港只要自治，不必獨立

（一）中共的變局與香港人的應變策略

（二）香港人必須悔罪，城邦始可重生

（三）中國崩潰中的亂局

（四）統一延擱論：
中港互相依存，香港自治有利中共

（五）延擱政治上的國族認同

（六）香港文化莊敬自強，毋須仰望中國

（七）中華邦聯論：
中華創立盟邦，開拓天下

(一)中共的變局與香港人的應變策略

二〇一一年九月底，報載浙江溫州很多工廠老闆無法償還貸款，爆發逃亡潮，當中最感興趣的，是報紙揭露，超過一半的浙江商人入了外國籍，不是中共公民。要做生意就要入外國籍，有事可以得到外國領事保護，妻小移民出逃，做生意好似搞革命政變一樣。內地私人企業逃亡潮的報道，他們借的高利貸，利息高達五十厘到八十厘。大陸銀行全部國營，民間因為缺乏福利保障，有錢也不敢消費，將現款存於銀行，銀行貸款門檻很高，也怕中小企無信用，只借錢予國企及外資，中小企無從問津，銀行貸款予國企，國企不將之投入實體經濟，因為內部消費薄弱，貸款於是投入房地產開發，刺激建築就業及家居消費。也有國營企業將資金投入高利貸市場，間接剝削私企的所得。

中國目前的統治狀態，是全球化資本主義與極權政府合流，層層剝削：中共管束工人及放棄水土與勞工保護，任由跨國資本在中國謀利，地方政府包庇之下，頗多地區成了資本家的租界，公安不入，自行執法。中共黨官以權謀私，用暴力遷拆的手段侵奪民房，變賣國土，樓房炒賣及民間放貸等方法發達之後，將錢財和妻少遷移境外。

由於中共無心發展民主，中共不容公民社會形成，並學習港府的詭詐統治術：政府圈禁土地，推動高地價政策，奪取社會財富為國家財富，用房貸（樓宇按揭）將中產的人身自由綁架，勒詐其收入，使到中產階級無論在內部消費和文化認同兩方面都無法成型。國營銀行限制借貸予民企，令民企改投年息高達六厘以上的、國企放貸的私人借貸，蠶食中小企利潤，社會貧富兩極化後，企業創發精神（entrepreneurship）難以成長，中產的價值觀（公義、平等、自由）被下層社會要求溫飽的聲音取代，中產也代入財閥的價值觀（支持開發、壓制民亂）而被小市民鄙視。香港與大陸不同，是英治時期發展了公民社會和現代價值，政府無法一下子壓倒。

一·〈老闆逃亡潮擴散 溫州政府救亡 澳門警方遣返20溫州人〉，《信報》，二〇一一年十月一日。

中共的性質，是蘇聯境外殘餘的殖民政權，是無家無國的殖民者，如外太空投擲到地球的病毒。中國已在一九四九年淪陷。一九四九年至今，六十二年來，中國經歷蘇聯殘餘境外殖民政權之異族統治。香港也在一九九七年淪陷予這個蘇聯殘餘境外殖民政權。香港的情況，如當年受到蘇聯殖民統治的波蘭和捷克一樣——總書記由蘇聯任命，每年上莫斯科誠惶誠恐地匯報和領命，經濟向蘇聯輸血，官府、學校和街上佈滿蘇聯特務。想像一下，香港街頭那些土共政團的街版，用了俄文，就是當年東歐的情況來。設想香港遲些也要多講俄語——普通話和多用俄文——簡體字。

中共的變局，不出四種，香港的自治局面也要因之而調整：

一、**中華民國化**：共產中國已經意識形態破產，大陸階段的中華民國形象曖昧，可塑性強，但畢竟有憲政民主的期許，中共採取民國的訓政政策，取得台灣許可，取回中國民國國號，脫共化而維持平穩局面，台灣政體獨立，與大陸結成邦聯，此所謂大政奉還中華民國。

二、**軍國主義化**：中共加強壓制民意及灌輸愛國主義，用對外擴張來化解內部憤怨。除非中華民國化取得成效，國族意識熾熱，否則中共國人欠缺愛國精神，難以做到軍國主義，但可以做到滑稽版的，也夠釀成災難的了。

三、**拉丁美洲化：**各地政府坐大，貪污腐化，政府與幫會勾結為惡，財閥外逃，中央政府的政令不出京門。政府印鈔票及借貸予國營企業及地方政府，如飲鴆止渴，令通脹失控，民不聊生，槍火四散，流寇遍地。

四、**分裂割據化：**中央潰散，共黨敗亡，官員夾帶私逃，中國邊區分裂獨立，各區軍閥蜂起，勾結外國勢力，據地稱霸。中國再度進入南北朝，滿洲崩潰之後的割據狀態過早完結，可以再來補償一次。當然，分裂割據之後，各地可以用自治的權力形成結盟的本地力量基礎，完成真正的聯邦立憲。

當中，一和二可以連貫進行，三和四可以是發展階段之別，最終回到一，民主中國是走不掉的現代國族建立過程。以大陸的頹唐之勢，最有可能的是陷入三的拉美化。不論何種變局，不論在民主議會內爭權、在亂局中自保，香港自治是香港城邦的生命基礎，但要達到自治，香港人要有足夠心理準備，不能總是抱持民主回歸論。某些香港人即使中國大亂、四分五裂，還要效忠中國，只圖報國，不求自保的。

香港不是蜀漢，也不是孫權，香港是歐洲狀態的現代城邦，不是後宋、南明或遜清，不是中國王業的復興基地，也只能如此，

二、大政奉還中華民國論，是香港評論人黃世澤的理論。

香港才可以長期偏安而無事。中共是曹魏，香港人不知好歹，擺出蜀漢的姿態，是自取滅亡。這是筆者極力勸告，香港人必須放棄民主回歸論。民主回歸論，乃中國之王業[三]，必須攻打中共，反共復國，香港必然犧牲。那些極力說香港是近代中國革命基地[四]、顛覆基地的言論，不管是出自愚昧還是真誠，都是惹禍上身的，即使好像香港那些民主派的只說不做，也足以令中共在餘勢未盡之前，振振有詞要吞併香港、殖民香港、洗腦香港。香港要做的，是論證自己的獨特城邦身份，自外於中國，如此才可以中立不偏，自保於亂局。[五]

要戳破香港人虛幻的、也是危險的中國意識，須要一柄穿心的利器。

(二) 香港人必須悔罪，城邦始可重生

「香港人是抵死的，沒死錯你們。不要扮無辜，你們有罪！」

前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對鄧小平說過，蘇聯不能順利開放改革，是因為蘇聯無香港。香港目前遭受的劫難，香港人不要悲憤

莫名：我們香港人因為愚昧和錯誤的民族私心，乃至短暫圖利的小人之心，間接資助了共產黨暴政，犯下大罪，得到報應是應該的。當然，出於愚昧的犯罪，報應只是一時的，但出於個人私利或民族私心的話，報應會大一些，也許是一兩代人的滅身之罪。文革之後，中共本應覆亡，當時中共死路一條，只有覆亡一路，然而，深圳特區露出曙光，開放改革引入香港資金、技術和國際商貿關係，令中共起死回生。

港資流入大陸，是當年全球信貸膨脹的後果，但假如先頭流入的不是港資，而是有冷戰敵對國家支援的美資、日資，中共的日子不會那麼好過。假如不是收回香港，即使在英殖政府監視之下，港資和香港經驗也不能這麼容易被大陸予取予攜。很多時，歷史大勢之下，就一點程度上的差別、技術上的差別，而令趨勢扭轉的。中共不那麼快成為拉美國家，也因為香港之故。當然，中國最終的下場是拉美化（經濟滯脹化、國土租界化、警察黑幫化、山河毒化、人民劣化），大勢是變不了的，只是阻延一點。此外，倘若沒有港資，中共捱不過六四，六四之後，港督衛奕信祕訪北京，李鵬第一件事就問，港資會不會撤走，可見中共六四後資金何其緊張，港資是政治指標，一旦港資撤退，中共就難以到美日招商。

三・王業是統一中原，恢復漢室之業。諸葛亮《後出師表》：「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

四・近代中國的革命基地是日本，不是香港。

五・此乃黃老道術「天外掛元」之秘術。

當年資助中共的香港人，有不可饒恕的愚昧與罪行：犯下文革滔天罪惡的政權（比六四屠殺的罪惡更大），你去資助它復興，是否犯賤？香港人助紂為虐，姑息養奸，是否應該有今日的報應？一九九一年，香港人瘋狂賑濟華東水災，我在《年青人週報》冒天下之大不諱，寫文章諷刺：「買贖罪券，還是預購明天的子彈——短評香港人瘋狂賑災（八月二十日）」香港人幫中共、包括用慈善幫中共減輕國庫負擔和政權罪孽，是預購打靶的子彈。

中共是專門殺害恩人的，因為恩人比他們精明而且會不斷提醒他們欠了人情要還。中共殺害了建黨的文人先烈，殺了建立軍功的紅軍大將，殺害了幫忙渡過大躍進飢荒難關的國家主席（劉少奇），間接殺害了幫忙他們開放改革的胡耀邦和趙紫陽。殺害了救援他們的歸國華僑，殺害了文革支持他們的紅衛兵，現在，就殺害一度令他們起死回生的香港。[六]

大陸「烏有之鄉」及「強國論壇」有很多貼文，認為香港繁榮是依靠剝削大陸，以及由中共傾全國之力援助香港。大陸貪官來港自由行在珠寶店高呼「扶貧消費」，聲稱大陸已買起香港。歌手張敬軒的新浪微博過萬條法西斯留言歧視香港人，大陸港生寶寶之家一眾「雙非兒童」[七]的父母聲稱香港已經「回歸」，是十三億人的香港，對「中國」不滿意的香港人應該離開香港。大陸學生來港讀書堅持一國兩制是中央優惠政策，對其他大陸城市不公平，要求平權。民間的話，毗鄰同語的廣東人，最受惠於香

港的，但他們會說沒有中央，香港玩完了；香港工廈籠屋有人爭，但由內地逃來香港的，就算有了公屋綜援，都不會感恩，只因未住滿七年，不是同一方式取得六千元，已是歧視。

在中共的麻醉人的政治宣傳之下，大呼小叫，說香港人不斷上當和中招，皆因香港人有的貪圖私利，犧牲香港共同利益，而更多的是文化空虛，掉入中共佈置好的中國感情黑洞而粉身碎骨。香港投資及賑濟大陸很多不是出於所謂「血濃於水」的民族情感（並不人人都是霍英東先生！），一般港商貪圖大陸勞動力便宜，「同文同種」交流方便，於是冒險闖關，意圖捷足先登，富貴險中求。八港人捐獻大陸，興學賑濟，很多只是基於救助「同胞」，心想救人總沒錯的吧，教育小孩總是好的吧？香港人顯然政治警覺不足，結了瘡疤忘了痛，剛脫離中共的魔爪，來港之後竟然忘記了苦難教訓，遊子思鄉起來了，要回到「祖國母親」的子宮了。套了共產黨的軟索，受中共的文化宣傳毒害，以為自己領受了中共的恩惠，以為在殖民地的富裕生活是由於得到「祖國」的施予和支援，回饋大陸只是贖罪。這正是香港人缺乏文化歸屬和心靈安頓之過，因此常

六、網友提醒：見微知著，以小見大，看到從大陸獲批來港的親戚如何對待幫助過他們的人，就知道中共的人有幾狠。三四歲的時候，筆者就聽隔壁的黃婆婆咒罵：「中國共產黨，是黃巢降世，恩人先開刀！」恩人先開刀，是客家話，先向恩人開刀的意思。

七、大陸人愛用的簡稱，即是在港出生但父母雙方均非港人的兒童。

八、網友說，他曾聽過母親轉述她一個老闆的話，那人是個典型香港廠佬，幾十歲的伯父，親建制參加埋乜乜會物會，據聞早年走難來港。他說：共產黨真係好衰架！不過無計，我要開廠做生意……

被挾持中共打劫勒索，乃至謀財害命。香港城邦論，就是要為香港人做好文化防疫，令香港人抵擋得住中共的文化病毒。

香港曾經拯救過中共，是中共番生的大恩人，然而中共怎麼對待香港人，各位見到，起初有些悲憤莫名，但當大家明白到資助暴政的因果報應之後，便會醒覺過來，以後打醒精神做香港人。香港人必須悔罪，懺悔自己資助中共暴政的罪過，為了遠離禍患，自求多福，香港人要離棄中國民主一統論、香港民主回歸論，香港城邦才會有新生。

辛亥革命，流血的大部分是廣東人，出錢的中國人大部分是廣東人，但現在接受政治剝削和文化壓制最嚴重的，也恰好是廣東人，這是廣東人背負中原意識的歷史教訓，香港人必須警醒，自保城邦，忘記中國。

香港得以倖存於清末之喪亂，乃託庇於英國之殖民統治及城邦建設。一切支持中國大一統之政黨——中共、國民黨及香港民主黨及若干民主派人士，都會毀滅香港城邦，不論是出於惡意之吞併還是善意之融合。中國之共和革命被中共斷絕，如今國族未立、文化待造、憲政廢弛，中國每走一步，都是邁向地獄。除非香港人有地藏菩薩之慈悲與大神通力，否則應該遠離中國。我們沒有責任去拯救中國。這是他們自己的事。至於那些不自量力而要救中國的香港人，請自便，不連累香港就是。當然，香港滅亡，中共陪葬。我們對於中共的忠告，一向如是：Survive with Hong Kong, or die with it.

(三)中國崩潰中的亂局

市場經濟有其盛衰週期，中國模式無法置身世外。中國的幾十年繁榮光景，甚至在二千年後的兩次金融風暴都可以持續增長，這種詭異現象，很快就要結束。中共的國家資本主義，可以用政治專政力量掃除發展障礙，在短期內集中資本、提高產能、壓縮勞動成本和環境成本，但對於提高生產力、促進效益和永續發展，政治專政力量有其極限。初發期的繁榮過後，中共的經濟發展無以為繼。官僚控制資金投放、信貸、土地審批、出入口配額、外匯管制等，衍生貪污腐化和裙帶關係，國家資本並不能有效運用，交易成本高昂，人民收入微薄，內部消費貧弱，最終只能陷入全國滯脹，各地的惡性競爭、經濟割據也會引致內亂，地方政府肆意圈禁人民土地，化公為私，最終也引致民怨沸騰而終日暴亂。二〇一一年的利比亞革命，並非不可能在中國出現。炸彈襲擊官府、火燒政府大樓、刺殺富商、哄搶店舖、血洗長街的場面，隨時可以出現。然而，由於並無替代性質的民間反對力量，中共也可能長時期捱下去。

然而，中共的噩夢是對外作戰引發的內部崩裂。美國重返亞洲之後，佈置自日本、韓國、台灣至越南、菲律賓及印度的封鎖

鏈。大風起於青萍之末。近代之大戰，都是由曖昧的小區域爭端引起，南中國海就是多國都想染指的小區域，也是東亞航道咽喉。石油可以改變小國的國運，越南、菲律賓在美國默許之下，將勇猛爭奪南海水域主權，以求取得石油分紅。如果中共要動武解決南海紛爭，此將是中共死亡之戰。印度將切入中南半島，陸地封鎖中共經緬甸出海之路，並派遣海軍入南海，趁亂還會攻入西藏。印度及越南將提供戰爭的陸軍兵員，協助美軍的海空戰力。中共缺乏愛國精神及民族優越感，無法為戰爭做政治號召，部隊的戰鬥意志不足，目前中共是希望用金錢贖買來拖延戰事，苟且偷安。然而，挑釁者兵臨城下，中共也不得不打。

打仗是賢愚俱滅，草木同枯的劫難，不是正邪之鬥，而是玉石俱焚，賢愚皆滅，一筆勾銷。吾人只能在戰爭中求毀滅，不能求正義。打仗是阿修羅道，不是天人道、佛道。打仗之後，舊的聖、舊的魔都滅了，新天新地。故此，打仗也是好的，但不是好壞的好。一旦大陸爆發武裝暴亂，血流遍地，我們當以「天地不仁」之心視之，勿哀勿喜，始可以不為所動，保持理性清明。天地革新之前，都是這樣的大殺一回。戰爭乃生死存亡之爭，有時要壯士斷臂，是一個正義面臨博弈的世界，沒有多少人可以思考正義的博弈問題而不損及良知，不留下憤恨。

假若中國陷入戰亂，香港人必須要有自保意識，責成港府派遣代表與北京商議，要北京保護香港的戰時角色，對外對內都要確

保香港成為軍事中立區，中共在香港的駐軍要嚴守中央命令。一旦北京的中央政府無法行使政令，危難時期港府或香港議會甚至可以遊說美軍派駐航空母艦游弋及防守。出現真正內亂而違反人權，而聯合國也同意保護，則香港議會可以請求聯合國派駐維持和平部隊協助防衛。

香港不宜捲入中國的戰局。香港城邦自治，是要香港自外於將來中國的戰局。至於政治情勢，我是很樂觀的，因為香港人搞自治，與大陸有談判基礎和感情聯繫，一定好過將來中共崩潰，美國兵臨城下，在香港建立傀儡殖民政府的。中共心知肚明。即使是類似汪精衛的政權，當年國民政府也是寬容的，只要日本勢力仍在，汪精衛便安全。

很多大事都是手忙腳亂之下辦成的，為準備中國陷入戰局，香港可以做這些事自保：

甲、和平時期：

一、責成港府，對內對外維護香港的自治權及自治形象；

二、一國的對外政策很多時是出自本國人民的印象，香港人對外必須維持香港的自治形象，將香港與中國從形象上分開，維持香港人的固有面貌，不與中國大陸人混淆；

三、促成香港的參政者認同香港自治的理念。香港的政黨、政團或獨立參政者必須有若干關鍵的成員認同香港自治的理念，必要時可以組成具備合法性的緊急委員會，對外代表香港民意；

四、維持香港的國際社會地位，增強海外關係之締結及聯繫，特別是日本、台灣、韓國及南洋諸國與海外港僑聚居地；

五、維持美軍艦隊訪港的既有習慣及友善接待；

一旦中國陷入戰局，不論對外對內，假若戰事拖延而令政局不穩，香港可以做這些事自保：

乙、戰亂時期：

一、香港特首在立法議會決議的道義支持下，在中國陷入戰局時期代表香港向北京傳達自保的願望和尋找北京諒解和援助，最低限度要宣布香港為中立區、免戰區；

二、香港依照《基本法》維持與中國的既定關係，如非中國陷入分裂及北京政府無法行使中央政府的職能，香港不會改變此既定關係；

三、在中共瓦解、中國分裂的情況下，香港宣布臨時獨立，以立法議會為最高權力機關，香港全民公投，修訂《基本法》為臨時憲法[九]。在具備統一執政能力的中國政府出現之後，中港雙方協商，以《基本法》的憲政安排為底線，重訂中港關係。

可以成功的政治工作，必須要見得人民，出得國際大場面。筆者統籌面書討論群組的意念，構思的香港自治運動理念，都是全部可以公開操作的。前五點可以馬上做，也是合法的。後三點，是政治準備，也是中港之間要有的共識。前五點和後三點，實踐了現實政治（Realpolitik）和締約政治（德文Vertragspolitik），辨別輕重，列明條目，層層深入。特別是後三點，中港之間預留頗多迴旋餘地，令彼此可以爭取共同的最大利益。顧及對方的利益，謀求彼此最大的共同利益，是締約政治的精粹。得乎此，就可以進入現代政治。香港補上現代政治這一課，就可以自治。目前中港關係是一面倒的中共壓制香港，是舊的、劣的政治，並不是現代政治。

中共的弱點是形象惡劣，軟實力不足，外交處處吃虧，貼錢買難受，賠了夫人又折兵。中共容許香港實行前五點，後三點就不

九．修訂必須維持在最少狀態的修訂，以免影響香港的先行法律，也避免令到將來與中國政府展開磋商的時候有太多的障礙。

會發生，而且中共還可以借助香港的國際形象，締結中國對外關係，彼此互惠互利。

香港獨立建國，代價頗大，而且牽涉英、美、日、台的實力拉扯，並不易找到平衡，建立國防與外交，也須耗費資金和時間。《基本法》賦予香港的自治權，比起英治時期更大，只是中國阻撓，香港也不極力爭取實現。香港自治只是充實一國兩制，並非香港獨立建國。即使是戰時的臨時獨立，也是務求事前尋求北京首肯和諒解之下的治權獨立，仍然按照《基本法》的一國兩制，但中共與香港協定互不干預內部事務之後，賦予香港充分自治權力。

關於香港臨時獨立，《基本法》也鋪墊好了。為了填補英國離開香港的憲政真空，中共必須為香港制定小憲法，保證香港的制度和香港人的權利不變（甚至更多），於是一九九七之後，香港有成文憲法——《基本法》來界定香港的政治身份。這部《基本法》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的懸空狀態之下，在香港執行的。即是說，香港是中共法外之地，而香港法院有權詮釋《基本法》。故此，《基本法》將是香港自治的法理基礎，甚至在戰亂時期，在某種安排下，懸空某些條文，成為香港臨時獨立的憲制準備。[十]這也是為何中共的人民代表大會要死死把握香港的憲法詮釋權的原因。然而，這將是徒勞的。中共不行憲，就是怕丟失政權，但香港不得不行憲。故此，《基本法》足以令香港自治或在戰時獨立，而這是無可逆轉的過程。中共當然可以屢屢釋法[十一]，

無視《基本法》訂明香港擁有的終審權，但他們每做一次，就會激起香港人的護法情緒和自治情緒。你說，世界上還有比這個滑稽的政治麼？歷史的進程，往往是喜劇，充滿喜劇元素（comic elements），讀多一點尼采哲學，便有這種樂觀與豁達。

（四）統一延擱論：中港互相依存，香港自治有利中共

中共納入香港在其統治之下，是利弊參半的。每日來往香港購物和公幹的大陸人，紛紛湧來香港產子謀取「今生不做中國人」的大陸人，都會日日帶回大陸親友這個訊息：為何香港在中國統治之下，會這麼正常和合理的呢？

十．香港人也許不知，基本法就是憲法另一個名字，德國現有憲法不叫憲法（德文Verfassung），而是基本法（德文Grundgesetz），因為當時只是在英美法三國佔領德國西部和柏林西部前提下實施和訂立。

十一．人大常委會解釋香港《基本法》是不合適的。首先，中共動用人大這個立法機構來解釋法律，而不是用最高人民法院來解釋法律，並不符合司法獨立的法治原則。其次，《基本法》授予香港特區政府的權力，是完整和寬厚的，只需要詮釋條文即可，但釋法卻收回香港的完整權力。鑒諸往跡，人大的四次釋法，包括人大在居留權案的釋法（一九九九）、香港民主進程的釋法（二〇〇四、〇五）和剛果共和國外交豁免權釋法（二〇一一），都是毫無必要的，都打擊了香港的法治。

中共的對策有兩種：一是拖慢香港進程，甚至用滲透干擾的方法令香港內地化，然而到達臨界點，這會虐殺香港，令香港無法裨益中共的國家戰略。二是容許香港自治，名義上脫離中共的政治制度，雙方保持默契，在中港之間樹立政治屏障，中共可以繼續利用香港的國際性而不會反咬自己。稍為有頭腦的中共領袖，都會想到這些問題的。而假若美國在反恐勝利之後，不斷增強東亞的圍堵佈局，則香港實現自治，未嘗不是建立政治防火牆的方法。香港留在中國統治之內，反而令海外敵對勢力更容易左右逢源，興風作浪：因為香港政府無法採取適當的政治立場，解除中共的安全顧慮，連拒絕民運人士入境都不敢公然去做的。

中港是互相依存的，不是互相敵對的。香港城邦自治，只是中港依存的方式，以公開界定雙方權力界限的方式，以更為實惠、更為緊密的方法進行而已。行文至今，可以總結香港城邦論：

一、香港的城邦過渡狀態可以延續很久，也可以自成文化體系，毋須祈求民主的中國做歸宿；

二、民主中國必會損害香港的特權利益，即使蔣介石遷台之後，民國也不會善待受過日本殖民的台灣人及原住民；

三、以香港的被動狀態，無法保證可以在將來的民主中國憲法締造過程中，保護自己現有的特權；

四、《基本法》賦予香港的內政權力大於英國殖民時期，只是特區政府俯首聽命於中共，出賣香港人，不捍衛香港人利益；

五、對於中共或將來的中國政權，香港是不支持也不強求推翻，而是先謀求中港分隔，楚河漢界，河水井水互不相犯；

六、香港城邦自治運動，追求的是中港關係正常化，香港政府的公共政策必須保衛香港人利益，與大陸交涉的時候先以香港利益為本；

七、澄清中港關係乃互惠互利之交易關係，香港以經濟貢獻、制度貢獻交換中共之軍事與外交保護，並非北京照顧香港、優惠香港、北京「送大禮」。不宜散播香港負疚於中共之論、香港要向中共還債之心，淹沒中港之間的交易關係。

香港人不出聲，就坐待滅亡。在周恩來和鄧小平主政的年代，香港的城邦地位很安全，但目下的中共領袖，一蟹不如一蟹，對香港的政策是自相矛盾的，互相耗損的。在戰略上，中共繼續利用香港的自主性，但戰術上卻不斷消耗香港的自主性。中國用政治高壓化、經濟空洞化、人口摻雜化、文化大陸化來改造香港，然而，一旦香港從量變到質變的臨界點到了，香港大陸化不可逆轉，美國和國際社會對香港改觀，中共也會失去香港原有的功

用，中共無疑可以消弭所謂香港反共陣地，但永遠失去的卻是珍貴的香港戰略地位。然而，臨界點在哪裡？令港人感動疼痛的刺激度——痛閾[十二]在哪裡？指標如何？筆者略舉一二：

一、大陸孕婦佔據香港出生人口一半或超過一半，港人孕婦因為不屑像大陸孕婦般的每十五分鐘叫痛而不獲分配病床而要睡帆布床甚至打地鋪；

二、大陸資金佔據香港的樓宇買賣三四成，抬高本地樓價；

三、大陸移居香港者不服膺香港社會文化，對內親共，對外卻以香港人自居，並手持香港特區護照招搖過市，破壞香港對外形象；

四、大陸遊客在香港造成交通擠擁及通道障礙；

五、商場因為迎合大陸遊客需要而改換營業並且加租，本地消費被擠壓出外；

六、大學假借國際化的名義而為內地生預留學額（成文或不公開地），特別是研究生院的學額，並且為了製造國際化形象而取締粵語教學及中文教學，一刀切地厲行英語國際化教學。

凡此種種，要視乎香港人感到痛楚的敏感度，與是否覺痛而呼叫，有否喚起同胞團結抵抗的勇氣。若港人一味啞忍，則中共步步進逼，乃至香港質變而中共不知，彼此玉石俱焚。香港大陸化的臨界點，是由香港人自己定義的，香港人一日不出聲，臨界點不會浮現出來。[十三]

目前大陸各地因為遷拆而民亂四起，最大的危機在通貨膨脹失控和信貸鏈條斷裂而大量民企倒閉，令各地的民亂火上加油。香港要小心應付，以求自保。香港保全自己，服務中共，則中共反而可以苟延殘喘，這是對中共有利的，共黨老一派的人一直苦勸香港人不要「井水侵犯河水」，也許是這個意思。至於香港要多一點自主性，多為他們發揮國際影響，中共倒不在乎。他們在乎的，是政權之生存而已。對於所謂台獨、港獨議程，中共是不在乎的，獨立是做不到的，反而有利其延長政權壽命，中共最怕的是反攻大陸。香港自治議程是不政治正確但政治安全的議程。

十二．德文Schmerzgrenze：英文threshold of pain。國粵音域（wik6），門檻、界限。

十三．即是說，大家一直等一直等，臨界點也不會出現，直至大家行動起來反抗。就好像大陸的人一直啞忍共產黨的暴政，一直等別人起義，一直也不會有結果，直至自己起義。

（五）延擱政治上的國族認同

一國兩制既是中港統一的安排，也是與中國大陸區隔的安排。香港人思考本土命運的時候，應該延擱與大陸作社會融合和民主統一之思，香港優先，懸空大陸，否則由於大陸在中共手上，會被中共挾持和反制。對於大陸發生的慘絕人寰之事，香港人除了寄予同情之外，更需要的是冷靜的理性，不要被所謂民族統一的感情亂了理性，然後賠上香港的錢財，押上香港的命運。大陸仍是一個被臨時革命政府統治六十幾年的地方，一個被隨時陷於暴亂之中而無合法性的政府統治的地方，不是一個正常國家，香港毋須思考與之作社會融合或民主統一。而且，中共是蘇聯境外殘餘的殖民法西斯獨裁政權，並不是愛護中華民族的政府。對中共而言，民族只是政治工具，中共為了收回香港主權，可以將中國國籍強加於香港三百萬英籍人口（英國海外公民），但在一九五五年，周恩來為了換取印尼邦交，一紙國際條約，一千多萬印尼華僑的中國國籍就此報銷，頗多華僑失去中國保護，受到印尼排華的迫害。

香港的政治動員力，並非來自愛中共，而是來自愛香港，愛一個基礎優良而奮力前進的香港。本土意識有助香港建設，更有助

中共的安全。香港需要的政治家，並非那些向中共叩頭而令大家兩敗俱傷的政治家，香港需要的是可以抵禦中共的愚昧政治，可以代表香港與中共締約和好、互相裨益的政治家。

由於中共並無行憲之心，香港必須延擱政治上的國族認同。中共在香港推動愛國教育，只會令香港和中共兩敗俱傷。中共要推動國民意識，必須自身已經繼承文化傳統，建立國族認同，目前中共只以暴政來令人民屈從一黨專政，為奴為婢，這在大陸仍有點作用，在香港卻無益。與香港相比，大陸是經濟增長凶狠、道德陷落和政治腐敗之地，除非大陸政府有憲政共和議程及崇高的道德感召，否則無法令香港人信服大陸。香港是資訊公開及輿論自由之地，即使是小學生，也只會口是心非地順從所謂愛國教育，更為憎恨中共。愛國教育得到的是對中共的憎恨，對香港的捨棄，正是兩敗俱傷。中共是無法直接統治香港的，也不宜用各種下三濫的手段（如愛黨教育）箝制香港，引致兩敗俱傷。殖民地留下的香港舊制和政治經濟佈局，也無法保持現狀，香港必須前進，中共必須作出抉擇，撥亂反正，保住香港，也利益大陸。

建立國家意識，是任何現代社會的必經階段。香港對大陸的政治實力、財政自主權（港幣掛死鈎、利率跟美國）、地產霸權、資本家離心、文化和教育失方向和自信，都與香港缺乏自治身份有關。國家和國民意識是良性資本主義和憲政民主的先決條件，香港的資本主義那麼畸形發展，都是由於缺乏國家意識（連中共

也沒有國家意識的）。然而，基於歷史與現實政治，香港不能建國，也不宜建國，用城邦意識是最佳的選擇。

在現代政治，同語種、同帝國的後裔族群，毋須結成單一國家，可以各自成為政體而交流，之後盟邦締結。目前台灣也是在治權獨立而主權意識未曾脫離大陸而獨立的曖昧狀態。筆者的構想，是在和平時期，香港獲得自治，待到局面平定，中華邦聯的共識成熟之後，中國（大陸）、台灣、香港、澳門再聯合宣布，締結中華邦聯，一國四票，佈置亞洲聯盟的局面。在中華邦聯的跨國安排之下，到時才諮議香港主權獨立之事。這是從「治國」到「平天下」的中華大政。香港自治是各方可以接受的共同操作基礎。

(六) 香港文化莊敬自強，毋須仰望中國

政治中國，香港人要放棄。文化中國，香港人也要反省。文化中國在香港、台灣、日本、韓國，不在中國。對於中國大陸，香港需要仁愛，不是憤恨或悲情。

香港必須走出無奈又有點愚昧的中華民族悲情，才可以有健康和奮發的性靈。這種悲情，誤了很多善人、義人的一生。一生都活在憤恨之中，性靈得不到安頓。我們不要香港的下一代都陷入這種感情困局。我提出香港自治論，最終是基於心靈的。要為愛而活，不要為恨而活。中共是精於心靈統治術的法西斯政權，它做的種種暴政，就是要你恨它，將你的心智和感情黏附在它的身上，於是你不忍心它離你而去。會死死抱住中共。

諸位看那些在六四晚會的主席台上痛哭流涕的民主黨人，就有這種複雜情結（ambivalence）。為情自殺的好男好女，我們在新聞見得多。老共的心術，就如一些惡男、惡女一樣，會將迷戀或憎恨它的人弄死的。當你忘記老共的惡性的時候，以為中共浪子回頭的時候，它會逮捕趙連海、艾未未給你看，然後讓你死心塌地，又恨它一回。香港人要覺悟過來，離棄對中共的仇恨，重新擁抱仁愛，才是香港重生之道。

香港的城邦身份，乃客觀存在，中外皆知。美國總統羅斯福在一九四三年也連同中華民國總統蔣介石向英國首相邱吉爾遊說，將香港名義上歸還中國，但治權不變，保持自由港地位，由英方管治或香港人自治。戴卓爾夫人在一九八三年訪問北京，也向鄧小平提出「主權換治權」的要求，可惜礙於顏面，鄧小平拒絕，改行一國兩制。鄧小平公布收回香港，說只是換一面旗，中

央只管國防外交[十四]，香港內政是港人自治。一國兩制、香港自治是延續和再發展香港的城邦地位。雖然中共在九七之後、特別是二〇〇三年七月一日港人大遊行之後，收緊港府自治權，但只要香港人決意自治，老共也會深明大義，放香港一馬。

自治要有文化身份，文化正朔。本書第一章所言，中國宋朝滅亡之際，元朝蒙古人大肆屠殺不願投降的宋人，之後殘暴統治順從的宋人。中國人本來智仁勇兼備，生活清靜高貴而不拘泥小節，到了宋朝更是鼎盛[十五]，日本人誠心仿效，宋朝滅亡，陸秀夫背負宋帝昺在崖山投海自盡，十萬臣民寧死不屈，隨之殉國[十六]，令蒙古人嘆服，日本則舉國服喪，自此即不認中國，自立正朔，延至明亡，甚至鄙稱清朝為「支那」。[十七]明朝的殘暴統治就是繼承元朝的，明朝滅亡於清，韓國亦不認中國，自立正朔。日、韓的正朔觀，也是沿自中華，即以文明禮教為本，並非以佔據領土而統一政權為本。

香港的最早的移民來自南宋，即是屏山鄧族，若非高地價政策破壞，新界屏山、錦田一帶風土優美，人情溫厚，及後明、清、民國及共產中國的移民，都是不滿中原政權，南下香港避秦的自由人。由於地方偏遠，明清兩朝也並無直接統治香港，英國統治香港之後，更阻隔了滿洲以後的中國暴政，令香港修養生息，可以保持嶺南文化、閩粵精神及上海商業氣息，並且融入英國的法

治、理性務實及愛好大自然的西方文化。香港的中西合璧精神，來自明朝利瑪竇來華之際，但滿清中斷了中西文化交流，民初恢復了，卻又被共產中國截斷。這種精神，就跌跌宕宕地來到香港，生根落戶。這是香港城邦文化偉大之處。

中國雖然領土廣大，但今日河山殘破，道德淪喪，品味惡俗，文化慧命中斷，並不配為正統。香港自城邦奠定以來，貫通中西，有自己的文化傳統，足以自立自強，毋須仰望中原。

十四．後來寫入《基本法》第13（1）條，中央政府負責管理與香港有關的外交事務及第19（3）條則訂明香港法院對國防、外交等國家行為無司法管轄權。

十五．可參考孟元老描寫北宋汴京（開封府）風俗的《東京夢粱錄》卷五：「凡百所賣飲食之人，裝鮮淨盤合器皿，車檐動使奇巧，可愛食味和羹，不敢草略。其賣藥賣卦，皆具冠帶。至於乞丐者，亦有規格。稍似懈怠，眾所不容。其士農工商諸行百戶衣裝，各有本色，不敢越外。謂如香鋪裹香人，即頂帽披背；質庫掌事，即著皂衫角帶不頂帽之類。街市行人，便認得是何色目。加之人情高誼，若見外方人為都人凌欺，眾必救護之。或見軍鋪收領到鬥爭公事，橫身勸救，有陪酒食檐官方救之者，亦無憚也。或有從外新來，鄰左居住，則相借莉動使，獻遣湯茶，指引買賣之類。」

十六．參閱蕭建生《中國文明的反思》中，「古代中國文明的頂峰——宋朝文明的偉大與消亡」一章，香港：新世紀，二〇〇九，頁一五五至二〇〇。

十七．閱讀雨霖「宋後無華夏，明亡無中國——大宋帝國的哀歌」，http://stanleywise.blog.hexun.com.tw/65124304_d.html

(七)中華邦聯論：

中華創立盟邦，開拓天下

匱乏固然是危機，工業產能過剩、貨幣存量過大也是現代化之中的國家必須面對的危機，美國在二戰之後，做了以下幾件大事，奠定霸權地位：

一、建立了四百八十四個海外軍事基地，成立美國主導的北約，將二戰的強大戰鬥力轉化為全球的軍事威懾力；

二、建立美元主導的布列頓森林體系[十八]，將過剩的美元轉化為國際金融信用；

三、實施馬歇爾經濟援助計劃，將國內過剩的生產力導向歐洲，佔領歐洲市場。

與當前中共的國策不同，美國引導過剩資源的方向都是對外的。資本、產業和金融的外流為當時的美國人帶來充分就業、收入倍增、物價穩定等種種好處，真正實現藏富於民，為美國轉化為消費社會做好鋪墊。然而，由於中共的海外投資沒有強大的軍事力量作保障，也沒有眾多的海外基地和一起行動的盟國，中共的對外投資事倍功半，而且受到地區動盪和反華情緒的干擾。[十九]

目前，中國發展的最大局限，是無法在美國封鎖之下建立盟邦，將剩餘的產能、資金和人口安全地、有效益地向外擴展。中國所到之處，受到文化抗拒和外交困擾。在美國的外交努力之下，中國的鄰國一一離心。突破之處，只能在中華地區本身做起。有遠見的中國政治家，樂見香港自治。香港自治之後，加上台灣的自治地位，中共再扶持澳門一下，將來的中華區將有四個政體代表，結成中華邦聯或中華國協（Chinese Confederation或Chinese Commonwealth）：中國、台灣、香港和澳門，一區四票，整合四套海外關係於一身，這大大有利於中華區整合國際政治影響力，情況有如德語區的聯邦德國、奧地利、瑞士和列支敦士登（Lichtenstein）。中國必須能夠有此想像力，才可以突破美國的政治封鎖，自強自立。

中華是天下，不是國家，是仁義禮法之流布，不是血緣種族之伸延。中華邦聯的構思，其實是海洋中華與大陸中華的結合，是個大中華的理念。海洋中華是香港、台灣、日本、韓國、南洋諸國。[二十]大陸中華就是中國本土，中國本土可行聯邦制度，建立中

十八・二次大戰後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協定，於一九四四年七月，於美國新罕布夏州的布列頓森林公園舉行。

十九・懷暢，「為何中國還不是世界強國？」《信報》論壇版，中國圍睹專欄，二〇一一年八月六日。

二十・南洋的華僑社會，更是中國的海外延伸，中國自宋朝與南洋通航通商，華人自明朝大量移居南洋，佔據當地經濟命脈，很多顯要家族都暗藏華人血統（如泰國、汶萊、越南的王族和菲律賓的執政家族）。這些都是海洋中華的範圍。

華聯邦共和國（Federal Republic of China），此為穩妥之道，但要視乎情勢。[二十一]

有此大理想，香港自治就可以光輝壯大，香港人的精神面目也會為之一變。香港先建立自己的城邦身份認同，培養自治能力。其他的事，看中國的政治發展而協同行動。香港可成為中華區的瑞士，有整全的自然生態、文化認同和經濟體系（農、工、商、金融），發揮外交政治中立的作用，也不干預中國內政，成為中國的安全港（safe haven）與思想文化保存所（cultural sanctuary），牽引中國走向文化復興、社會共融和憲政共和。這是香港和中國的安全出路，甚至可以說是唯一生路。中國在滿清之後，無法擺脫外國宰制：日本、蘇聯、美國，中華邦聯之構思，乃中華大政，是中共（中國）掙脫美國韁繩、重獲尊嚴的方法，除非中共主動佈置，否則不會成功，美國也不樂意見到中華邦聯成立。

做好香港自治，垂範中國，樹立中華政治的標準，才是真正的救中國之法。民主統一派和中共的人，都應該看清楚這是香港城邦自治的遠大目標。必須有遠大志氣，香港才可以城邦自治的，否則就很小家子氣和排外。當然，這是平定天下的遠期理想，知道一下就算。先前的貼文才是近期目標。以策略而言，先是香港自治，之後是連結日、台、韓與南洋諸國與港僑海外區，期間可以加入英聯邦甚至歐盟為某種成員[二十二]，之後才是籌謀中華邦聯的

事。中國的出路，必須連結到亞洲的解放與共榮之上。此偉業，日本曾經做過，但日本氣魄不足，私心太重，中國則實力不夠，將來可以一起來做。

這是將東亞自美國手上解放出來的大政治。香港在這個策略進程之中，步步為營，累積勢力和收割利益，即使是中途而廢，中華邦聯不能建立，但也夠香港享用的了。虛其心，實其腹，治國平天下，這就是本書開首所言的：理想政治與現實政治之結合。

二十一．這裡不得不說一下，漢人有生存空間的顧慮。中國的聯邦制的障礙來自非漢族的地區，蒙古、東北（滿洲）、新疆、西藏和雲南廣西地區。這些地區大部分由滿清政府攻略而來，由民國承繼，令漢土得到軍事屏障，而且幅員遼闊，資源充沛，控制漢人地區的水源，卻連接不大友善的鄰國（俄羅斯、印度、緬甸、朝鮮等）。除非時機成熟，否則聯邦制度賦予的自治權力會令到這些地區因軍事挑撥或外交利誘而離心，獨立建國，如蘇聯的加盟共和國一般。

二十二．因為香港有三百五十多萬的英國海外公民，加上其餘英國國籍持有人，可以具備申請加入歐盟的條件。

第七章

香港自治：公共政策正常化

(一)港共政府的消極統治術

(二)政治正常化，民生方可正常化

(三)重提政治領導，化解官僚霸權

(四)文化自主：

立足於本土的文化教育政策

(五)自主的貨幣政策

(六)自足的資源安全

(七)完整的經濟結構

(八)安樂的底層民生

(一)港共政府的消極統治術

香港在九七之前的二十年，英殖政府因勢利導，用吸納民意的方法，將不斷增強的公民權利意識和本土歸屬感融入公共生活，放寬議會選舉的議席達致三級議會幾乎全部直選，開放諮詢架構，促進新聞自由，提供法律援助，設立投訴制度等。經濟增長強勁遇上政治開明，香港市民士氣高漲。九七之後，經濟陷落，但公民權利意識和本土歸屬感依然上揚，亟須民主參與以引導之，然而主權易手之後，中共恐懼香港本土力量坐大，只能任用官僚專權來禁制政治，任用地產財閥來控制經濟，原本開放之政治變成維繫秩序的治安禁錮之術，以便管制住中產及底層市民，保障金融城市必須之專業誠信及城市服務（urban servicing）。香港人不再得到一視同仁的看待，而是親疏有別，為了有效懲戒與港共為敵的人，迫害傳播機構的敢言之士，將異見人士誣衊成擾亂社會秩序的滋事者。此外，法西斯政府之快速處理、強力鎮壓

的作風亦流入香港。政府放棄既有程序，快速處理示威事件，動用警方的重案組上門拘捕非法集會的示威者，即日提堂審訊。

從英國到中國，是兩種殖民主義的比對，前一種是工業時代的，後一種是金融資本主義時代的。前一種依然要依靠本土的實體經濟生產力，並且建立了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後一種則不須依賴本土實體經濟生產力，只須壓住本土的工人階級，使之提供良好治安秩序，提供跨境金融操作和跨貨幣剝削的基礎。

看目前的形勢，港共正在開動維穩機器，以為可以將香港即將爆發的動亂在萌芽階段捏死，但政府未免過於樂觀。開動維穩機器，會犧牲香港的法治和警察的政治中立，這最終會危及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況且，一旦社運領袖和言論領袖被打壓，社會抗爭會趨向零星化和暴力化，如大陸各地失去理性領導的暴力事件一樣。這些零星的暴力衝突當然可以被香港警方當作「治安事件」來強硬處理。然而執法者服從那些違反警察通則的政治命令，只會敗壞紀律和士氣，將來即使有了民主政府，也難號令警政，以文抑武，令警察勢力坐大而干預政治。

一・治安之術，參閱本書第一章。

(二) 政治正常化，民生方可正常化

城邦不是國家，不須兼顧軍事國防，但要借助宗主國或盟友的軍事保護、國際締約及貿易夥伴關係和文化宣傳來維護領土安全，除了不須兼顧軍事防衛以及維護領土安全的方法與國家不同之外，城邦的內外政治和公共政策與國家無異。香港在英治時期也是除了軍事防務之外，內政與一國無異。香港在一八四二年至一九九七年期間，防務都是由駐港英軍主理，香港支付軍費，形同向英國購買軍事保護，本土的皇家香港軍團（義勇軍）、香港軍事服務團及皇家香港輔助軍全屬輔助性質。九七之後，香港防務由中共負責，北京不須香港支付駐軍費用，借助軍事臣服關係來模糊中港之間的互惠關係。〓

九七之後，雖然《基本法》賦予香港的自治權力大於英治時期（例如終審權在香港、特首由本地推舉等），但由於中共動用非憲制的手段干預香港內政，令港府形同虛設，無法應付二十一世紀國際金融城市面臨的艱險，香港自治必須達致下列政策目的：

一、**重整政治統領，化解官僚霸權**：以遠景規劃和策略判斷來化解短視的官僚反應及妨礙公民自由的官僚唯理主義；普選特首及立法會；廢除功能組別及永久廢除各級議會的委任制度；

二、**促進公共問責，鼓勵公眾監督**：提倡尊重科學與歷史的政策研究；開放公共政策諮詢；重建地方議會體系（恢復類似市政局的功能）；鼓勵社區自主規劃及社區參與市政管理；建立檔案法[三]；

三、**文化自主**：立足於本土的文化及教育政策；

四、**經濟自主**：自主的貨幣政策與公平的稅制：考慮港幣不掛靠任何貨幣，自行建鉤及容許浮動；放棄高地價政策，減低土地租價；提倡按年徵收之土地租稅代替一次過賣地；增加政府常規收入來源（例如考慮開徵商品增值稅）；

五、**確保本土資源安全**：本地供水及發電；逐步取締核電；策略性糧食存儲系統（海外儲糧）；重整土地規劃；贖回新界原居民的丁權（促進原居民均富！）；保育農田水利；

六、**建設完整的經濟結構**：復興農漁業、鞏固本地工業基礎並提升增值能力；振興本地食物加工業及環保循環業；創意工業；商貿金融；休閒度假業；

二・即使共軍駐港防衛不收取軍費，但也有機會成本，例如佔據市區重要的據點及不許港府取回荒廢之軍營用地。

三・即是立法規定政府部門必須按照檔案學的原則，保存記錄和留下檔案。港共與中共一樣，都是臨時革命政府，時刻準備後路，以免被新政府清算，以前的殖民政府，即使在立法會仍是全部委任的時期，依然將尷尬的對話全部記錄，刊登在憲報，文書檔案全部留存。

七、保證安樂的底層民生：贖回領匯；與建各級公屋；充分利用土地儲備及提高土地利用之效益；恢復及更新「二元經濟」的格局。

香港在九七之後的政治，是地產財閥與金融財閥合體[四]的掠奪式資本主義及港共政府的官僚理性主義的合謀。地產財閥與金融財閥合體的掠奪式資本主義，顯而易見，大家心知肚明，香港特區政府的官僚唯理主義和統治香港的「治安論」，卻要解釋一下。唯理主義源自法國哲學家笛卡兒（René Descartes 1596-1650）的思想，認為人類可以用理性代替信仰，從此過着合理和幸福的生活。唯理主義在政治上的氾濫，是相信政府可以用專業知識和精密規劃來令到人民過着合理和幸福的生活，不相信人民的各自努力和碰撞實驗，而認為大眾完全可以在精心設計和周密策劃好的制度框架內，朝着預先設計好的發展目標，各安本分，達至幸福。這裡所謂理性行動傾向多半是指安分守己，各司其職，不要衝擊統治者，相信政府有能力設計好發展目標和管理制度，所謂善就是知足，遵紀守法即實現了公民自由。這就是集權式民主制（totalitarian democracy）下的所謂自由社會，它必須依靠強制和暴力的政權工具，厲行執法，將法律和規章詮釋到最嚴厲的程度，例如用極級刑法來檢控街頭擺賣的老弱小販、示威的合理衝撞視為襲擊警察案處理、用對付跨國販毒集團的警署重案組來偵緝尋常的示威學生等。所有衝擊規矩的人，都被視為非理性的顛覆分子、治安擾亂者而受到刑法處理。唯理主義的傳統，衍生了法國大革命的殘暴、德國國家社會主義（Nazi、納粹黨）

的狂亂和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的暴政以及至今仍在打著代表人民的旗號的形形色色的極權主義政權——如開放改革後的中共、李光耀執政時期的新加坡和九七之後的香港。港共的官僚理性主義極其迷惑人心，因為它假借前朝政府留下的法治外衣，以致一般香港人也不明就裡，認為政府應該加強執法，對付擾亂治安的抗爭者。當然，這是依法治國（rule by law），不是治國以法，即是法治（rule of law）。

香港官僚與地產財閥設計好的幸福方程式：

一、不要搞事，安分守己；

二、用「獅子山下精神」來拼搏打工，努力讀書「增值」；

三、努力供樓；

四、等待子女做專業人士，出人頭地；

五、等待樓宇升值；

六、靠賣出樓宇及提取公積金孳息，退休享福。

四．香港的地產財閥靠地產壟斷套取到巨額現金（賣樓、商場租金及管理費），同時投放於金融市場，集資上市、收購合併、購買銀行股份及成立證券公司，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開始，就與金融霸權合體。

可惜的是，在掠奪式資本主義之下，這條方程式的後部分（3-6），已經崩裂了！很多人手足無措，前路茫茫，只能安於1和2，然後埋怨「長毛」和黃毓民搞事，阻住他們發達。他們不知道，財閥霸權不再允許他們踏足3-6，不得越雷池一步。

筆者知識所限，除了第一及第二點的政術範圍之外，其餘只是提綱挈領，恕不一一探究。

(三) 重振政治領導，化解官僚霸權

不管是封建王朝還是民主共和，都需要政治統領（political leadership），區分緩急輕重，統籌政策制定及監管執行。九七之後，香港政治的問題，不單止是民主倒退、管治失靈的問題，而是政治領導真空，令官僚唯理主義（bureaucratic rationalism）橫行。官僚的任務不是做好這份工（perform the duty），而是做穩這份工（secure my job）。捏造規章以自榮，毀滅檔案以自保[五]，公器私用，視公帑及撥款為私有之物，公帑吝嗇不出，對申請公家撥款的團體則頤指氣使，是近年港府的腐敗現象。公務員內部也因為司局級首長改行特聘制度（俗稱「高官問責制」）而上下離心，為符合公共服務改革及保持常規編制人數，新聘的公務員待遇差，部分

公共服務也外判，前線員工不少轉用合約制。外判的臨時工都不獲授權處理例外事務，也不敢凡事上報，於是只好遇事即禁，不容例外行為，損害公民自由。[六]

正路不走，走邪路。港共政府具有公共問責性質的政治領導失效，卻不能假設政府的領導真空，假設屬下的庶務部門和公務員是政治中立的、公事公辦的。反而，司長局長默不作聲，暗中下令，上下其手，執行微細的政治任務，市民便無法監察，形成陰險政府、特務政府的性格。例如二〇一一年區議會常設選舉，「選舉事務委員會」竟然變成「選舉政治委員會」，刻意將投票站遷離常規地點，推低投票率，又刻意不在選舉之前調查龐大數量的種票事例，提高親共派的候選人的勝算。[七] 即使是無所作為，不依常規做事，只要不提供補救措施或撥款，任由情況變壞，也往往可達到暗中的政治操縱。[八]

五．二〇一〇至二〇一一年六月，政府檔案處批准各個政府部門因搬遷政府總部而銷毀的文件數量，高逾五百萬張。相對之下，保留的數量僅雞毛蒜皮，只有約一萬。參閱〈政府搬總部秘密銷毀六百萬檔案〉，《壹週刊》，第一一二三期，二〇一一年九月十八日。

六．殖民地時代留下的香港市政法例是訂得緊，執行得鬆，必要時維持政府的強制能力。

七．〈區選三成票站執位擾民 陳雲轟政府有心推低投票率〉，《明報》，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三日。沙田市中心選區（編號R01）的投票站，由沿用幾十年的沙田大會堂，搬遷到選區之外的崇真學校。記者證實，到新的投票站需要穿越天橋、隧道及停車場路口，耗費多一倍時間，而且障礙行動不便者。此外，種票之疑雲，有一小住戶登記十三名選民，六萬選舉通知書因地址無人接信而退回選舉事務處，不一而足。見〈美孚選民不住美孚「一屋七姓十三人」成員現身，分布油塘、青龍頭、紅磡〉，《明報》，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八．例如監察警方濫用權力的監察警方委員會，接收的投訴歷年增加，庫房卻不增加財政撥款，無端令許多調查無法進行，保護港府借助警方濫權以打擊示威遊行。參閱鄭經翰〈庫務局陰乾監警會〉，《信報》，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三日。

經濟單元化與政治單元化之合謀

中共君臨香港十四年以來，不容許香港有執政黨，又不能組織統治班底和政策支援，只是按照英國人留下的文官體系，隨機應變，權宜行事。然而，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香港工業空洞化[九]，中小企被地產霸權侵蝕，市民生計不再安穩，九七之後香港面對的是金融資本主義的湧動，這種權宜行事的自動駕駛系統（auto-pilot），已無法應付動盪時代，卻可以使之轉型，配合地產霸權的掠奪。

政府一邊是秉持縱容大資本肆虐的新自由主義，擴大財閥的經濟壟斷，行其掠奪式的資本主義（predatory capitalism），摧毀香港中小企及港人的經濟自主能力，令經濟單一化、僱主大財團化，增強小市民的臣服感及挫敗感；另一邊，官僚取得賣地及地產衍生的龐大收入之後，從財政收入及公共支出兩方面，都不再具備公共問責性——政府用賣地取得公共服務及福利事業的常務經費，毋須向市民徵稅而附上問責，卻在公共財政的政策無所作為，不矯正或舒緩小市民面對市場失效的痛楚，甚至用派錢六千元推塞公共財政干預的責任。在日常政務方面，政府以官僚唯理主義（bureaucratic rationalism），事事加強管制——如潔癖式的市政管理、切割式的市鎮規劃，剝削市民公民自由，用專業理性挫敗日用理性，擴大官僚的社會專政力量。官僚唯理主義的特色是部門單一理性，轉嫁責任而互相扯皮，表面上好似無所作為，

政府任人辱罵，卻製造既定事實，達到專政的目的。例如面對大陸孕婦來港產子的問題，醫管局擔心產婦病床不足，教育局卻認為有助舒緩本地學童不足，可以緩解「殺校」的困境。至於專門負責的入境處和統籌政策的政務司，卻從未主理其事。若干年月之後，二〇一一年十月十四日，負責制定人口政策的政務司長林瑞麟卻以既定事實的方式說陸婦產子已佔本地新生人口超過一半，並盛讚陸婦「層次高」，香港必須「做好準備」，迎接陸婦之子來港定居。[十] 連公共政策都沒公開談過，政府就宣布迎接外來人口了。

政府貌似無能，無所作為，但騰出的政治真空，卻可令地產霸權、官僚專制及大陸殖民可以為所欲為，達到異常恐怖的統治效果。要化解地產霸權及專制官僚的唯理主義，只能靠市民的公民參與意識，推動香港雙普選，重建有問責的政府決策層。決策層要用首長級官員、政策顧問、政黨代表及外援人員來組成。有能力運作的決策層，需要有民主程序來授予權威，才可以發揮決策能力及呼應本土文化精神。故此，雙普選是解決香港政治的必經之路。

九・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大量香港工廠及商貿服務北移，令九十年代中期之後，香港產業空洞化。

十・〈林瑞麟：面對港人內地子女 本港要作好準備〉，香港電台即時新聞，二〇一一年十月十四日上午九點十分。

(四) 文化自主：立足於本土的文化教育政策

善政不如美俗，良好的公民道德及行事習慣是文明法治社會的基礎。由於大陸腐敗，不足為法，香港必須自立文教，放眼世界。

香港處理文化問題，正常的公共政策有兩種進路：一是將香港塑造成一個開放參與的多元種族社會（multi-culturalism），準備同時容納其他漢族人口和非漢族、非英語的少數族裔語言進入公共領域，政府提供公共資源協助實踐少數民族的文化權利。在丹麥、挪威等北歐小國，即使只有一名少數族裔學生，學校也會盡量為之爭取其民族文化教學資源。然而考慮到香港的文化環境，仍應以融合政策為主，不宜鼓吹多元主義。為了融入少數族裔，要格外提供資源，幫助他們學中文。面對數量龐大的大陸新移民，香港必須採取同化政策，否則香港將變成深圳的南北混雜而缺乏文化主流的移民城市。

香港雖說是文化多元而社會開放，但文化主流仍然是粵語人口、嶺南文化，並非真的是南北、中外混雜的移民城市。廣東人源自古代越族，在漢唐期間接受中原文化，此後關山障隔，免受

胡人沾染，邊陲之地，反留有漢音唐風，德國民俗學稱此為文化孤島（德文 Kulturinsel），猶如今日要親見唐代之淳厚，宋代之雅緻，要參訪日本京都。況且大陸人承襲共黨之野蠻風氣，一旦文化混雜，恐怕未見其利，先見其弊。中共的滲透破壞，非同小可，必須抗拒香港教育、傳媒和政壇的「大陸化」，才可以保住香港文化的。

至於文史教育及文藝創作，必須要有奮發的社會氣象支援。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有青年人讀文史，是香港社會仍保有中國意識，也希冀國民政府可以反攻大陸，或寄望大陸民主開放，有個寄託，才會鑽研文史的。後來共黨長期執政而腐敗如昔，便傷心絕望，少人讀文史，連教的人也灰心喪志。美國和歐洲也有很多人讀文史的，那是因為人家有一個正常的國家，學問有用武之地。文史乃修身與經國之大業，將來香港自治，文明自立，有邦國可經，便有青年煥發文化自豪感，醉心文史與文藝創作，香港之文藝復興，乃有可為。

自立之文化教育政策，本書不能專門而論，只能概述如下：

一、**語文政策：**政府帶頭示範，在公共空間維護高標準之中文及英文。公共中文堅持古雅文風及正體漢字。中小學校之中文教育，堅持沿用粵語教學。國際學校、私立學校自由選擇。普通話只能當作語言科目來學習。香港的大學有研究顯示「普教中」（普通

話教中文）無益於中文寫作。獨立的普通話科已經足夠應付語言需要，不必犧牲整個中文課程來學普通話。十一

二、**公民教育：**堅持香港自己的公民教育，抵制所謂愛國教育。

三、**基礎教育：**修正九七之後的教育改革劣政，投入更多資源，提高師生比例，五育並重，輔導學生成長。

四、**高等教育：**維護學術自由，教授治校，維持人文學術與應用學術之平衡發展。增加本地研究。

（五）自主的貨幣政策

經濟之道，首重貨幣。香港對外掛鈎美元，令價格昂貴，對內掛鈎人民幣（不明言的匯率掛鈎），令資金北流。人家是死路一條，香港是死路兩條。香港回歸共產中國，除了政治自由受到扼殺之外，最致命的是經濟發展的主權被一個經濟上與自己競爭的政權套牢了。

中共借助港元與美元掛鈎的間接聯繫，享受外匯管制與幣值穩定的雙重好處。港幣兌美元長年偏高，而人民幣兌港幣則長年偏低，低匯率的人民幣，方便國貨出口，但港幣兌美元長年偏低，令香港有入口通脹及熱錢流入樓市，地價偏高，生活費用高昂而影響競爭力。對國內則流失消費、資金和工序（從工廠到商業服務），可謂兩頭失血，遲早陰乾。

受到共產政權的箝制，港幣兌美元不能脫去一九八三年定下的鈎（7.80港元兌1美元），對人民幣也不能貶值，港幣對外對內皆失去貨幣政策自主權，成為「雙失」貨幣。中共要借助港幣為外貿屏障，只好犧牲香港的經濟自主權，這是港人被迫的「愛國捐獻」。而香港的地產財閥，則可借港元的制度上的缺陷上下其手。他們對外宣稱，港元持續貶值乃美國聯儲局的政策所致。他們運用內地政府的強力行政權力，指導港府合作跨境規劃土地及興建高速交通網絡，再用地產財閥的市場權力，界定各地的地產價格，這是跨境運作的中港官商勾結之下的超級地產霸權勢力。若果公共輿論要求政府動用金管局二萬多億之財政儲備，他們又會詭辯捍衛港幣自主，拒絕救援水深火熱的市民。由於不能動用儲備，加上「地產霸權」壟斷必需品的價格，社會上的商品增長，追不上貨幣增長，本地的商品的價格唯有不斷上升。

十一．此等本土語文問題，請參閱筆者的《中文解毒》系列三書。

然而，對於中共來說，如果香港的敗局持續，長遠仍有隱憂。香港至目前為止仍為內地提供最有借鑑價值的西方現代制度，一旦香港衰亡，中國將失去一個制度創新和與西方社會直接交往的橋頭堡，往後，開創現代化的任務便要由積習難返的內地城市來承擔。要內地自行實驗西方制度，直接面臨現代化的衝擊，恐非內地的脆弱社會可以承受。但是，內地的地方政府（如粵省和上海），則樂見香港衰敗，這將加快內地城市瓜分香港的業務，吸收香港的投資和人才。目中只有自家利益的地方官，他們見香港一時衰敗，趾高氣昂，不可一世。然而，當香港的業務都瓜分了，香港人的浮財都被吸收了，中共又有何能力再闖新的局面？

中共亦無法要求香港的地產財閥自我克制，服膺港人之道德準則。商業乃「以利求義」，以利益為本，在不損害利益之下，旁及社會公義，復以社會公義改善營商環境，減低交易費用。目前由於港幣長期被掛鉤的美元推低幣值，地產樓房投資成為資產保值之出路，建立一套自主的貨幣政策乃勢在必行。因此，港人需要檢討貨幣本位與金融政策，鞏固財政主權。

解決香港之經濟困局，與美元脫鉤是免不了的，所差者只是如何鞏固港元穩定而已。就目前來說，港元可有兩種選擇，決定採用何種的錨（anchor），減少交易費用。一是採用英美的法定貨幣

錨貨幣（fiat money）制度，由中央銀行監察物價指數與經濟指數，調整利率高低及貨幣供應量。一是採用張五常教授倡議的「一籃子物品」之貨幣政策。簡言之，便是將一系列的貨物組成一個指數為錨，以變動指數內的貨物價格，用作調整貨幣。上述幾種制度均可考慮成為港元長遠的貨幣政策。

（六）自足的資源安全

所謂「國破山河在」，山河水土是國族資產所在。時人愚昧，以為加速工業化便可富國強兵（這是所有共產黨都會犯下的錯誤），殊不知工業化只是現代化的皮毛之術，立國開元，道濟天下，始於農政，亦成於農政。

農民剛毅沉實，誠信不欺，代代戀土，敬天法祖，乃國之根本，士之來源，德國民俗學稱農民為最忠貞之文化傳承人（Kulturträger）。農業於政治文化有大功，「農政」乃安邦定國之學。戰國時即有農家思想，為九流十家之一。秦王嬴政以耕戰合一之策，掃平六國，統一中華。希特拉發動「血與地」（Blut

und Boden）的軍國政策，農民忠貞擁護。中共以農村為根據地，靠農民提供兵源與補給，打敗雄師百萬之國民黨。在本地史上，英國佔據香港之時，遭受到的武力抵抗，亦不是來自城市，而是來自耕讀傳家的鄉土。錦田鄧族鄉民於光緒二十四年（西元一八九九年）奮勇抗英，英軍開炮還擊，村民死傷無數。

其他現代化國家，農民文化亦是立國根本。英國莊園貴族之安閑沉靜，紳士之急公好義，來自鄉土薰陶。美國橫掃六合，其牛仔式驍勇，來自農莊，布殊總統閑來居遊於德州牧場，且以之招待入幕國賓。法國、意大利之生活品味、佳餚美饌、創意工業與精密工業，亦不可一日脫離本土農作。至於文化旅遊、本土經濟、水土維護及鄉郊風景美學等，都有賴生活得有文化尊嚴的農民來支撐。農業補貼是政治的問題，多於經濟學的問題。美國可以在本土控制生產的牛肉、乳品、雞蛋、麵粉、馬鈴薯和玉米，才會化作麥當勞的食品，從整個供應鏈上扼住世界——特別是年青人的脾胃口味與視覺觀感。

農業是浮華世界的「在地」之根，是國政的深密動力。全球化之下，不能外判或不宜外判的業務是農業，推行全球化的文化侵略或反全球化的文化自保，農業都是重中之重。

水源不若其他如石油、煤氣之類的能源，可以遠洋運輸及儲存。水源來自本土或鄰近地區的水文系統，與生態及人民生活結成一體。取水的集水區，除了是河源，也是植林及生物之保存地，也是農、林、漁業的命脈。水是戰策資源，日常生活及漁農工商，無水不行。任何政府都要確保水源穩定，盡量做到自給自足。香港的水源依賴購買廣東的東江水，由於全球氣候逆轉，華南進入乾旱時期，廣東各地面臨水荒，現在東江水的水量及水質素已無保證，香港需要建立食水政策，避免過分依賴廣東水源，以免令廣東得到除了商業得益之外的政治籌碼。香港可以加建大型水庫，修築貯水系統，擴大收集途徑和範圍。修補水管滲漏及加強二級水之使用。另外要加快引入海水逆滲透之化淡技術。香港夏天雨水豐富，市區也應鼓勵天台及平台貯水系統，作二級水使用（灌溉及洗滌用途）。在不妨礙排洪的地區，與建地下貯水池。

九七之後，港人治港，本來必須做的土地治理工作，卻被擱下了。當中，要實施嚴謹的土地規劃、民眾參與的社區規劃及自主管理。鄉間要有水土保護，政府收購或資助策略性的保育土地。殖民政府撤出之後，新界原居民的特權地位必須取消，政府應動用儲備金贖回「丁權」，一來可緩解港人裡面的權利不平等，二來可促進原居民團結，不致於因為某些原居民勾結地產商、賣地謀財而引起村社分裂。至於後山墓葬、風水林等風俗權利，則可

依現存法例保護。被非法填土破壞的農地，將依法徵收罰款，責令還原。當中，可以施行大量生態工程及創造就業機會。此外，必須厲行文化保育政策，保護海港景觀及航道安全，保留社區建築及象徵現代開放之公共建築（如原有之政府總部），還原天星碼頭及皇后碼頭，停建高鐵及港珠澳大橋。金紫荊廣場剷平，金紫荊及回歸柱扔落大海。[十二]

電力政策方面，香港供電穩定而服務可靠，但香港兩家電力公司所賺取的利潤，遠較亞洲其他國家為高。港府必須重訂電力供應的利潤《管制協議》。煤氣公司亦因政府的政策上的便利造成一家獨大。對治寡頭壟斷，政府應引入《公平競爭法》或《反壟斷法》，研究是否可以開放輸電網絡，鼓勵再生能源加入電網，並與廣東省商議搬遷核電廠，香港放棄核電。當然，節約用電、取締光害及鼓勵天然採光等現行政策，將持續進行。

（七）完整的經濟結構

義者不言利而利自來，利者不言義而義自失。解決香港的經濟結構失衡，必先妥善處理第一產業之問題。昔日中共建政之後，

背信棄義，剝奪農民地權，為實現工業化的原始累積而以種種方式掠奪農民財產（查抄沒家產、壓價收購以出口創匯等），又以公社的政治集體生產組織，取締鄉族的地緣結盟，令農村在經濟和文化上破產，農民在今日依然是二等國民，受重重盤剝，流徙於城市的民工亦享受不到國民福利。中國之沉淪，不在列強侵略，科學不振，而在鄉土破敗，農心失落。毛澤東的大躍進，以農民為主體，以糧為綱，意欲振興農村經濟，卻令農村凋敝，饑民遍野；八十年代的開發改革，靠的是血汗資本主義，以圈地政策驅趕農民入城為奴，令玻璃幕牆之下，廢園處處。

土地之正義，乃一切公共政策的正義基礎。不正視土地糾紛，現代產權經濟亦無從說起。香港發展立足本土福祉之經濟，必須先解決土地正義，贖回新界原居民的丁權，放棄高地價政策，採取逐年徵收土地租稅代替一次過的賣地收入，令地產商成為單純的建屋及管理物業的服務提供者，無利潤誘因去囤積土地和炒賣房產。政府提供足夠的、各級價位的公屋予市民居住，務求土地資源作最有

十二・斯二物並無文化意義累積，而是恥辱象徵，故必須摧毀，正如必須摧毀毛澤東與薩達姆之塑像（只保留若干歷史悠久的即可）。反而，土共的愛國學校、工人診所等大廈，卻有文物意義，要選擇而保育之。

經濟及社會效益之運用。不影響環保的填海造地要繼續，甚至研究向中國取得同意，在香港南端海洋取得海島為新的領土。政府徵收土地及商舖閒置稅，動用官方閒置土地，搬遷金鐘海軍總部及收回市區軍營用地，務求供應足夠土地減低香港生活及營商成本。

在香港發展農業只是策略性和文化上的，香港的農地不足，但可以保存香港本土耕作，提供高質素的風土食物，鞏固香港文化形象及推廣科學教育。香港農政之要旨，在於保存農業知識的本土基地，支援食物加工、飲食業培訓、青年耕作教育及悠閒旅遊，並非提供足夠食物。

工業方面，香港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大部分輕工業北移，導致技術人才流失。然而，香港的工業亦可循高增值及文化創意產品的方向發展。留在本地工業，也可以保存商業貿易的服務技術，否則香港的商貿人才只能有課本知識，難有實踐經驗。此外，食品認證、醫藥認證是香港可以做的精密工業，甚至建立類似「香港工業標準」（Hongkong Industrial Standard）的權威，使中國產品得到安全保證，建立品牌，也為香港的科學人才提供就業和創業機會。然而，前提必須是香港與中國隔離，否則中共的歪風南下，香港缺乏自治的政治權力及本土文化身份抗衡，必會失守，香港認證只是廣州認證、上海認證的海外版本而已。香港工業標準的概念來自德國工業標準（Deutsches Institut für Normung,

DIN)。香港的工業品可以有香港製造，或香港認證（Approved in Hong Kong）的標籤。

互聯網不但是奪回公民權力的工具，也是香港策略發展產業。香港資訊自由，可以發展香港為網絡基地。Google宣布，因亞洲網絡增長全球最快，故在九龍區購入2.7公頃土地建數據中心，預計一至兩年內落成，買地及造價總投資額料逾一億美元。Google所以決定於香港投資，原因是該公司不滿內地審查資訊，認同本地開放的資訊政策可保數據私隱。

(八)安樂的底層民生

面對後工業社會及金融資本主義，香港必須照顧本土的底層市民，用社會福利、退休保障、低級公務員職位、中小型工業、小商販區、地租補貼、街坊店鋪、公屋鄰舍關懷及社區資源支援與物資共享等方法，整體支援。即使以功利的經濟學而言，小民恪守道義，維持大都會的可靠服務及良善風氣，卻無重大個人收

益，他們的道德操守、文化修養和良善行為，是共用品（public goods）[13]，是遭到謀利者的借用而並無付予費用的，是故，政府必須安頓小市民生活，大財團也有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

限於篇幅，本章只闡釋地租補貼的政策。

香港由於腹地不足，底層人口並不能安頓在鄉郊和外省，故此必須在本地設立二元經濟。[14]羅湖邊界是硬邊界，此乃一國兩制之源，也是香港政治經濟學的第一原則。一九五〇年，羅湖關禁，共產中國不容許香港人口自由往返大陸，羅湖的邊界不再是軟邊界，而是硬邊界，貧窮人口、戰亂流民都不能輸送大陸，而要港府自己處理，因此香港不能如紐約倫敦一般，採取一元的自由經濟政策，將貧困人口輸送往租值低廉的腹地，而必須採取二元的經濟政策，在本土範圍創造租值低廉的後園。所謂二元經濟，就是一方面容許資本家自由營業，另方面政府規劃及干預市場，在民生範疇劃定界限（工廠大廈、公屋商場、鄉郊農地等），約束資本擴張，照顧貧民在香港本土的生計，但又不能使之依賴福利，而要隱蔽的放權讓利，將之鍛煉為本土經濟的生力軍。這是自由主義與福利社會主義的巧妙結合，也是英國政術在香港的本土實踐。

巧妙進行而不令自由市場名聲蒙污的經濟干預手段，就是隱晦的地租補貼，或刻意不依循市場競爭的方式來徵收租值。香港的地價是生計和營商的最大開支，以隱性地價補貼充當間接福利，還是直接給予社會福利，是殖民政府施政之核心策略。寬鬆管理的公屋、公屋商場及商舖、居屋、工廠大廈、工業邨、暫准的山邊寮屋和山寨工場、街頭的大牌檔、地攤和流動小販，全都是政府補貼地價的地方。隱性的地價補貼，穩固了香港的底層，並且催生中層。除了補貼生計、協助營生之外，福利地租還肩負在香港推行社會工程（social engineering）的政治工作，穩定低下階層的民生與民心，並且輔助及提拔當中的聰明勤奮者進入基層中產，快速壯大中產階級，締造欖核型的社會（中產最多而貧富在兩頭），令香港在短短三十年間，將大陸來的難民改造為文明的香港市民。這是香港的文化奇蹟，光照現代中國。

十三・共用品（或誤譯為公共財）是經濟學觀念，指那些多人使用而不會影響供應的物品，例如光猛的陽光、乾淨空氣、清潔水源、無疫病的社區、市民公德心、社區的文化品味與仁愛關懷之類。這些物品難以區別出使用者，很難進行排他性的收費，消費者也不願支付費用，因為無法證實產品只是為他們提供的，故此難以計算出價格和成本，無法做市場交易，只能用政府或慈善捐獻來維護，或者用人民之間的互相報答、不計較報酬的方式，在社會延續下去。

十四・這是香港浸會大學前經濟學教授曾澍基在一九九七年提出的本土經濟理論。

地價補貼，促進整體生產力

市價的地租（私人樓宇及市值租金），區別出資產階級及高級中產階級。補貼的地租，維繫着基層中產和底下階層。地租補貼與否，營造了香港的兩個世界。地價補貼均衡了社會財富，給予勞苦階層信心與希望。干預工作以隱晦的地價補貼進行，政府在名義上，還可以贏得低稅、復又低福利的政治奇蹟和國際口碑。

英殖政府與港共政府的最大政術差異，在於土地的價格分歧政策。殖民政府放棄部分地權收益，給予平民地價補貼，甚至默許若干地權侵佔，令低下階層避開福利領取者的尷尬與無助，建立白手興家的自尊心與經營力，不直接給錢，而是要市民自己想辦法去做去拚，興家立業，從中也鍛煉出無懼官府管制、敢於與官權周旋的市民勇氣，鍛造出上一代香港人的生猛面貌。直接福利令市民喪氣，而且涉及大量的官僚編制和行政開支。犧牲地價收入，卻省回了直接福利開支，並鼓勵平民自力更生，滋長企業家精神和市民勇氣，這是基於經驗主義的實際政術。十五

特區政府缺乏政治智慧，只好高舉條條框框的官僚唯理主義，不顧香港隱秘的福利社會主義傳統，凡事依循財閥授意的新自由主義，以自由市場為施政準繩，於是收回前朝的種種地價補貼，不容地權侵佔，一味停建居屋、緩建公屋、趕絕街頭擺販、加速

清拆霸佔官地的山邊寮屋及鄉村菜園、「活化」工廠大廈及居屋二手市場、加緊收地重建，將原本多元批出的官家土地產權和租地，施以同質化（homogenized），便利投入私營地產炒賣或產權上市託管（如公屋商場託管予領匯集團），食環署也在公共街市徵收市值租金，賣地收益及市值地租充實庫房，成為官僚養肥自己、擴張權力的經費。

取消地價補貼，摧毀社會基礎

英國殖民者是赤裸裸的逐利者，他們在香港向中下階層放權讓利，自有深刻的政治經濟學考慮。首先，在香港建立二元經濟，必須二元租值。上元的經濟是高增值、容許資本自由競爭的事業，下元的經濟是低增值的、限制資本競爭的事業，卻可以培養企業家精神，並鍛煉香港市民的下一代。舉例，兒童親歷家長艱苦經營小商店，往後在大學修讀工商管理，將會集合江湖商技與正規管理於一身，靈活而不失體統，這正是香港目前中年一代幹練的經理人的精神面貌。香港的最大資源，在於擁有企業家精神的人才。地價補貼及灰色地權，鍛煉低下階層的才智，使之往

十五．此處用「經驗主義」一詞，是說明這套政術是逐步發展出來的，甚至是為勢所迫而發展出來的，並非一早構思好的。在此感激《信報》網上論壇羅友恆君的回應，此句依其批評，潤飾修訂。

上層輸送精明幹練的管理人和創意人；而下層的穩健生計，培養了工人和小企業主的高昂士氣，令往日香港的都市服務業者講究誠信而又富有人情味，吸引富人及人才來旅遊、投資、置業和工作。基層的誠信服務和整體社會安樂，令上層的高增值服務可以進行，節省交易成本，大企業主不必耗費太多精力及時間於防貪、防騙及保安之上。

地租補貼令低下階層安居樂業，以前是民主的替代物，或高壓統治的軟墊。今後，香港民主自治，更要實踐市民的經濟權利和文化權利，令社會底層，安和樂利。

第八章

自治保經濟，自主保尊嚴

（一）香港資本家無家可歸

（二）籌備本土的準執政黨

（三）香港保住富人的身家性命

（四）以政治特權交換經濟特權

(一) 香港資本家無家可歸

中國到了明代，商業鼎盛，三寶太監鄭和的寶船遨遊南海，世界震驚，然而中國無法孕育資本主義，當中原因，是中國乃以科舉文官統治之中央集權體制，商人無法自立，形成抗衡之勢力，必須依附朝廷勢力，勾結官員或鼓勵子弟做官取得特權，法治和公平交易也無從做起。香港的商人也是，必須依附各種政府勢力以生存，他們有政治信仰和理想，但為勢所迫，只能尋求靠山，作各樣的政治投機。清末民初的香港商人，殖民政府是他們下錨之處，但也念念不忘在中國做政治投機：支持孫中山革命、聲援袁世凱復辟稱帝、支持陳炯明廣東自治、資助孫中山北伐袁世凱、偏向國民黨卻與共產黨眉來眼去。香港在主權移交的過渡期，上世紀八十、九十年代，香港的華商由親英轉向親共，成為中共的座上客，也與中共成為在香港的非神聖統治結盟，華商成為中共在香港的封邑諸侯。所謂非神聖結盟，是貌合神離、口是

心非的結盟：中共知道華商並非自己人，也熱愛憲政民主國家的保障，與共黨結盟只是謀利而已。這種「有限度合作」的統戰關係，中共一向擅長，但也始終提防，知道夥伴的日子並不長久。

香港之解殖與自立之所以難為，在於華商之身不由己，政治上不能植根當地，無法建立本地人執政的政府和抗衡政府的公民社會。然而，九七之後，可以依靠的英國殖民政府走了，中共卻有崩潰之趨勢，也有轉向民主的可能，香港華商必須思考植根香港政治的問題，建立香港的政治主體，整合政府、政黨及公民社會，取得自己的政治地盤。

資本主義繁榮，財閥世家長久，靠的是保護私有產權的法治制度、維護自由市場的民眾，乃至誠信不欺的民風。法治制度靠憲政共和體制維繫；自由市場靠公共服務支援，市場失效之處，更靠政府福利來補助；誠信不欺的民風，靠的是仁義與慷慨的道德行為。九七之前，香港依附英國的憲政和法治，私產得到保障，政府監管市場，令交易公平，六十年代之後，政府提升公共服務，官員廉潔，福利補貼和民生措施令基層市民生活安穩，社會風氣淳樸，令市場交易費用低[一]，營商環境良好。

一．例如不必過分提防欺詐而令做生意要支付監管費用和預備風險損失。

九七之後，香港的主權移交中共，中共自身無法無天，但中共的資本主義經濟是靠另一個憲政共和國來跨國維繫的，那國家是美國。美國發行國債，中共買入美國國債，美國支付低廉的利息，得到中共的融資支持，便發行美鈔，令美國銀行資金充裕，可以提供低廉信貸予美國企業入中國投資，剝削中國低廉的工資、環境污染代價和國民健康代價，貨品出口世界，利潤回歸美國。[二]中共的混亂的司法狀態，加上其詭異的跨國經濟體系操作，以及不公義的本國金融，令香港的資本家無所適從，無家可歸，只能加快在香港賺取利潤，不惜壟斷經營，排擠小本經營者，並且借助地產盤剝利益，殺雞取卵，破壞商業道德和社會風氣。香港的《基本法》和法治制度無疑仍是運作良好，但偏袒財閥而破壞法治的案件愈來愈多[三]，令市民失去誠信的耐性。這些都令香港的資本主義趨向下流，無以為繼，一旦中國經濟蕭條，政治動盪，香港的政府權威和民眾信心無法維持。

功能組別，困鎖財閥

香港的資本家依附於權威政府而不能植根於民主政治，是香港無法取得長治久安的困局。群眾自願的投票授權和道義支持，才是真實而恆久的政治資源。中共可以授意香港政府，容忍財閥用地產和聯營的方法謀取暴利，妨礙香港的經濟活力，損害香港基層民主，卻不允許他們取得民意授權，建立自己的政治勢力。

立法會內的功能組別是香港財閥的特權溫床，卻也同時是他們的政治監獄。財閥除了在功能組別作威作福之外，在社會上臭名遠播，毫無政治影響力。於現實政治而言，功能組別不是用來發揮財閥的影響力的，而是用來圈禁其影響力的。功能組別令香港的財閥背負政治原罪，遭受民眾鄙視，即使個別商人樂善好施或優待下屬，也令整體資產階級蒙羞，不得民心。

香港如真的要發展資本主義和促使社會和諧，中共理應扶植商人組黨參政，令商人的利益擴張可以與民意調和，商家受到民主投票的制衡，便懂得放權讓利，調解貧富衝突，生財有道，令資本主義永續經營，發展出一套適合香港的政治經濟學。然而，我們也要從中共的角度看問題：賦予真實政治權力予並非出身共黨系統及擁有外國關係的香港財閥，這無疑是放任自由資產階級在香港完成奪權革命。

香港的地產財閥，是英國撤退之前扶植起來取代英資的華商，沒有港英的欽點和關照，單憑他們的能耐，試問如何可以成為巨

二・然則，在這個跨國融資和投資的循環之中，美國只是令銀行和企業得益，但無法用足夠的徵稅手段回收國家的利益，令國家負債，禍及人民，本土就業市場萎縮，但美國資本家坐享利益。

三・例如九七之後的胡仙案（星島報業集團商業欺詐案），以及多宗輕判有財有勢人士的刑事案。

富？看看霍英東先生在香港搞地產和其他人在香港搞地產的下場之不同，便知他們與殖民政府的勾結，乃致富之道。勾結的恩惠，是要償還的。中共不容香港的富商開展民主政治，不是懼怕民粹主義，而是懼怕資產階級在地方奪權，甚至在戰亂的時候勾結外國而宣布香港獨立。香港的主流意識形態守舊而怕亂，社會多數人薄有資財，香港實踐民主普選，不會出現民粹主義和福利社會，中共不容財閥落場參政，來自國家安全的顧慮，多於經濟自由政策之擔憂。

(二) 籌備本土的準執政黨

然則過渡期間，香港的民主化，可以由兩組代理人充當民意載體：親共的民建聯及親美的民主黨。民主黨右翼的政治經濟學黨綱（支持領匯、高鐵、偏向大財團而不同情中小企……），可以成為香港財閥的利益代表，也囊括三四成的民意授權，連帶民建聯的收買式民意，可以支撐得起一個有民意授權而又令商界放心的威權政府了。可惜，由於香港民眾的自治意識不強，中共處處

對香港自治設防，香港的財閥只是借助政黨政治來謀利，勾結政府，推行新自由主義的瘋狂剝削。

港共政府的政治思想，不是左翼（強調公平分配）也不是右翼（強調自由競爭），而是腐敗的官商勾結財閥壟斷政治。香港的民主派政黨由於在政府無人，只能依靠政府，民主派提出的議案或支持政府的議案，不論左翼的最低工資保障還是右翼的屋邨商場領匯化，最終都會變成財閥勒詐香港工人和中小企的新手段：強積金、最低工資、先租後買的新居屋、競爭法、全民退休供款、醫療供款，最終都會成為政府推卸責任，使到助長大財團剝削弱小的新自由主義在香港伸展得更深更入，使得銀行大班直接每月在工人口袋裡掏錢享樂。民主派和工團派提出的所謂議案，在腐敗政府手裡一轉，變成財閥剝削勒詐的手段，九七至今，已有十幾年了，民主派議員知不知道的呢？我看還是知道的。一方面，他們的捐獻有些來自財閥，二方面，他們政治議程貧乏、政治思想貧乏，除了每四年「選情告急」，向選民催票一次，就任議員之後要求政府加強監管、設立保障之外，就沒有甚麼議程。

在目前的腐敗政府、專權政府手上，加上議會制度不公平，裝點性質的民主政治很難維持下去，資本家也無法植根香港社會，取得民主制度的保障。香港資本家由於並非出自中共黨委系統，

也不能長期依靠北京，政治本土化是避免不了的，即使中國民主化，香港的資本家也要取得地方實力，與中央周旋，故此必須考慮在香港下錨，保護世家的地盤。

《基本法》不許特首隸屬政黨而形成執政的政黨，然而特首可以借助主要官員問責制度，委任政黨內閣而達到政黨執政的實質。由於香港的經濟依然要依賴財閥支持，他們只要願意在香港下錨，堅持香港自治而無其他政治野心，中共應可放心他們發展民主政治。方法是培養香港的大黨——民建聯和民主黨，成為準執政黨。政黨提出議程，採取執政者的態度，做好政策研究及民間宣傳，使得政府不能在中間轉變細節而令政策變質，也監察政府執行政策。

(三)香港保住富人的身家性命

大陸的食物、食水、衣服有毒，空氣污染，民心浮躁冷漠，盜匪兇殘無道，北京中南海的政要不單食水、食物要特別供給（特供），連空氣也是特供。四 香港是普通人在中國土地上唯一

感到安全的地方。這是香港財閥富豪不會北上定居，依然大部分居住在香港的原因。即使在中國動亂的時候，香港也是個安全的留駐地。

香港的資本主義無法走向健康正常，是由於國族意識的大問題未有解決，而城邦意識是過渡期的本土效忠意識，毋須期待民主中國，也毋須低頭認命，更毋須莽撞尋求香港獨立，目前的一國兩制已經充分授權香港處理內政，只要香港的財閥意識到必須維繫香港為生存基地，就會改變短視行為，用他們龐大的資金改善香港，成為他們長久的基業，將香港建設為東方的瑞士。瑞士成功之道，乃維持其一貫中立的原則，與鄰國協議保障其安全，亦因為政治穩定，瑞士儲存和管理財富之地，是銀行和保險的集中地，並發展高增值的農業、食品加工業、精密工業、醫藥等，保護當地文化傳統，也確保當地人得到全面的創業精神鍛煉。[五]

四．靠的是空氣過濾機（香港稱空氣清新機）。

五．當法國、德國出現政治動盪的時候，瑞士接受了很多逃離法國、德國的人才。例如，信奉天主教的法國，曾經有一段時間是壓抑銀行業發展的，所以很多銀行家、保險業人士便移去鄰近的瑞士謀生，結果帶旺了瑞士的經濟，令銀行業、保險業晉身世界前列。

香港的政治面臨三岔口，要往良性一面發展，視乎中共、港共、財閥和香港市民對香港的歸屬感和想像力。目前中共對香港的政策是耗損式的，只令到個別人可以在香港腐敗和倒塌之前謀奪私利。舉香港警察為例。香港人已經被地產財閥消耗精力，連做賊都沒勁了。當香港警察無賊可捉的時候，本應是裁員，但港共政府的警察總長曾偉雄，發明了衍生工作（job creation）的方法，就是挑釁示威者，以便招募更多警員。對付被激起暴力衝動的示威者，出動的警力和裝備，比起對付小賊的要多得很，而且，最重要的：對付示威者如校場閱兵大典，是中產和富人可以在電視看到的。假若香港此刻是由維護資產階級的政黨主政，政府的做法，是將警務處長撤職，精簡警察部隊，派出極小數量而且無武器配備的警察維持秩序，令香港示威者無法受到挑釁。這是常規的政術。甚麼是精明政治（smart politics），甚麼是傻蛋政治（smartass politics），大家比較一下，便會知道。

假若香港有自由主義或右派的資本家政黨主政，見到有官僚如此誘騙政府加大公共開支，搞壞社會秩序，應該馬上在立法議會翻桌子大罵的，而輪不到反對黨的黃毓民議員翻桌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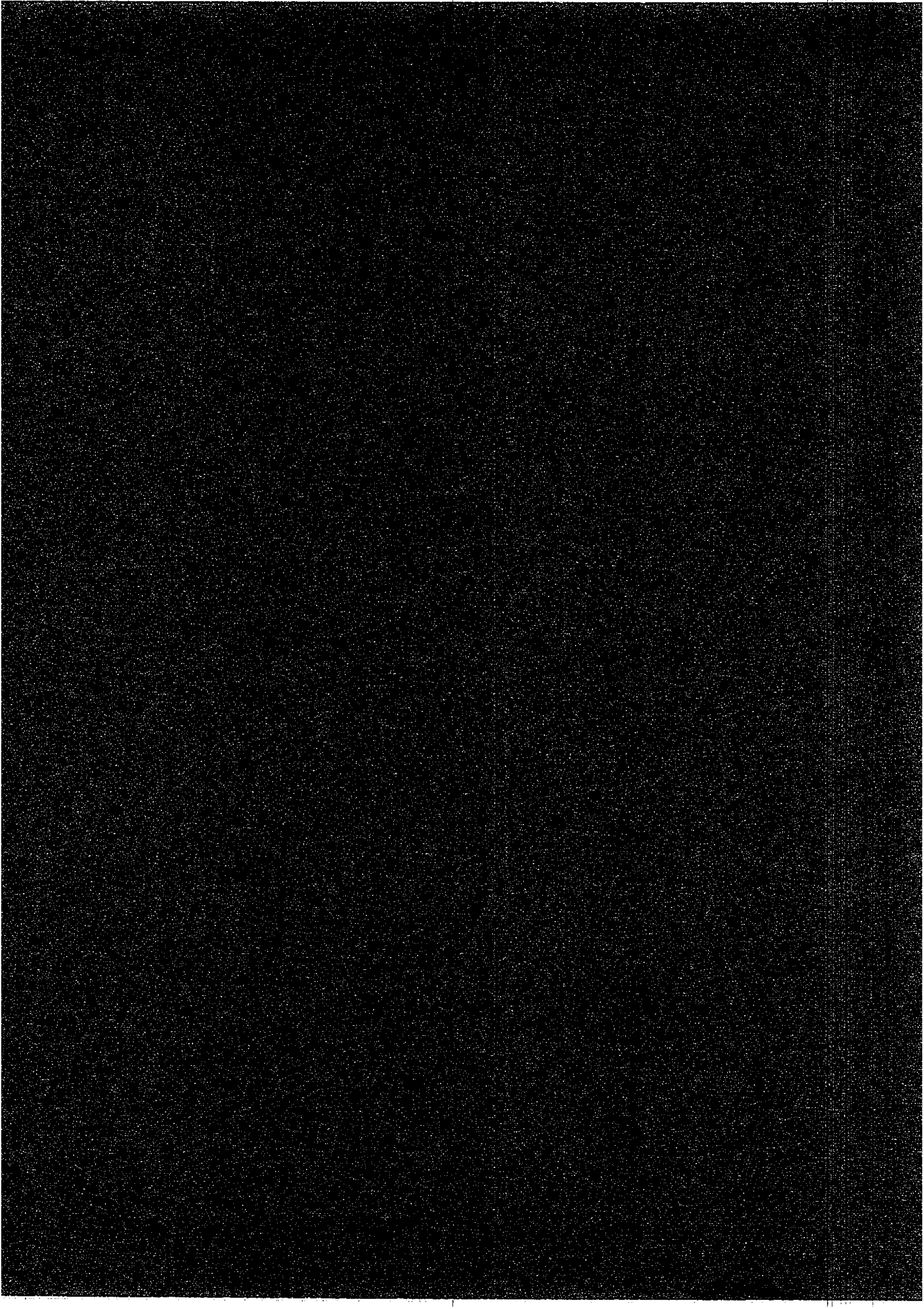
（四）以政治特權交換經濟特權

中共行的是國家資本主義制度，它靠龐大的經濟總量，在香港實施「配給資本主義」[六]，配給生意關係，威逼香港商人投共，令他們依賴中共，寄居在中國的卵翼下，這會削弱生產力和競爭力，殘毒香港企業精神（entrepreneurship）。要恢復香港逝去的自由經濟和企業精神，要由本土意識和自治運動做起。香港各階層重新醒覺，以香港為家園，訂立新的社會契約，放棄壟斷，能者居之，並且保護弱小，安撫失敗者和創傷者，以真實的社會和諧，締造民主共和。

在中共統治之下，政治自保是經濟自保的前提。自治關乎香港人的尊嚴，也關乎香港人的生計。香港自治，是香港人在政治上自保的護身之法，也是掌握政治特權以交換經濟特權的養身大法。

六．博客黃世澤的觀念。

香港繁榮的其中一個要素，是要維繫中國大陸的貿易關係和商業服務。然而此貿易與服務關係一向的運作原則，是香港以政治特權換取經濟特權，即是說，香港的多元社會、法治制度和深厚文化所形成的政治特權，令香港可以與中國其他地方區別開來，佔據關鍵位置，與中國大陸交換經濟特權，使香港成為中國的金融服務、財富管理和國際接觸之地。這是瑤池聖母與羅剎鬼之間的交易關係。為了維持此特權地位，香港人必須體認城邦歷史，捍衛一國兩制，實現港人自治，令香港成為華人首善之區，並以憲政法治為示範，鼓起大志氣，輔助中國大陸、台灣和香港、澳門走向中華邦聯，協和鄰邦，領導東亞。



Insight 17

香港城邦論

作者　陳雲
出版人　曾玉英
出版經理　陳秀慧
文稿校對　賴菊英
書籍設計　陳張、Carol Kwok

出版　天窗出版社有限公司 Enrich Publishing Ltd.
香港九龍觀塘鴻圖道 71 號瀝洋工業大廈 2 樓
發行　天窗出版社有限公司 Enrich Publishing Ltd.
電話　(852) 2793 5678
傳真　(852) 2793 5030
網址　www.enrichculture.com
電郵　info@enrichculture.com
出版日期　2011 年 12 月初版
2012 年 1 月第二版

承印　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
官塘榮業街 6 號海濱工業大廈 4 樓 A 室

定價　港幣 $128
國際書號　978-988-15504-1-5
圖書分類　(1) 政治評論　(2) 社會科學

支持環保

此書紙張經無氯漂白及以北歐再生林木纖維製造，並採用環保油墨

